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历史问题研究

杨元忠 李荣珍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历史问题研究

杨元忠 李荣珍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国家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问题研究 / 杨元忠 李荣珍

著: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098-2330-9

I. ①陕… II. ①杨… ②李… ③中… III. ①陕甘宁
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 IV. ①K269.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7726号

责任编辑: 王鸽子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编: 100080

网址: www.dscb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兰州兴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180千字

印张: 19.5

印数: 1-1000册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98-2330-9

定价: 62.00元

目 录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程	1
一、西北第一支红军的创建	2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9
三、陕北红军及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6
四、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18
五、党中央纠正“左”倾错误肃反	19
六、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22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历史原因分析	24
一、坚持党的领导,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 思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并发展	26
二、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抵制来自“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干 扰,保证了党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领导	31
三、坚持自主发展,采用颇具特色的“陕甘模式”,构建多 区域的大战略布局,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空前发展创 造了条件	39
四、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开展多方位、多层 面的统战工作,团结起社会各阶层,保护和发展了革 命力量	44

五、坚持根据地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 全面发展,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51	
六、坚持群众路线,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 得了群众最衷心的拥护和最广泛的支持 ……………61	
对中共中央和中央有关部委关于解决陕甘边、陕北问题若 干文件的解读 ……………69	
一、关于《中共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1935年 11月26日) ……………69	
二、关于《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 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42年12月20 日) ……………75	
三、关于《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 意见要点》(1959年11月23日) ……………80	
四、关于《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 意见》(1959年11月23日) ……………84	
五、关于《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 志丹〉平反的报告》(1979年8月4日) ……………85	
六、关于《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 通知》(1980年2月25日) ……………89	
七、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 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通知》(1983年7月13 日) ……………90	

八、关于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情况》的通报(1984年2月24日)	95
九、关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1986年5月21日)	97
十、相关问题	101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评析	106
一、陕甘红军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北方地区取得成功,星星之火,在西北已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107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西北地区的成功实践,是探索以农村为根据地发展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又一光辉典范	113
三、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选择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为落脚点,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形成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新的指挥中心	119
四、创造性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战线在陕甘边区成功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129
五、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后,成为中	

国革命再次腾飞的“出发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37
六、陕甘边共产党人和无数革命志士用鲜血和生命孕育 成的南梁精神,是对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延 安精神的源点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	144
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实践,为党积累了宝贵的执 政经验	153
陕甘革命根据地重要会议研究	167
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	168
二、寺村塬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169
三、麻子掌、梁掌堡会议	171
四、北梁会议	173
五、陈家坡会议	177
六、包家寨会议	181
七、莲花寺整编大会	187
八、南梁寨子湾会议	189
九、南梁荔园堡会议	190
十、南梁阎家洼子会议	194
十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成立大会	199
十二、周家硷会议	201
十三、中共西北工委永坪扩大会议	204

十四、杨家园反“围剿”军事会议	207
十五、文安驿会议	209
十六、中共西北工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永坪联席会议	212
陕甘边苏区的统战工作及其主要特色	216
一、成功的兵运工作为陕甘红军的创建和持续开展对国民党部队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	216
二、成功的统战政策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壮大了革命阵营	222
三、陕甘边苏区的统战工作经验及主要特色	232
两当兵变前后习仲勋的革命实践	241
一、青年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追求	242
二、习仲勋的兵运工作实践	244
三、两当兵变后习仲勋的革命活动	250
两当兵变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256
一、两当兵变前期的兵运工作	256
二、两当兵变的主要过程	264
三、两当兵变的重要历史影响	270
附 录	
陕甘边区党组织领导名录	276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领导名录 ..	279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名录	280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南梁政府）领导名录	283
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名录	285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领导名录 ...	286
军事机构领导名录	287
陕甘边区机关及所属各区县党政军领导名录	298
后 记	305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程

核心提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西北共产党人在甘肃、陕西边境地区创建的一块红色苏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南方各根据地陆续丧失的情况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组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改编后的八路军奔赴抗日疆场的出发点。多年以来，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研究，与南方根据地的研究相比较为滞后。近几年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力度在加大，也出现了可喜的成果，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搞清楚，深度研究有待加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程，是在已掌握陕甘边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提炼，概括介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历史全过程。这是研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基础材料，旨在通过对这段历史的介绍，使读者能够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有大致的了解，起到学习党史、普及党史知识、推进党史研究的作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上世纪30年代初，中共陕西省委、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甘肃和陕西交界地区，领导陕甘

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经过艰苦的武装斗争，创建的一块地域辽阔的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寺村塬、照金、南梁三个阶段，其中在甘肃境内经历了寺村塬、南梁两个阶段。它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组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从全国来看，这块根据地的存续时间是最长的。

一、西北第一支红军的创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红色武装的建立和武装斗争的开展是根据地创立和发展的前提，井冈山的经验同样在陕甘边境地区得以体现。陇东是西北红军的摇篮。大革命失败后，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西北党组织相继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早期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相继失败后，党的武装斗争策略调整为开展兵运斗争，通过兵运斗争来建立红色武装。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打入国民党地方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同时，还深入到陕甘边境的子午岭地区组织农民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准备在兵运工作和组织农民武装的基础上，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

（一）南梁游击队。在持续不断的兵运工作基础上，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在合水县太白镇成功领导太白起义，在陇东地区打响向国民党武装进攻的第一枪。太白起

义消灭了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组建起100余人的游击队，因活动范围多在南梁及周边地区，被群众称为“南梁游击队”。受刘志丹影响，合水、安塞、保安等地农民武装和部分民团也前来参加游击队，游击队伍不断壮大。1931年2月中旬，游击队在合水县固城川麻峪村进行整编，400余人编为4个连，由刘志丹任总指挥。3月，为使游击队暂时渡过难关，刘志丹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与军阀苏雨生部谈判，游击队被编为苏雨生部补充团。此时，李杰夫（高维翰）来到部队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利用补充团的名义，尽量扩大部队，积极准备打红旗”的指示。6月，苏雨生对刘志丹产生怀疑，扣押刘志丹，补充团除少部分人员突围外，大部分被缴械，编入苏雨生的其他部队。后经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中共党员南汉宸和民主人士杜斌丞等人营救，刘志丹获释。7月，刘志丹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到陇东军阀陈珪璋部开展兵运工作。此时，陈珪璋刚被任命为国民党新编十三师师长，急于扩张势力，于是任命刘志丹为他的十一旅旅长。8月，陈珪璋部第十三旅旅长高广仁率部队突然对驻防宁县早胜的刘志丹的十一旅发动进攻，十一旅猝不及防被缴械，刘志丹被关押，后在押往合水途中乘大雨脱险。9月，刘志丹组织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三支农民武装集合在合水倒水湾进行整编，将部队编为三个大队，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人分任一、二、三大队队长，刘志

丹任总指挥。全队共400余人，200余支枪。恢复重建的部队仍然被称为“南梁游击队”。10月下旬，杨重（仲）远、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1931年9月，晋西游击队渡黄河到陕北。10月，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与师储杰等率领的烟商保运武装合编为陕北游击支队）到达华池县林锦庙，与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11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与刘志丹一起领导这支革命武装。谢子长来到部队后，向部队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和向甘肃正宁、陕西旬邑、淳化发展，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时至冬天，部队面临给养缺乏、难以越冬的困境。此时，陈珪璋为扩大势力，派人来商谈收编南梁会师部队。谢子长、刘志丹商议用“借水养鱼”的办法让部队渡过难关，由此，部队番号定为陇东暂编十三师警备骑兵第二旅，旅长谢子长，副旅长兼参谋长刘志丹，驻防庆阳新堡。谢子长、刘志丹借休整机会，加强部队整训和政治工作，将部队改为团、营、连编制，团设中共党支部，营设教导员，连设指导员，保证党对部队的领导。

（二）西北反帝同盟军。1931年12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卿来到部队，传达了省委关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形势日益高涨，部队应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指示。1932年1月初，部队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改编为西

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每个支队又各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两个支队共有700余人。为保证党对部队的领导，在两个支队中都建立了党支部。在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大会上，谢子长、刘志丹、荣子卿分别讲话，中共旬邑县特支负责人第五伯昌授军旗。之后，部队移驻正宁三嘉塬整训。此时，阎红彦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返回时带来《古田会议决议》、《中央苏区情况》、《红军制度》等小册子，省委指示部队要加强学习。根据省委指示，谢子长、刘志丹加强部队的整训学习，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等重要文件，并制定了部队纪律。通过学习整训，指战员提高了认识，统一了部队思想，加强了部队的思想建设，增强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驻防正宁三嘉塬，因部队给养困难，第二支队一大队队长赵连璧带一部分人外出打土豪，因为打击面过宽，并在集市上抢群众的东西，造成不良影响，于是少数领导人认为第二支队成分不纯、部队不稳。2月6日，因对部队个别人违反纪律处理方法的意见不同导致发生“三嘉塬事件”，一支队缴了二支队的枪，二支队被解散，二支队一大队队长赵连璧等人被打死。随后，第一支队队长师储杰率领100余人出走，投靠

杨虎城部队，西北反帝同盟军由700余人锐减到200余人。三嘉塬事件是发生在西北反帝同盟军向陕甘游击队转变过程中的一个曲折。^①

（三）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2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传达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指示，并主持部队改编工作。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简称陕甘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一个骑兵队和一个警卫队，全军共360余人。总指挥先后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担任，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中共队委会同时建立，李杰夫任书记，各大队均建立党支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第一次在西北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领导的武装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接连取得旬邑县职田镇、阳坡头战斗的胜利，并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开到陕西渭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先后歼灭敌民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1986年5月21日）认为，“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

团军1000余人。1932年3月，回师正宁寺村塬一带，创建了寺村塬革命根据地，并多次取得打破敌人“进剿”的胜利，部队也壮大到1500余人。7月，在谢子长、刘志丹策划组织下，高鹏飞在西华池发动国民党新十一旅特务营起义，部队被成功拉出，扩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后来，陕甘游击队受到“左”倾错误指挥影响，导致寺村塬革命根据地丧失，部队也锐减到200余人。

（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指示，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成立，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此时红军陕甘游击队只有200余人，成立一个师不够条件，故只辖红二团一个团）。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政治保卫队，拥有150余支枪。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标志着西北红军第一次有了军一级的正式番号。受中共陕西省委所派，负责整编部队的省委常委杜衡^①任红二十六军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王世泰被选为红二团团团长，参谋长由郑毅担任。当时，执行

^① 杜衡，又名杜励君，陕西佳县人。1930年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改为中共陕西省委，杜衡任省委书记。1931年杜衡不再担任省委书记，任省委常委兼管组织工作。同年8月，杜衡再任省委书记。1932年8月，中央指定杜衡担任即将成立的红二十六军军政委，省委书记由孟潜担任。1933年3月，袁岳栋任省委书记，杜衡为省委常委。同年4月，杜衡被免去省委常委职务，为省委委员。1933年7月，杜衡被捕后叛党。

“左”倾错误路线的杜衡指责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是“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撤销了他们在陕甘游击队的职务，强令谢子长、阎红彦到上海受训。在红二团指战员的强烈要下，杜衡不得不同意刘志丹留在部队里，但只让他担任政治处处长。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红二团即开往子午岭山脉南端的照金地区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在刘志丹指挥下，红二团多次取得作战胜利，并帮助地方党组织相继组建起20余支地方游击队，至1933年4月，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6月下旬，杜衡命令红二十六军立即南下渭华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刘志丹等人认为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强的地区不利于红军的发展，但正确意见不被杜衡接受。7月，南下的红二十六军在终南山失败（刘志丹等人脱险后于10月返回照金）。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党政军联席会议在合水包家寨召开，会议作出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等重大决定。11月8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成立，师长先后为王泰吉、刘志丹、杨森，四十二师下辖红三团、骑兵团（由红四团改编而成）。1934年1月，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相继成立，多支红军游击队在各县区建立，地方武装力量大大加强。

到1934年底，红四十二师扩大到拥有红一团、红二团、红三团、骑兵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等5个正规团，兵力达1000余人，各县游击队也发展到1500余人。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创——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932年3月中旬，红军陕甘游击队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确定的游击战争纲领，以正宁县寺村塬为中心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以寺村塬为中心，周边72个村镇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在寺村塬新庄子举行集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15人组成，农民委员10人，游击队委员5人，选举李杰夫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静元、李××（一说唐贵荣）为副主席。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粮食4个委员会，并组建赤卫军总指挥部。各村也成立革命委员会，根据村的大小，各村设3至5名委员。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在根据地建设中，革命委员会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积极响应。

依托寺村塬根据地，总指挥谢子长指挥游击队攻占旬邑县城，歼敌300余名，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打下的第一个县城，在陕甘边境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因二次攻打正宁山河城失利，谢子长被此时来到陕甘游击队视察工作的杜衡撤职，被派往靖远，在国民党部队中搞武装起义。1932年5月，国民党部队向陕甘游击队发动“围剿”，为打破敌人进攻，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并兼任中共队委书记，李杰夫任政委。5月中下旬，在刘志丹指挥下，陕甘游击队转战7个县，挺进700里，历经9次战斗，8胜1负，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正在根据地局面初步打开之时，杜衡却命令陕甘游击队到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东进韩城。在与强敌战斗中，陕甘游击队失利，转移途中又遭受损失，部队退到宁县麻子掌时，只剩200余人。7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担任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执行“左”倾错误指导思想，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彻底转变陕甘边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建陕甘边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指示”，指责刘志丹等人是“逃跑主义”、“上山路线”，限令20天内将五顷塬的土地分配完毕。随后，在国民党部队“围剿”寺村塬革命根据地时，李艮命令部队采取死守硬拼的方法进行阵地战、保卫战。但防御阵地连续被敌人突破，陕甘游击队最终突围到旬邑县马栏镇，部队损失过

半。8月，寺村塬革命根据地陷落。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陕甘边游击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中共陕西省委提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请求。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提出了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红军和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三大任务，并开始实施。

1932年12月，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担负起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的任务。照金位于子午岭南端，山大沟深，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党的工作在这里有一定基础，早在同年夏秋之际，习仲勋等人已经在这里开辟了游击区。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始创建以薛家寨为中心的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陕西照金兔儿梁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成立了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后张秀山）任政委，统一领导根据地各支游击队活动。4月5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决定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经济、粮食、文化教育、内务、土地

和肃反委员会及赤卫军总指挥部，工作机构驻薛家寨。随后，区乡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到4月底，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至沮河，西抵淳化塬畔，北至马栏川，南至爷台山，东西相距50里，南北相距80里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分牛羊，组织起了青年团、雇农工会、贫农团等组织，颁布边区法令，开展了戒烟、禁赌、宣传妇女放足等群众运动，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933年6月，“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建立根据地，结果遭敌围攻，导致红二十六军失败，红军主力的丧失使西北革命转入低潮。7月底，杜衡等人在西安被捕叛变，导致中共陕西省委及所属白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8月14日，习仲勋、秦武山等在耀县陈家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建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制定了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10月中旬，国民党调重兵对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为保存革命力量，终南山脱险回到照金的刘志丹立即率红军主力北上陇东，转入外线作战。陕甘边区特委领导地方游击队坚守薛家寨，因敌我力量悬殊，再加上叛徒给敌人带路，10月15日，照金根据地中心区——薛家寨失守，照金革命根据地失陷。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在陕甘边革命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作出了三项重要决策：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以子午岭桥山中段的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区指挥部。包家寨会议正确制定了陕甘边区革命发展的新战略和策略方针，推动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

选择南梁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因为南梁有这样几个有利因素：一是南梁位于子午岭山脉中段，山多林密，适合游击战争的开展；二是刘志丹等人经常活动在这一地区，地形非常熟悉，利于应对复杂形势；三是南梁及周边地区因为很早就有党的活动，群众对共产党有一定认识，有群众基础。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于1933年11月8日恢复成立的红二十六军很快投入了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斗争中，各路游击区也迅速得到发展，红色区域很快扩大到以南梁为中心的周边10余个县的部分地区。11月中旬起，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陆续派张策、习仲勋等到南梁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实行土地革命。为加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1934

年2月25日，陕甘边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决定恢复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习仲勋为主席，白天章（后贾生秀）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联合会、贫民团、雇农工会及农民武装游击队迅速发展，并配合红四十二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

照金失守后，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到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特委委员分散活动，此时由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陕甘边区特委职责。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委书记张秀山，军委主席刘志丹。会议决定杨森接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兼任参谋长；并派张秀山、惠子俊、蔡子伟、强家珍、马仰西等到庆北开辟新苏区。9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将第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成立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

1934年11月1日至6日^①，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

^① 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时间有11月1日至6日和11月4日至6日两种说法，这里采用2012年12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一卷的说法。11月7日是成立大会时间。

表大会，决定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称南梁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在荔园堡举行。大会选举习仲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选举刘志丹为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选举朱志清为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贵为副总指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文化、工农监察、肃反、妇女等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大队。在此前后，华池、赤安、庆北、新宁、新正、安塞、赤淳、合水、富西、富甘、中宜等陕甘边区18个县的广大地区建立起了各级苏维埃政权。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根据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民团政策、对土匪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对知识分子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实行土地革命，开设集市、发行货币，建立列宁小学、成立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进行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建设，根据地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陕北红军及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一) 陕北红军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向中共陕北特委发出指示，要求“编制游击队，立刻开展游击战争”。1931年9月，因国民党山西部队派重兵“围剿”中共山西特委领导下的晋西游击队，为保存革命武装，晋西游击队在拓克宽、阎红彦等共产党员率领下西渡黄河到陕北，与中共陕北特委取得联系后，在陕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0月上旬，在安定（今子长）县应陕北“保运”武装领导人师储杰、杨琪、杨鼎要求，两支队伍合为一体，改称陕北游击支队。10月下旬，阎红彦等领导陕北游击支队到达南梁，在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两支部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2年3月13日，共产党员刘善忠、高朗亭等人组建的红军游击队在延川成立，4月，延川游击队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10月，中共陕北特委将西北先锋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1933年4月，第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以下简称陕北一支队），南下陕甘边区，随红二十六军活动。5月底返回陕北，后在安定作战失利。9月，红二十六军给陕北一支队派去支队政委，支队随红二十六军活动。

包家寨会议后，陕北一支队到安定开辟第一路游击区，数次战斗失利，部队被打散。1934年2月，在谢子长领导下，陕北一支队恢复。到1934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建立了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第四支队、第五支队，陕北苏区已拥有五支游击支队。1934年7月，陕北军阀集中1.5万兵力，对陕北苏区发动“围剿”。为打破敌人“围剿”，7月8日，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成立，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7月28日，陕甘边区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陕北特委、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南梁阎家洼子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主力红三团前往陕北，帮助开展陕北游击战争，打破敌人对陕北苏区的“围剿”。红三团很快打开局面，与陕北各游击支队并肩作战，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加速了陕北革命武装的发展。之后，延川、安塞、定边等地先后也成立了多支游击队，使陕北的游击支队总数达到26支。9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在安塞成立，下辖第一、二、三团，标志着陕北第一支正规红军的诞生；1935年1月，陕北红军独立师在安定改编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下辖三个团。

（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陕北与陇东地域相接、自然环境相似。早在1924年，

共产党员李子洲等人就在陕北榆林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成立。1933年7月，在佳县召开了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认为陕北已经具备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决定首先在神（木）府（谷）地区、佳（县）吴（堡）地区、绥（德）清（涧）地区、延川、安定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军和苏区，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是从建立县级政权开始，然后建立整个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从1934年8月到1935年2月，陕北根据地先后在安定（1934年11月改名为赤源县）、清涧、神木等县建立了县级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1935年1月，在已建有9个县级革命委员会或县级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陕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宣告陕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随着各县党组织、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共青团和其他群众组织也都相应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逐步稳固，成为后来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在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都取得大发展的基础上，为了粉碎敌人对两块苏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陕西赤源县

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的党、政、军组织。惠子俊为中共西北工委书记，习仲勋等为西北工委委员；刘志丹（一说谢子长）为西北军委主席。随后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按照会议部署，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统一指挥下，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军民奋战5个多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先后攻克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靖边、定边、环县等游击区，使得游击区扩大到陕北、陇东一带的30个县的区域。游击战争均取得蓬勃发展的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第二次反“围剿”取得完全胜利，标志着陕甘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也进一步壮大，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各路游击队也扩大到4000余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五、党中央纠正“左”倾错误肃反

1935年7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治来到陕甘革命根据地，9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的聂洪钧也到达陕甘根据地。9月9日，红二十五军长征亦到达陕甘根据

地的永宁山。“红二十五军一到陕甘苏区，即受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代表习仲勋、刘景范等人的热烈欢迎。”^①9月中旬，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红二十五军政委、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共同组成中央代表团，负有“肃清陕北右倾机会主义”的使命。根据中央代表团的意见，取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以朱理治为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为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徐海东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程子华为军团政委，高岗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为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中共陕甘晋省委隶属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中共陕甘晋省委先后发展并领导陕甘边苏区、陕北苏区的26个县（工）委。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后，成立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辖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北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南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东区革命委员会及20余县各级苏维埃政权。9月21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决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全面开展肃反运动。肃反分后方和前方（在劳山一带），后方由郭洪涛负责，前方由聂洪钧负责，并成立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由戴季英任局长。肃反导致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一大批陕甘边苏区、陕北苏区党政军干部被关押，其中200余人被杀害，造成了根据

^① 刘秉荣著：《中国工农红军全传》（七），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4318页。

地人人自危的严重局面。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及时纠正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一大批被关押干部。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决定认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混淆了斗争的目标，分散了斗争的力量，肃反工作中的粗鲁和疏忽，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军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决定要求，立即改组陕甘晋省委保卫局，纠正肃反中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给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人平反，刘志丹当众讲话：“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①同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对戴季英作出最后警告、对聂洪钧作出严重警告的处分决定。纠正错误肃反后，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斗

^① 罗迈：《初到陕北》，载《中共党史资料》第十四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5页。

的重大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部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使陕甘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

六、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11月初，中共中央到达甘泉县的下寺湾。11月7日，中共中央进驻陕北瓦窑堡。1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共中央撤销陕甘晋省以及中共陕甘晋省委、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设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和新的西北军委；成立中共陕甘省委（朱理治任省委书记）、中共陕北省委（郭洪涛、马明方先后任省委书记）两个省委和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习仲勋先后任特委书记）、中共神府特委（杨和亭任特委书记）、中共三边特委（贾拓夫任特委书记）三个特委，隶属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即行取消，原辖区内各级党政组织划归中共陕甘省委、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王生玉、朱开铨先后任主席）领导。

1936年初，国民党重兵围困陕甘根据地，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表《东征宣言》，选择势

力较弱的晋军为进攻对象。在予敌以沉重打击之后，红军于5月初撤回黄河以西。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且扩大根据地，5月18日，彭德怀率领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西征。西征红军重创马鸿宾、马鸿逵等部，解放了甘、宁交界的大片土地，使根据地扩大到了宁夏部分地区，形成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936年夏，中共中央顺应革命形势发展，成立了陕甘宁省，根据地的县、乡革命政权得到明显加强。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后改为志丹）移驻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前，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地跨陕、甘、宁三省，面积接近13万平方公里。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中共将陕甘宁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1937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确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地位，明确规定边区直属行政院管辖。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宣布成立，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授权，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北五省地区代行军事管制和人民政府职权。至此，陕甘宁边区建制撤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 历史原因分析

核心提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共的白区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并直接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即开始长征。“左”倾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而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共同组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能够主动抵制和努力克服“左”倾和右倾错误给根据地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既有地域上的优势，也在武装斗争的战略和斗争形式上以及根据地的建设上创造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独特做法；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自觉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不断发展壮大。综合分析，“硕果仅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对毛泽东“武装割据思想”的实践和创

新，也有排除“左”倾和右倾错误干扰，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陕甘边集体领导核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对根据地创建的规律的探索，也有以“狡兔三窟”为斗争策略，构建多区域战略布局的陕甘模式；有团结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也有深深赢得民心的深入细致地群众工作方法，等等。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上世纪30年代前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西北红军和人民群众在甘肃东部与陕西中、北部交界地区创建的**一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30年代中后期，因为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导致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却在此时得到完整地保存并发展壮大，并与陕北根据地一起组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成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由于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

根据地”。^①抗战刚开始，毛泽东又指出：“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②

毛泽东的评价，是对陕甘革命根据地重要历史地位的准确定位。这块根据地为什么会发挥出如此重大的历史作用？为什么会“硕果仅存”？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坚持党的领导，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并发展

陕甘边的武装斗争始于兵运工作，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人在开展兵运工作的基础上，对走井冈山道路、创建革命根据地有了深刻的认识。大革命失败后，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西北党组织相继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早期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相继失败后，党的武装斗争策略调整为开展兵运斗争，通过兵运斗争来建立红色武装。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打入国民党地方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同时，还深入到陕甘边子午岭地区组织农民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兵运工作进行得非常艰苦，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曾先后在谭世麟、苏雨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85、18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10页。

生、陈珪璋等国民党地方军阀部队及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杨虎城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他们多次组织武装，又多次经历失败，为创建革命武装而不懈努力。1930年10月，刘志丹率部在合水太白镇发动起义，歼灭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全部，击毙营长黄毓麟等反动军官10余人，收缴枪支50余支，俘敌数十人。此战沉重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此次战斗后，刘志丹组建起一支100余人的游击队，南梁是其主要活动区域之一，所以又被当地群众称为“南梁游击队”。在甘肃其他地区，兵运工作也取得重大成效。1932年4月，习仲勋等在两当领导发动兵变；5月，谢子长等领导了靖远起义；7月，在刘志丹派出部队的接应下，高鹏飞等人领导的西华池起义获得成功。长期的兵运工作和持续拉起革命武装的努力使西北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性，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刘志丹从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中得到启发：“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①谢子

^①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99页。

长在对习仲勋谈话时也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①习仲勋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也谈到这个认识：“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使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②刘志丹等人在南梁一带以及周边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这里地处陕甘交界，是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有利于创建根据地。党在南梁地区的武装斗争也逐步展开，成立了南梁游击队，虽曾一度遭遇失败，恢复重建后与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揭开了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

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中心内容就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重要依托，三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通俗地讲，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也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自觉领会和付诸实践的过程。

只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才能立住脚。这是刘志丹等人在多次起义失败

^①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99页。

^②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99页。

和“左”倾错误在根据地建设上导致危害的基础上得出的认识，也是在区域对比和选择上得出的认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先后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发展阶段，其中寺村塬、南梁两个阶段在甘肃境内，照金阶段在陕西境内。1932年由谢子长、刘志丹以正宁寺村塬为中心创建的第一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因“左”倾错误的影响和保卫战指挥上的失误，根据地存在不久即失陷。但这次建立根据地的探索和实践，为后来的创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1933年春，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得以开辟，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相继成立，并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副主席。照金革命根据地发展很快，红色区域其幅员“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至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迄断头川、伍房川，南到桃渠原、高尔原、老牛坡；方圆数十里，跨越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①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对照金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照金苏区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照金苏区陷落。随后，在甘肃合水包家寨会议上，制定了以南梁为中心创建根据地，发展陕北、陇东、关中三个游击区的正确方针，随着三路游击区的迅速开辟，以南梁为中

^① 张秀山：《照金革命根据地忆述》，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68页。

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从上述三次创建根据地的过程来看，共同点是：创建的成功表现在区域上，都是选择了山大林深的子午岭山脉；表现在政治上，都是选择了相对来说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而分析寺村塬革命根据地和照金革命根据地丧失的原因，其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陕西省委执行一些“左”倾错误的指挥，一定要红军主力南下平原地区去创建新的根据地。其二在地理因素上，寺村塬革命根据地和照金革命根据地虽然同处山高林密的子午岭山区，但寺村塬位于子午岭西南端，虽也属山区，却是大塬与大山的结合部，人口密度比南梁稍大，交通也相对便利些。虽然根据地建立后的影响非常大，但也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和反扑。照金革命根据地处于子午岭南端，此处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尤其是中心区域薛家寨位于悬崖峭壁之上，敌人要攻占非常困难。但照金革命根据地距离国民党西北统治中心的西安只有100余公里，敌人调动兵力也比较容易，而薛家寨的失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内部出了叛徒所致。南梁相对来讲，正是在吸取前两次创建根据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比较和选择。在南梁革命根据地开辟时，充分考虑了当地有利的地理条件。子午岭山脉北起环县、定边，南到淳化、耀县，雄伟苍茫，纵贯南北，绵延数百里。南梁地处子午岭山脉中南段，这里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森林茂

密，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大。以子午岭为依托建立根据地，进可直逼关中，瞰制咸榆大道，退可据险扼守山林，向东可进军陕北，向西可开辟陇东。独特的地理条件制约了国民党军队优势装备的发挥，十分有利于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是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陕甘边区党和红军正是充分利用了这里的地理条件，创建、保卫和发展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南梁地处陕甘交界，“山高皇帝远”，是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地域偏远、地广人稀、交通阻隔、消息闭塞，国民党当局政令难以通达，在这一地区的行政和军事控制力相对较弱。这种状况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积蓄，有利于根据地的创建。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巧妙利用这些有利因素，积蓄革命力量，使子午岭上的星星之火，在西北高原终成燎原之势，这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抵制来自“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干扰，保证了党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领导

自觉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矢志不移恪守的政治信念，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成为“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刘志

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党组织和红军领导人有着坚强的革命信念，有着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革命道路充满了艰难曲折，他们也面临了无数次艰难困苦的考验。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执行者无端的指责和降职处分，还是内部意见的分歧和争论，甚至在错误肃反中被关押，面临生死考验，他们都能以革命大局为重，坚决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始终保持坚定的党性原则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保存了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①这里说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是指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它对全国各革命根据地造成了很大危害，导致了除陕甘革命根据地外其他几块革命根据地的全部丧失。比如，1932年5月，国民党军集中30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但此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68页。

时，鄂豫皖苏区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则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战方针，他认为：“目前我们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或对敌人‘围剿’一个打击的问题，而是根本消灭‘围剿’，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①他不顾部队已连续作战7个多月，急需休整补充的情况，而是根据临时中央的军事训令，制定冒险激进的作战计划：第一步，打到平汉路一带；第二步，沿平汉路南下，威逼武汉。鄂豫皖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后，虽然与敌激战多次，毙伤和俘虏大量敌军，但并不能改变红四方面军作战被动的局面。9月初，红四方面军主力陷入国民党军三个纵队的合围中，不得不突围向皖东转移，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机关也被迫从根据地撤出，随军转移。张国焘此时由盲目轻敌变成惊慌失措，导致罗田、独山、麻阜、金家寨等地被敌人占领。10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1月中旬，经过艰苦转战，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交界地区，至此，才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开始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实际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也屡次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从创建根据地初始，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就主张“应以关中道的三水、淳化、三原、富平、长武等为主要方向”，^②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

^①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向新集市各机关团体党团活动分子联席会的报告》，1932年6月19日。

^② 《中共陕西省委1932年1月20日给陕甘边境游击队的指示信》，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15页。

1932年3月，以寺村塬为中心的第一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诞生后，在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的强行命令下，陕甘游击队分别南下三原和西府地区创建根据地。结果南下受挫，陕甘游击队不得不退回到陕甘边境地区。5月，为粉碎敌人的重兵“围剿”，中共陕西省委任命刘志丹为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在刘志丹的率领下，陕甘游击队经过9次苦战，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陕甘游击队也发展壮大到1500余人。6月，中共陕西省委再次命令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去创建根据地，结果遭到惨重失败，被迫转移到陇东宁县、正宁一带的游击根据地休整。期间，部队内部出现了南下还是继续坚持北部游击战争的两种意见，为阻止部队南北“分家”，刘志丹、阎红彦等人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统一了部队的思想，最终决定坚持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方向发展，从而避免了部队分裂，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团结。12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主持改编工作的陕西省委常委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杜衡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坚持在陕甘边区创建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党性。刘志丹不计较有无职务，积极帮助部队起草《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他尽一切可能来维

护军队的团结。遇到战斗，则精心拟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争取打胜仗，减少损失。他虽然没有正式职务，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①。

1933年春，在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领导下，创建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6月，杜衡再次以省委名义强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建立渭华根据地，结果导致红二十六军南下遭遇强敌，7月，数战失利后彻底失败，而照金苏区因为没有主力红军的存在而处于危险境地。此时，中共陕西省委以渭北游击队为主体，成立了红四团，在三原、富平一带开展游击战后进入照金。7月21日，共产党员王泰吉发动耀县起义，率起义部队100余人进入照金苏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照金和照金周边地区，还有耀县游击队和数支地方游击队的存在。7月底，出现了杜衡等人被捕叛变、陕西省委被破坏的紧急情况，在陕甘边党政军干部中个别人出现了悲观主义情绪，有些人主张部队分散游击。在红军主力和陕甘各地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部队情绪不稳的紧要关头，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习仲勋、秦武山主持会议。习仲勋等人在会上提出，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把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及其他游击队力量统一起来，积极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开展游击战争。会议所作出的正确决定克服了党和红军部分干部中出现的右倾悲观错误倾向。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成立和积小胜为大胜的游击战术的应用，坚持了陕甘边区的游击战争，保证了党对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正确领导，使陕甘边区的革命事业渡过了非常艰难的时刻。正是在陈家坡会议正确决定的基础上，11月初，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主持召开了包家寨会议，作出了恢复红二十六军、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从而在这一阶段根据地的创建上，有效消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保证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在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进入了大发展的辉煌时期。

1934年7月，陕甘边与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在南梁阎家洼子村召开联席会议，集中讨论如何配合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问题。虽然会上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信中指责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特委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五项错误，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不受这些无端指责的干扰，从革命事业发展角度出发，在会上决定由谢子长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陕北苏区。从积

极意义上讲，阎家洼子会议加强了陕甘边与陕北两地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系，为两个区域协调配合反“围剿”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5年9月，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正处在开展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紧要关头，刘志丹、习仲勋在得悉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接近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后，积极部署用各种方式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但这时，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经历了一次更大的危机。以中共北方局和上海局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成员为主，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取消了中共陕北特委，陕甘晋省委在部署继续反“围剿”工作的同时，作出在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开展肃反运动的错误决定。肃反导致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一大批干部被关押，其中200余人被杀害，造成根据地危机。刘志丹被抓时，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他从通信员那里看到抓捕自己的密令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瓦窑堡说明情况，结果被关押。他在关押期间，坚持实事求是，并告诉被抓的同志：“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①。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党中央、毛泽东得知陕甘革命根据地正在肃反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制止错误肃反，挽救了危机中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解救出了一大批陕甘边和陕北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的党政军干部。一些受过迫害的同志被解救出来后，情绪激动，要求恢复名誉、对肃反者绳之以法。刘志丹说：“不要着急嘛，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的结论。”刘志丹受命东征，即将出发时，他认真叮嘱习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①

从“左”倾和右倾思想路线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表现来看，确实给根据地带来了一次次危害，尤其是肃反，几乎是灭顶之灾。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领导人具有高度的党性，胸怀博大，忍辱负重，严于律己，襟怀坦荡，这样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他们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自觉抵制和努力消除“左”倾和右倾错误对根据地和红军的影响，使整个根据地在经历一次次曲折后，仍然大踏步发展。他们是“硕果仅存”重要组成部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是陕甘边苏区军民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核心所在。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重大贡献。”^①1943年4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践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这一论断不仅是对刘志丹革命实践的高度评价，也是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其他领导人革命实践的高度评价。

三、坚持自主发展，采用颇具特色的“陕甘模式”，构建多区域的大战略布局，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空前发展创造了条件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面临着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是摆在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面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历程中，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认识到，“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要经常调个窝，

^① 习仲勋自述：《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载《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26页。

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①1933年11月初，在合水包家寨会议上，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总结了原红二团终南山失败和渭北心、武区根据地（指以心字区、武字区为中心的根据地）、照金根据地失守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进行武装斗争，只有一个根据地不行，必须建立几个根据地，才能使我军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依靠群众，战胜敌人”，^②这一建立多个根据地的设想后来因成功建立南梁、关中、陕北三块根据地而被毛泽东形象地比喻为“狡兔三窟”，这一大胆设想在斗争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根据地创建方式中颇具特色的“陕甘模式”。根据包家寨会议决定开辟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和关中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的精神，以陕北安定游击队为第一路，陇东地区游击队为第二路，关中地区游击队为第三路开始在更大区域内发展。“因南梁地处第一路和第三路游击区的中间地带，自然地把其余两路连接起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③为指挥上的需要，相应组建起三个游击队指挥部，并在三路游击区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开辟三块根据地。据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南梁苏区为中心，以关中苏区和

^① 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60页。

^② 张邦英著：《片段回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47页。

^③ 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段回忆》，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930页。

陕北苏区为南北两翼，逐渐形成了多区域发展的大战略布局。这种以“狡兔三窟”为布局创建根据地的陕甘模式，方式独特，成效显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构成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的战略大布局，这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成为“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构成因素。

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坚持以南梁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红二十六军首先开辟南梁中心苏区，经过艰苦奋斗，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武装相继建立，以桥山中段的南梁为中心，东到陕北的洛河川，西至陇东的悦乐川，边区、县、区、乡各级红色政权相继成立，南梁中心苏区形成。与此同时，以红二十六军为主力的陕甘边区红军根据陕北和关中南北两翼斗争形势，实施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分别在这两个区域帮助创建根据地。在南线，迅速恢复和扩大第三路游击区，1933年冬，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关中苏区得到恢复和巩固；在北线，红二十六军协助中共陕北特委开辟第一路游击区。1934年，红二十六军又多次派出第三团、骑兵团、第二团和各地方游击队北上陕北，与不断发展壮大的陕北各支游击队并肩作战，打垮了安定、清涧一带敌人，先后在安定、清涧、绥德等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组建了陕北红军独立师第一团，陕北苏区形成。1935年1月上旬，刘志丹亲自率领红

二十六军第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第五、六支队北上陕北安定，与谢子长共同商讨反“围剿”斗争方针和陕甘边、陕北苏区的统一领导问题。1月29日，陕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至此，以南梁苏区为中心区域，关中苏区为南翼，陕北苏区为北翼的多区域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布局完成，为后来陕甘宁边区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反“围剿”斗争中，陕甘模式的多区域发展战略布局显示出它出色的优势，这种布局有利于红军主力部队的集结和回旋，有利于地方游击队主动性的发挥，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有利于红色区域的迅速扩大。

1934年2月，国民党地方部队集结1万余人，向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此时，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仅500余人，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任务非常艰巨。但在第二路（南梁区域）和第三路（关中区域）各游击队和赤卫队的牵制和袭扰下，敌军在这里根本弄不清楚红军主力的位置在哪里，处处被动应战，时时处于挨打和被袭扰的境地。刘志丹亲率红四十二师主力转战千里，游刃有余、机动灵活地活动于南梁和关中区域，作战30余次，歼敌3000余人。至5月底，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

1935年2月，国民党部队集中30个团4万余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其进攻重点放在南梁中心苏区。此时，红军主力部队拥有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约3000余人，但敌我力量对比仍旧十分悬殊。红二十六军主力首先在南梁中心区域作战，在牵制敌马鸿宾、胡宗南、杨虎城等部17个团的兵力后，留地方游击队继续在南梁与敌军主力周旋，主力北上陕北和东线作战，迅速开辟了甘泉、宜川新区；在关中苏区，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主动出击敌后，牵制和扰乱敌人；在陕北苏区，红二十六军主力与红二十七军协同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用5个团的兵力集中打击敌高桂滋部的4个团，形成了局部的战场优势。至6月，红军主力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歼敌5000余人，取得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陕甘边（包括南梁中心区、关中区）和陕北苏区（包括安定区、神府区）连成一片，最终形成了东临黄河，西接环江，南到淳耀，北达长城，包括30余县部分地域的辽阔的红色苏区。

由此可见，多区域发展战略布局，使根据地的南梁、关中、陕北三块战略区域在多次反“围剿”斗争中实现了区域间的协调行动和密切配合，形成了重点区域与牵制区域相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呼应、主力红军与地方

游击队相支持、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有利态势。以“狡兔三窟”为战略布局的陕甘模式，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一时在此一时在彼，是非常有用的，很高明。”^①这种模式被肯定后，在革命发展历程中也得到新的运用。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后，毛泽东将这种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方法推广到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实践中，在发展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开展多方位、多层面的统战工作，团结起社会各阶层，保护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更是得到了全方位、多领域、创造性地应用。从兵运斗争到创建西北红军，从根据地创建到根据地建设，从游击战争到大的战略布局，统战工作始终伴随其中。统战对象中，有国民党军队、地方民团、绿林武装以及在西北民间颇有影响力的哥老会，也有国民党政府官员、地方士绅，还有商人、职员和知识分子等。统战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灵活运用。统战工作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上发挥出了独特而又重大的作用。

^① 颜平：《“狡兔三窟”战术：有备无患胜算多》，载《中国国防报》2003年7月15日。

创建西北红军的过程就是应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过程。1929年5月，在陕北榆林红石峡召开的中共陕北特委会议上，通过了刘志丹提出的“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方针，在创建革命武装的形式上，决定采用“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方式。“红色”，即是以发动组织工农群众为主体，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白色”，即派共产党人到国民党的部队（又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即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使其成为创建红军的基础和武装力量。根据红石峡会议精神，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都积极投身于兵运工作，利用陕甘军阀都有占据地盘、扩充实力的心理特点，广泛团结争取各种中间力量，以“借水养鱼”的方式培养了自己的军事干部，扩大了同盟军，积蓄了革命力量。在争取“灰色”武装（即绿林武装）的方式上，陕甘边的共产党人做的是比较成功的。刘志丹多次深入南梁山区，对活动在这一地区的绿林武装了如指掌。经过观察和比较，他选择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等多支绿林武装进行引导和教育。经过刘志丹等人耐心细致的教育，这些绿林武装头领提高了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他们领导的武装后来成为南梁游击队组成的重要兵源基础。绿林武装也是地方军阀拉拢和收编的重要对象，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就曾以可以当营长为诺拉拢赵连璧，赵连璧则认准要跟着刘志丹。

他对陈珪璋说：我宁愿跟着刘志丹去当兵，也不愿跟你陈珪璋去当营长。杨培盛曾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住投入狱中，饱受各种酷刑折磨，但他宁死不屈，绝不对敌人透露任何关于刘志丹的消息，坚持斗争直至红军来时将他解救出狱，出狱后他担任了庆阳游击队队长，带领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他带的这支队伍很快发展到200余人。当地的民歌中对他追随刘志丹闹革命的事迹也颇多赞扬：“习仲勋、刘志丹、杨培盛、张秀山，他们来到马岭川，组织庆阳游击队，抓枪杆来占地盘。丢掉愁容换笑脸，红旗插上阜城山”。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要巩固、要发展，就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各个阶层和社会团体中广泛建立统一战线，扩大革命队伍，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的敌人。这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的共识。刘志丹说：“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①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组织在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中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努力争取团结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对陕甘一带的各种地方民团也认真进行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制定统战政策，能团结到革命阵营里的就尽量团结，愿意保持中立立场的就尽量使其保持中立，团结朋友，孤立敌人，集中力

^① 《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60页。

量打击最顽固的地主武装。对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统战工作，刘志丹、习仲勋等采取的方式是在尊重他们的基础上，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讲解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闹革命的道理。在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愿意参加革命和跟共产党走的人越来越多，群众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①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政策，也集中反映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制定的“十大政策”上。比如，在土地分配政策上，给富农分给能维持他们生活的土地和财产，这一政策给愿意自食其力的地主和富农一条生路，无疑在根据地内减少了绝对的对立面。对待白军俘虏也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

对民团和哥老会实行的统战政策是陕甘边区统战工作的亮点。陕甘边境一带，地方民团云集，土匪多，帮派多。陕甘边区政府和红军区别不同对象，坚持分化利用和争取改造相结合，对能为我所用的民团、土匪和哥老会等势力，积极予以争取，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和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坚决予以消灭。当时，陕甘边区民间会道门如哥老会、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势力很大，活动面广，其成员大多是劳苦群众，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其采取争取、改造、团结的方针。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当地

^①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哥老会中的绝大多数群众积极拥护党和红军，踊跃参加革命。有的主动向红军捐献枪支弹药，筹粮筹款；有的动员兄弟伙伴参加红军；有的掩护、照料红军伤病员；有的给红军传递情报；有的为红军侦察敌情等。如正宁县西渠哥老会大爷陈某，在当地很有影响，通过与他建立友好关系后，他给红军和游击队提供了极大方便。宜君县小石崖的哥老会大爷、民团团总罗连城，多次为刘志丹游击队解决粮食、枪支弹药和医疗用品。有的哥老会首领在接受革命教育后，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在斗争的风雨中成长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如保安县的哥老会大爷马锡五带领数百人追随刘志丹投身革命，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自己也担任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粮食部部长，后来又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等要职，解放后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华池县南梁哥老会的朱志清被选为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安定县哥老会大爷李仲英率部参加革命，后成为红二十九军军长。对于活动在陕甘一带的土匪，党和政府也采取区别对待、积极争取、分化瓦解、教育改造的政策，但决不允许其在根据地内继续活动。经过陕甘边区党组织教育争取，黄龙山“大王”郭宝珊在庆阳新堡率部起义，参加红军，并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他忠心耿耿跟着刘志丹这样的

共产党人走革命道路，矢志不移，坚定勇敢。当“左”倾错误执行者要求他与“右派”刘志丹划清界限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刘志丹是右派，那我也是右派”。陕甘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被党中央纠正后，郭宝珊跟着刘志丹直接奔赴东征前线。他后来曾任陕甘宁边区三边军分区司令员、警备第四旅旅长、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陕甘边区的统战工作也做到了敌占区，“志丹同志很会利用各种关系为我们开展白区秘密工作。通过志丹同志的关系，安塞、保安县伪政府的不少人经常给我们送来了关于敌人方面的情报。”^①

陕甘边区的民族统战工作也很出色。陕甘边区境内的正宁县龙嘴子、西渠两乡，有回族居民300多户、约2000多人。谢子长1932年在寺村塬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产时，就开始在这里的回族群众中开展革命工作，并建立了长久的联系。由王世平、马彦林等19名回族青年成立的回民支队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被改编为三路游击队第十六支队，后来大部分人员又被编入红一团四连。以回民游击队为基础形成的武装后来成长为关中回民支队，成为新正县党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并在其后的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功，马全德、马全普等指战员先后牺牲，为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回民游击队的成长地五顷塬、龙嘴

^① 蔡子伟：《中共党在陕甘边的统战工作》，载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等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1995年3月内部版，第415页。

子一带，1934年7月成立了乡一级苏维埃政府，这是党的历史上成立的最早的带有民族区域自治色彩的回族自治乡。

为给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对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开展了积极的统战工作，并取得很大成效。杨虎城素具爱国思想，十七路军中一直有中共秘密组织的存在。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教育引导十七路军官兵树立爱国爱民的思想，并用抗日救亡的主张去感化上层人士，争取他们的同情。据习仲勋回忆：“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比东北军还要早。”^①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毛泽东于1935年12月专门派原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秘密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事宜。1936年夏，毛泽东亲自给十七路军的高桂滋写信，晓以抗日大义。9月又派彭雪枫携带亲笔信到兰州，与东北军于学忠部谈共同抗日事宜。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西北军与东北军张学良部先后停止剿共，形成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局面，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

^① 《习仲勋冯文彬谈原十七路军》，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

生并和平解决。应该说，这一有利局面的形成是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长期统战工作基础分不开的。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战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创新的方式方法，也凸显出陕甘边统战工作的特殊功绩。习仲勋对此作过客观的论述：“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用最大力量，去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有往来。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工作都很有成效。”^①

五、坚持根据地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色政权建设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保证。陕甘边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历了由革命委员会向苏维埃政府逐步转变的发展过程。党的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在正式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最初的政权形式是临时性的，临时性的组织形式就是革命委员会。根据这一规定，陕甘边区党组织在红色政权建设上，采取了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先是建立基层群众团体和乡、区、县级红色政权，后在寺村塬、照金、南梁创

^① 习仲勋：《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载《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66页。

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最终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工作方法。

在南梁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和发展的形势下，在南梁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及基层各级红色政权和群众团体陆续建立并开展工作的基础上，成立正式的苏维埃政权的时机渐趋成熟。从1934年夏末开始，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细致地筹备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和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用民主方法选举了各界代表100余名。“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是：按照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界均有代表，照顾到各个方面。这个办法完全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会议期间，完全由代表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的成员，它和过去由群众团体推举革命委员会机构和领导成员的办法有所区别。”^①民众选举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保证了群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得到了群众衷心的拥护。各界代表产生后，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经过代表们认真讨论，大会通过了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多项决议案，用无记名投票的民主程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主席，刘志丹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政府下设土

^① 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段回忆》，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932页。

地、劳动、财政、粮秣、文化、工农监察、妇女委员会。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南梁荔园堡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除正式代表外，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也都赶来参加，盛况空前，老百姓把边区政府的成立作为重大的节日来庆祝。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辖华池、庆北、合水、新正、新宁、荏掌、永红、赤水、淳耀、赤安、安塞、鄜西、鄜甘、中宜、靖边、定边、红泉、赤川等苏维埃县的各级正式或临时的苏维埃政权。这些红色政权的建立，标志着陕甘边区形成了由边区、县、区、乡、村各级政权组成的完整系统的红色政权体系。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推动陕甘边区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前线，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颁布了以“十大政策”为主体的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使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景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得以坚持和发展，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地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始于寺村塬时期，照金时期有一定的发展。陕甘边区土地革命的方针基本上是按照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有关土地革命的指示进行的。1933年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

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谈到土地革命问题：“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祠堂庙宇及反革命富农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种的条件下，分得一份劳动土地。土地应该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考虑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而且要照顾中农的利益，只有在基本农民愿意和帮助之下，才能实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的欠债与租税应立即废除。”^①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土地革命问题，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结合边区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土地革命政策、法令。陕甘边区政府按照各农户的主要生活资料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农民中划定阶级成分，没收地主财产，一部分充公，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富农则只没收出租的土地。在分配时优先照顾红军家属。土地政策的实施，解决了根据地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保证了边区党政军部门的供给，初步消灭了农村中的剥削关系，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热情。

“由于陕甘边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历来就是广种薄

^① 《中共陕西省委1933年3月15日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46页。

收，农民所受的痛苦，首先是土匪、灾荒为害，高利贷、苛捐杂税的剥削”，“土地革命时，群众对于分土地并不感到多大兴趣，而对于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粮、款和租子，则很感兴趣”^①，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制定具体的土地政策上，完全体现了陕甘边地区的这一实际特点。比如土地政策有如下几方面的具体规定：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田、苗一齐分；分土地、牛羊给没有地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阶级划分以生产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决定；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②这些具体政策都完全是根据陕甘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反映出贫苦农民的切实愿望和迫切需要，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边区境内，土地革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豪绅地主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时期的土地政策制定时间较迟，受土地革命初期“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影响小，没有出现一些早期根据地曾有过的杀尽土豪劣绅，严重侵害

① 《刘景范 1959 年 4 月 25 日谈陕甘边苏区创建的历史条件》，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第 406 页。

② 《习仲勋 1945 年 7 月 11 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第 409 页。

中农和富裕中农利益的错误倾向，从而增加了边区土地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使边区人民的生活更加趋于安定。

在发展生产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许多鼓励农民发展生产的措施。由于边区的稳固和发展离不开红军，所以，军粮的供给非常重要，但边区政府以民生为重，对群众不征收粮食，主要依靠收买军粮来供应军队。同时，为适应游击战争流动性强的特点，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粮食；财、粮来源渠道大部分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政府还组织成立了牧场，养猪养羊，以解决部队供给的需要。这些措施减轻了群众负担，对增加群众收入，提高边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政策符合民意，鼓励人民群众加紧生产，保障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连国民党方面的观察员也不得不对边区的生产措施和取得的实际效果发出感叹：“在所谓陕甘边革命区内，十分注意恢复经济，解决穷人吃饭问题。用军保民，用民养军。我们剿共，如忽略了经济，即一切组织，均不能确立。有好的斗士、好的方法，亦不能发挥效力。”^①到陕甘边考察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也记述到当时的情况：“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牛羊予一般农民，反对捐税，反对派款。因此在消极方面，取消了民众的负担，积极方面增加了民众的所有。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

^① 成柏人：《陕北匪祸之再认识》，原载《政治旬刊》1935年11月，现载《志丹书库·刘志丹卷》（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251页。

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①

陕甘边区的周围均为国民党统治区域，国民党政府为加强他们在西北的统治地位，在不断对陕甘边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对陕甘边区实行了经济上的封锁政策。为打破敌人封锁，加强对内对外贸易工作，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开放政策。为了维护流通秩序，使边区金融保持稳定局面，边区政府发行了用布制作的“苏币”，并建立起边区银行，规定一元布币兑换一块银元，保持边区“苏币”的良好信誉，边区内部一律使用“苏币”，发行数量虽不大，但币值很高，商品和货币价格十分稳定，老百姓非常赞成和拥护。在荔园堡、白马庙等地设立集市，与白区商人建立商贸关系，既可以钱物交易，也可以以物易物，以灵活多样的经济贸易形式活跃边区经济。比如，边区政府把边区境内产的大牲畜和山羊以及山货廉价卖给白区来的商贩，鼓励他们把苏区需要的布匹和其它货物想方设法运进来。白区来的商人能够赚到钱，也非常愿意到边区来做买卖。“这样久而久之，有一些商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表现进步了，有时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为我们送货。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地骂这些人是‘通共’。那些进步的商人也很会想办法，设法把钱塞进国民党有关当局和人员的腰包里，便打通了与边区相互来往的通路。此

^① 范长江著：《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72页。

外，我们通过在西安的地下党购买物资，给根据地秘密送来。”^①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施行，赢得了边区内外民众的人心，敌人设在边区周围的关卡并不能发挥有效作用，国民党对陕甘边区的经济封锁被彻底粉碎。

陕甘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欣欣向荣。为提高边区党政军干部的政治和文化素质，边区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学校开设政治、军事、语文、政权建设等课程，先后培训了300多名干部，全面提高了边区党政军干部的素质。针对边区内文化教育不普及，四五百人中找不到一个识字人的现象，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文化委员长蔡子伟等积极发动群众办学校，在荔园堡、合水太白等地陆续创办了陕甘边区的红色学校——列宁小学，进行文化普及教育。学校白手起家，泥土台当桌凳，石板做黑板，自编通俗易懂的红色教材，开设了国语、算术、体育、歌咏等课程。除学校教育外，还在边区办起了16所扫盲识字班和夜校。各类学校的创办，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进一步发展了边区的教育事业。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边区特委、政府还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和《红色西北》刊物。刊物主要登载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消息，尤以红军战讯为最多，刊物的出版受到党政

^① 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段回忆》，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937页。

干部、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为了更多地学习党的文件和了解中央苏区的做法，“中央红军未来前，陕甘边特委印刷处曾大量翻印过中央苏区的书刊”，^①以供陕甘边区党政军干部学习之用。

陕甘边区党组织和政府，始终把廉政建设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不仅自觉贯彻执行边区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也要求边区的干部们都要用廉政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刘志丹教育大家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②。为此，边区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廉政法规和条例，其中一条非常典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以上者执行枪毙。严厉的规定和法令起到了警示作用，在持续不断的廉政教育和法规的约束下，陕甘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没有严重贪污案件发生，政府做到了清正廉洁，做到了爱民为民。边区政府成立初期，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党政军的各项开支主要靠打土豪、分浮财解决，不足部分通过市场向农民购买。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按每人的最低需要发给，除了在工作上的领导、战斗上的指挥外，干部没有特

^① 王子宜：《和刘志丹相处的日子》，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40页。

^②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权思想和特殊化表现。曾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回忆说：“那时候，没有什么特权思想和特殊的表现，形成一种艰苦为荣的风尚。在物质待遇面前，大家互相谦让，互相帮助，同志间的关系十分融洽。”^①

在廉政、高效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边区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政府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并发布了相应的条例。为反对封建买卖婚姻，消除迷信活动，边区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子剪辫子”为主要内容的“六劝”活动，代之用新思想、新文化来教育影响群众，逐渐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边区政府的文化委员会充分利用平凉曲子、陇东曲子、陇东道情、快板书等文艺形式，组织演出，宣传革命；并组织多支宣传队入村入户，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新思想和党的政策。一时间，“穷苦大众一条心，跟上红军闹革命，打土豪呀分田地，穷人能过好光景”的歌声回荡在陕甘边区的沟沟峁峁。

根据地建设的广泛开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地调动了边区群众参加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扩红”的

^① 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段回忆》，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936页。

热潮在边区兴起，人民群众踊跃送亲人当红军。当时，华池县绝大多数的适龄青年都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合水县亦然。新正县人口当时只有1万，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青年就达到1000余人。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红二十六军不断发展壮大，至1934年11月，已下辖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第四团（骑兵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率部在庆阳新堡起义后改编的部队）5个团的编制，边区还建立了几十支地方游击队。

六、坚持群众路线，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了群众最衷心的拥护和最广泛的支持

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人民群众是革命事业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只有维护群众利益才能使革命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时时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与群众心连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当时，《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西北实地采访过程中，曾感慨地说：“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

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①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民心的向背，反映出苏维埃的影响已深深扎进陕甘人民的心田。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幼就生活在群众之中，他们很早就萌发了改变不公平社会的雄心壮志，他们深深懂得陕甘地区的民情和社情，懂得民风的纯朴和蕴藏的革命能量。对此，《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曾作过详细的分析报道：“由于交通隔塞，政治之黑暗，教育之落后，人民生计之困难，陕北、甘东接壤地区之农民，已养成一种反对政府的心理，平日除有提款委员以鞭笞与他们间或相见外，其他可谓与政府无丝毫关系。……故此地素为绿林豪杰活动之区”。^②敢于反抗压迫的民风传统使民众易于接受共产党的革命思想，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关心群众疾苦，引导、实现着民众翻身求解放的迫切愿望，代表着陕甘人民的利益。对此，国民党方面的刊物也曾作过这样的报道：“共党乘机而入，煽动民众，抗交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民听之成理，遂响应之。乱机四伏，共匪丛生，成决堤之水，横溢而不可收拾。”^③

懂得民众心理，关心群众的疾苦，是陕甘边区党和政

① 范长江著：《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72页。

② 范长江著：《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71页。

③ 边民：《陕北共匪猖獗的原因及今后围剿之步骤》，原载《秦风》1934年11月，现载《志丹文库·刘志丹卷》（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240-1241页。

府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在陕甘边区的革命实践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始终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间，以一种甘为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与群众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他们常常深入到群众当中，盘腿拉家常，与群众一个烟袋锅里抽烟，帮助农民耕种秋收，态度和蔼，不论大人小孩都能尊重和爱护。部队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都要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围敌情，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他对陕甘边一带的社会、民情、地形等情况非常熟悉，了如指掌，大家都称他是陕甘地区的“活地图”。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的叫着：“老刘”、“老谢”、“仲勋”。传唱至今的数不清的陕甘民歌就生动地说明这一点，比如就有这样一首：“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跟的是咱刘志丹。老刘站在山上喊一声，咱们千家万户齐响应。”^①就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承认：“刘（志丹）非一般之草寇，有理论、军事、经济头脑，更有煽动之技巧。第一次听了他的演说，就深信不疑。颇有人缘，老幼称颂。看起来刘是解决民众吃饭问题，而其更有推倒民国之深意。可惜各级官吏视而不见。”^②历史证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巩固，与党和红军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有

① 杨正发编著：《南梁之光》，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46页。

② 边民：《陕北共匪猖獗的原因及今后围剿之步骤》，原载《秦风》1934年11月，现载《志丹文库·刘志丹卷》（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241页。

着紧密的内在的联系。

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工作方法。群众工作包罗万象，既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也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具体问题，还有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既有根据地内部的问题，也有国统区的问题；既有创建根据地时面临的问题，也有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时的问题。陕甘边区党和政府总是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因势利导，有效开展工作，保证了群众工作能够落到实处，迅速取得成效。

在南梁根据地初创时期，习仲勋、张策等采取挨门挨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带领游击队打土豪，分牛羊、财产、土地，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每到一个地方，领导群众进行分粮、分地、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这些有组织有目标的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得了不得。”^①在发动群众的基

^① 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段回忆》，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935页。

基础上，苏区广泛建立了群众团体，“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民团、雇农会等组织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①并进而扩大区域。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对苏维埃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陕甘边区的游击战争、扩大红军与土地革命等方面均起了很大作用。

为争取更多的群众支持革命，进一步扩大革命阵营，陕甘边区党和政府主动将群众工作做到国民党统治区里，起到了消除“红白（指红军和白军）对立”的积极效果。“当时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十分困难，我们就用单线联系的方法，以严密党的组织，主要任务是调查敌情，培养骨干。在彬县、旬邑、宜君和正宁县城内从广交朋友、拉关系入手，经过许多周折，大体上掌握了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随之大力选拔了一批贫雇农积极分子，作为开展活动的基本力量，还团结了除反动的地主分子以外的开明人士。对地方上的老知识分子也进行争取和团结，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②共产党的威望树立在了国统区人民的心中，当时在群众中就流传着“天旱望雨水，人穷望志丹”的歌谣。在危险的战场上，国统区的群众也心向红军、支援红军，“当时，国民党军打仗，总拉老百姓用毛驴驮子

① 张策：《陕甘边根据地南梁苏区的开辟》，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00页。

② 《郭廷藩1985年7月谈陕甘边南区、新正县》，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451页。

弹、粮草。我们在前面和敌人一开火，老百姓就拉着牲口朝后边跑，送给红军。”^①

陕甘边区的群众工作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②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称赞谢子长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从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陕甘边区的群众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正是因为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和边区政府与群众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所以在危险袭来时，边区的人民群众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着他们。1934年5月，陕甘边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部和谭世麟部的陇东民团军共1000余人侵入南梁中心区。阎家洼子村的老百姓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武生荣的率领下，连夜将红军留下的60余支枪、40余套马鞍、马蹬及十余石粮食、2000多颗鸡蛋、数千枚铜元全部埋藏在地里

^① 杨培盛：《和老刘在一起“闹红”的日子》，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30页。

^② 王首道：《中央为刘志丹平反》，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407页。

面。第二天，一路烧杀抢掠的敌人进了阎家洼子村，发现了埋藏地点，并挖出了鸡蛋、粮食、马蹬，为保护埋得更深的枪支和经费，村民武万有冲到敌人面前大骂这些强盗，被敌人打得昏死过去，扔到野地里，后被群众发现救活，却留下终身残疾。随后敌人将牛望台、九眼泉、金岔沟、二将川等村庄的干部、游击队员、农民群众集中在阎家洼子村，逼问红军去向和财物埋藏地点，但始终没有人开口，恼羞成怒的敌人用铡刀铡死金岔沟农会主席白阳珍等6人，面对敌人的淫威，被抓的群众宁死不屈，先后有42人惨遭杀害，但敌人一无所获。1935年4月16日，边区政府机关人员在习仲勋率领下在张岔岭一带转战时，被敌人包围，习仲勋指挥军民英勇反击，并部署机关和群众先行转移，赤卫军副总指挥梅生贵奉命率领赤卫军阻击，阻遏敌人的进攻，掩护政府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最后梅生贵等赤卫军指战员被敌人层层围住，战至只剩他一人，因右腿中弹被俘，最终被敌人杀害，时年仅33岁。敌人将梅生贵头颅悬挂在荔园堡城门上示众，赤卫军战士和乡亲们含着悲愤的泪水，用木头仿雕了一颗英雄的头像，为其收尸安葬。在陕甘边苏区，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这充分证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得到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呵护和拥护，就能看到这种血肉联系的深情，不惜生命的无私付出。

综上所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功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原因昭示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延续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理想的落脚点，为后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中央决定将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这块红色区域，从此，中国革命步入新的里程。

对中共中央和中央有关部委关于解决 陕甘边、陕北问题若干文件的解读*

核心提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全国革命根据地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过程中，既有与全国各根据地共有的发展规律，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经验；既取得了胜利的辉煌，也经历过千难万险；既有毛泽东创立的“武装割据”正确道路的指引，也经历了“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干扰和危害。研究和总结这段历史，从中得出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借鉴，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一项重要的党史研究工作。对中共中央和中央有关部委关于解决陕甘边、陕北问题若干文件的解读，旨在通过对这些文件的梳理，研究一些历史问题，力图用第一手材料来加深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问题的认识，提高研究质量。

一、关于《中共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 (1935年11月26日)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甘革命

* 因多个文件尚未公开出版，本文只从研究角度出发进行解读，不全文引用文件。

根据地。此时，根据地内部正经历一场严重的肃反危机。起因是：1935年7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六届五中全会候补中央委员）派朱理治到陕甘苏区领导工作。9月，红二十五军也来到陕甘苏区。朱理治和后来到达陕甘苏区的上海局代表聂洪钧及红二十五军政委、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程子华组成中央代表团。根据中央代表团的意见，取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以朱理治为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聂洪钧为军委主席，徐海东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高岗为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为副主任。朱理治来陕甘苏区前就接受了孔原“肃清陕北右倾机会主义”的指示，到陕甘苏区后又偏听偏信，错误地认为陕甘边、陕北党政军领导有严重问题。9月21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决定开展肃反运动。肃反分后方、前方（在劳山一带），后方由郭洪涛负责，前方由聂洪钧负责，并成立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由戴季英任局长。错误肃反导致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一大批陕甘边、陕北党政军干部被关押，其中200余人被杀害，造成根据地人人自危的严重局面。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吴起镇。20日，毛泽东首先听取了陕甘边游击队第二路政治委员龚逢春的汇报，龚逢春是第一个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反映陕甘苏区

肃反实情的陕甘苏区干部。^①10月22日，毛泽东派贾拓夫携带电台率领一部红军前去寻找西北红军，李维汉也一同前往。10月底见到了程子华、郭洪涛。郭洪涛随即向李维汉汇报了陕甘苏区肃反的大致情况，李维汉、贾拓夫立刻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②11月2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抵达甘泉县下寺湾，毛泽东等人十分关注陕甘苏区的肃反问题，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秦邦宪）等一起与聂洪钧、程子华、郭洪涛见面，听完汇报后，毛泽东说：“肃反是错误的，是逼供信搞出来的。”^③张闻天、毛泽东都表示要立即停止肃反，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带着无线电台赶到瓦窑堡调查全部情况。11月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聂洪钧、郭洪涛关于陕甘苏区、红军历史以及现状的报告，周恩来提出：肃反有问题，需要调查解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五人党务委员会负责调查了解陕甘苏区肃反情况，董必武兼主任，该委员会由博古负责指导。11月4日，朱理

^① 还有一说是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景全第一个向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汇报肃反一事。

^② 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371页。

^③ 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78页。

治赶到下寺湾向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等人汇报。朱理治说：这次肃反“两方面都有错误，我们搞刘、高是错误，刘、高右倾并受右派利用也是错误。”^①

11月5日，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共陕甘省委、中共陕北省委，朱理治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郭洪涛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同一天，时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等抵瓦窑堡，王首道将从戴季英那里接手的肃反材料整理后上报中共中央，并看望刘志丹，让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红军接管关押刘志丹等人的监狱，允许互称同志，还改善伙食，不准打骂被押人员，严格登记被押人员随身带来的物品。11月7日，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宣布释放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杨森、杨琪、刘景范、任浪花、高锦纯、赵启民、胡彦英、孔令甫、黄罗斌、郭宝珊、朱奎、王居德、高朗亭、王家娃等18人。11月18日，毛泽东会同周恩来、彭德怀专门致电张闻天、博古，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②并提出要纠正肃反的错误。博古接到来电后立刻督促五人党务委员会尽快完成甄别调查工作。

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

^① 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13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488页。

出台。《决定》认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混淆了斗争的目标，分散了斗争的力量，肃反工作中的粗鲁和疏忽，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决定要求，立即改组陕甘晋省保卫局，纠正肃反中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张浩、贾拓夫、王首道、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刘志丹、高岗、杨森、杨琪、杨和亭等人，会上宣读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给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人平反，刘志丹当众讲话：“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①同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对戴季英作出最后警告、对聂洪钧作出严重警告的处分决定，并认为“这种错误的责任，应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二同志负责之。”^②

^① 罗迈：《初到陕北》，载《中共党史资料》第十四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5页。

^② 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138页。

复出后的刘志丹先后担任中央军委驻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为周恩来）、瓦窑堡警备司令、红二十八军军长，习仲勋先后担任关中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共环县县委书记，原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担任赤安县委组织部部长，原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担任红二十八军副军长，原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担任三边独立营营长，王世泰（肃反期间他因养伤幸免被抓）任安塞县委军事部部长，黄罗斌任清涧县委军事部部长。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任劳任怨、尽忠竭力。其中刘志丹、杨森、杨琪三人后来都在东征战役中壮烈牺牲。

《中共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台的，由于对肃反的深层次原因缺乏调查研究和认识，所以《决定》中留有错误的论断，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陕甘苏区存在着以黄子文、蔡子伟为首的反革命小组，假借着党与苏维埃公开的名义，戴着‘红帽子’混入边区南区与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机构，一方面夺取党与政权的领导机关，公开散布右派取消主义的主张和影响；另一方面秘密地进行挑拨离间与一切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造成边区党与陕北党的对立，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的猜疑，来破坏党的一致与削弱和瓦解革命力量的团结”；二是认为“陕甘晋省委领导的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

的，正确的”。^①这些论断使得陕北、陕甘边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导致后面各个历史时期的不断争论。同时，也影响到陕甘边根据地一些干部的使用。李维汉曾经回忆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②

二、关于《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42年12月20日）

西北局高干会议是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召开的重要会议。1942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加强陕甘宁边区工作和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议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党、政、军工作；王稼祥负责军队编制工作；西北局高干会议由任弼时、王稼祥负责指导。会议决定由陕甘宁边区系统党政军干部参加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于10月中旬召开，内容是整党、整财、整政、整军、整军民关系，以实现整顿三风、精兵简政两个目的。9月1日，西北局发出召开高级

^① 《中共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载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72页。

^② 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373页。

干部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整风、统一党政军民领导、精兵简政、财政经济等问题。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延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266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209人列席了会议。

从11月2日开始，会议关于整党问题由分组讨论转为结合西北党的历史进行整风的大会讨论。

在长达十几天的大会讨论中，贾拓夫、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阎红彦、马文瑞、张邦英、王世泰、霍维德、贺晋年、李赤然等46人先后在大会上发言。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发和批判党内“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郭洪涛、朱理治、戴季英等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也在会上作了检讨。11月17日和18日，高岗代表西北局作了约3万多字的《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长篇报告，报告分六个部分：（一）陕西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代；（二）国共分家到九一八事变；（三）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以前；（四）肃反事件；（五）肃反事件以后；（六）结论。后来到1943年6月25日，西北局又作出了《关于高干会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该决定说：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

1942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出台。《决定》解决了1935年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未解决的问题,对一些错误提法进行了改正,肯定了刘志丹等人坚持的路线是正确的。

一是定性陕北肃反是完全错误的。《决定》指出:“中央根据十月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于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1935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误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而1935年的决定则认为陕北肃反是“正确、必要”的,但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二是重新认定了陕北肃反错误的主要责任人。《决定》在列举了肃反过程中的一些史实后指出:“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应该负最重要的责任。”“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本应开除党籍,估计他们曾为党作过一些工作,本着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予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撤销朱理治同志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之职务,撤销郭洪涛同志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并限定朱、郭二同志在三年以内不能担负重要的党的工作。”

三是维持1935年11月30日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两人处分的意见。《决定》指出：“因为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是当时‘肃反’的坚决赞助者和执行者，而他们在高干会上对自己错误之承认也还是不坦白不诚恳的。现在中央认为中央（当时称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30日的决议，对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的处分（给戴季英同志以最后警告，给聂洪钧同志以严重警告）仍然是有效的。”

四是增加了程子华的责任。《决定》指出：“同时也应当指出：程子华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也应负一些责任。”

五是认为刘志丹、高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认为朱理治、郭洪涛执行的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取消1935年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对于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领导者所执行的路线之估计，如“陕甘边区南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把许多只犯错误而没有犯罪实据的同志逮捕起来”。^①《决定》认为“这些估计现在证明都是错误

^① 《中共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没有发现这些话语，我们现在看到的文件可能不是原版本。

的”。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与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是解决陕甘问题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它产生于延安整风运动中，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澄清了许多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对刘志丹等人依靠山地、农村发动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路线的做法的肯定，对陕甘边革命斗争正确性的肯定，对提升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决定》对中央1935年11月26日决定中一些错误提法进行了纠正，还原了历史，解决了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使陕甘苏区肃反的性质和责任等重大原则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结论。对统一思想、增进党内团结都有重要作用。《决定》成为解决陕甘革命根据地历史问题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对深化陕甘革命根据地历史问题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但要指出的一点是，《决定》对历史上发生的路线错误着重强调某些个人的责任。整风会议集中火力的揭发批判中也有对个别人过火的指责。《决定》指出郭洪涛等人是“有意陷害同志”，所以，被处理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觉得委屈，对这次结论并不完全接受。

西北局高干会议虽然有结论，中共中央也作出重新审查决定，但仍然“有人对一九四二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

议有不同意见，对西北党史另有一套说法，否定《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这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七大代表和一些西北的干部中引起争论。”^①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减少分歧，增进团结，在七大闭幕后不久，1945年7月，中共西北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延安召开了西北党史座谈会，专题讨论陕甘苏区肃反问题。

朱理治在会上作长篇发言，讲述肃反始末，说清事实，承认错误，得到了大家的谅解和欢迎。经过与会者的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人的认识趋向一致，认为《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是正确的。

三、关于《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要点》（1959年11月23日）

1954年“高饶事件”发生，高岗自杀，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分子”。1956年9月，郭洪涛向党中央提出书面申诉，并附上程子华同志1943年春给中央的电报、1943年郭洪涛与任弼时谈话底稿和1944年11月13日中央党校一部

^① 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155-156页。

三支部小组通过的《审查郭洪涛同志历史结论及思想上的意见》等材料，请求中央审查。“促使郭洪涛等人提出申诉的是自1941年起，高岗就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中央审干委员会委员，位高权重。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制定“肃反”问题的《决定》，高岗都是主要主持人。”^①

针对郭洪涛的申诉报告，1956年10月，中央书记处指示成立审查委员会，1957年6月，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持的审查委员会成立。1958年12月，中央监委于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在武昌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监委对郭洪涛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稿。会议由中央监委副书记刘澜涛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安子文、王从吾、马明方、贾拓夫、习仲勋、王首道、程子华、马文瑞、张达志、陈正人等10位同志。

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形成《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1960年4月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

《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要点》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郭洪涛对陕甘苏区错误肃反负有政治上的责任，但不是肃反的主持人。《要点》指出：“1935年陕北肃反错误是严重的，铸成这一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郭洪

^① 王晓中：《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

涛同志当时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他向上级和代表团反映了一些不完全真实的情况和错误的意见，对陕北错误肃反也负有政治上的责任。但是，就整个肃反过程来看，郭洪涛同志不是肃反的主持人，没有诬害刘志丹等同志的意图，也不同意把刘志丹当反革命处理。在肃反初期，朱理治同志向郭征求意见时，郭说：‘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是反革命，’并向王首道同志表示过类似的意见。”

第二点，郭洪涛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要点》指出：“1935年10月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接近陕北时，朱理治、郭洪涛同志同意程子华同志的建议，主力部队向南出击，调敌北移，以保卫陕北根据地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当党中央到达陕北边境时，郭洪涛同志亲自去迎接，后来并发动群众去迎接。这些情况表明，郭洪涛同志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

第三点，1939年山东湖西地区错误肃反郭洪涛没有责任。《要点》指出：“根据罗荣桓等同志证明，1939年山东湖西地区错误肃反另有原因，不是郭洪涛同志对当地干部采取宗派主义打击政策的结果。当山东分局得知湖西肃反问题后，罗荣桓、郭洪涛等同志即迅速前去制止。”

从上述三点看，中央监委的审查意见并不是对《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

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的否定，只是根据郭洪涛的申诉和调查研究结果对涉及到郭洪涛的具体几个问题进行了更正。对于路线问题，《要点》指出：“有关陕北特委和郭洪涛同志1933年到1935年的工作路线问题，留待以后研究陕北历史问题时解决。”在2004年出版的《郭洪涛回忆录》中在使用中监委几点意见的同时，又有一句：“因此，1942年《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与事实不符的结论，都应该修改。”至于这句话是否是中监委意见，尚需查证。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中监委文件，是1978年12月21日由中央组织部转发的《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要点》，而没有看到1959年11月23日的《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一个是要点，一个是意见，此处存疑。

至于1978年中央组织部为什么要重新转发这个文件，仍然与郭洪涛有关，中组部(78)组通字36号通知里说：“1977年，郭洪涛同志提出，希望中组部就中央监委1959年11月23日对他的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发个通知，以澄清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有关他的几个历史问题的认识。”中组部考虑到中央监委的审查意见当时只发给个别同志和郭洪涛同志本人，党内很多同志包括一些编写党史、军史的同志并不了解文件本身，因此同意了郭洪涛提出的要

求。中组部转发之后，郭洪涛给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写信，要求在甘肃省内转发。经宋平同意，在甘肃转发了此文件。

四、关于《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1959年11月23日）

1959年中央监委重作结论的还有朱理治。缘由是：1958年8月19日，朱理治在承认陕甘苏区肃反错误的前提下，对在陕甘苏区肃反中自己所犯错误的评价问题，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是否有意陷害问题，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等问题，向中央提出了申诉，要求对西北局高干会议结论进行重新审查。

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作出《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1960年4月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

《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主要涉及朱理治在1935年陕甘苏区肃反事件中所犯错误的性质和所谓“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两大问题。《意见》指出，陕甘苏区肃反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朱理治作为主要负责人，“政治上应负主要责任”。“他的错误性质，主要在于积极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和上级对肃反的错误指示，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片面性……但是，他的错误还不是出于个人对刘志

丹、高岗的阴谋陷害。因此，我们意见，朱理治同志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向中央提出的申诉，说他在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事件中，逮捕刘志丹、高岗并非出于有意陷害，是符合事实的”。“朱理治同志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当时的做法如果有问题，也是属于如何迎接中央的方法问题。因此，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重新审查的决定》中说朱理治等同志拒绝前方同志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提议的结论，与事实不符，应该修改。”^①

五、关于《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1979年8月4日）

文件出台的历史背景：长篇历史传记小说《刘志丹》创作始于1956年，作者李建彤，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1946年和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结婚。曾先后任职中央监察部专员和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她应工人出版社之邀开始创作这本小说。

1959年，小说第三稿送到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手中，习仲勋阅稿后认为没有写好，向李建彤表示不同意写《刘志丹》小说，但李建彤说王世泰、张秀山、马明方、马文瑞是支持的。刘景范、马锡五也向习仲

^① 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432页。该书全文刊载了《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

勋表示了相同的意见。习仲勋“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①1961年《刘志丹》修改稿送习仲勋处，习仲勋太忙委托秘书田方审读，田方只对文字和技术性问题提出意见并报告习仲勋，习仲勋先后两次约见马锡五和李建彤及该书编辑，希望对书稿中某些涉及西北党的历史的问题做妥善处理。之后，李建彤赴陕甘宁老区深入生活，于1962年改出第五稿，送中宣部审查，同时送习仲勋处。此时，《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开始连载该小说，但习仲勋并没有看过这些章节。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收到小说样稿后，对小说提出批评意见，认为书中反映的许多问题与历史不符，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负责人提出意见，要求停止连载，并约请李建彤谈话，但李建彤没有听从阎红彦的意见。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其它报刊也陆续停止刊载。8月17日和9月3日，阎红彦分别给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写信。信中说：我觉得小说《刘志丹》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利用宣传刘志丹的名义，宣传高岗。建议将此书发给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西北老同志看看，并建议由中宣部组织座谈会，谈谈该书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

就在此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开始插手这件事。8月24日，康生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刘志丹》

^①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5页。

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①9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阎红彦在西南组发言时提出小说问题，认为《刘志丹》小说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宣传高岗，并武断地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9月中旬开始，会议各组在批判彭德怀的同时开始批判小说《刘志丹》。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②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上一张写有“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纸条，毛泽东在会上念了条子，并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③毛泽东后来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④9月27日，成立“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096页。

②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5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770页。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096页。

会”，康生任主任。全会对小说批判的主要内容是：伪造党史，把陕甘边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刘志丹思想，企图以刘志丹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①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被打成反党集团，“文革”前后此案进而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李建彤被开除党籍，准备送去劳改。对《刘志丹》小说和习仲勋的审查一直延续到70年代，因此受牵连的党政干部达300余人。^②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大量的冤假错案陆续得到平反纠正。邓小平批示重新审查《刘志丹》小说一案，中央组织部于1979年7月14日向中央呈送《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一）小说是工人出版社约稿，与习仲勋无关；（二）康生说习仲勋是此书主谋，是“第一作者”，没有根据。说习仲勋企图在小说中把陕甘边写成是“中国革命的正统”和“中心”，作为“篡党篡国的纲领”，全属诬陷不实之词；（三）习仲勋在审查时向党说明真相，不承认康生强加罪名，是实事求是的表现，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不应以此定案。《报告》认为，《刘志丹》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

^① 贾巨川：《习仲勋冤案始末》，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

^② 贾巨川：《习仲勋冤案始末》，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

史的小说”。^①《报告》指出：“小说《刘志丹》案件，纯属康生制造的错案，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发展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应予彻底昭雪平反。”1979年8月4日，中央批转这个报告，指出：“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

六、关于《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1980年2月25日）

198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认为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提法，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一概推倒。

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通知》叙述了此案发生的过程：“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指控小说《刘志丹》是反党文艺，为高岗翻案。会后，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对给小说《刘志丹》提过意见、提供过材料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同志进行了审查。他们在受审查和批判的过程中曾被说成是‘习仲勋反党集团’、‘习、贾、刘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对他们继续进行审查，并进

^① 中发〔1979〕53号文件。下同。

一步株连了马文瑞等同志。”^①《通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组织部对这一历史遗留案件进行了复查。中央已于1979年8月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并于1979年6月批复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贾拓夫同志的复查报告，1980年2月批复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习仲勋、刘景范同志的复查报告。上述报告说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同志都不存在所谓反党问题，他们之间是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通知》强调：“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62年以后审查他们所形成的一切诬蔑不实的结论意见和材料，应予否定。对因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问题受到株连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均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七、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通知》（1983年7月13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和中央对党史工作的重视，一批老同志开始撰写回忆录。而郭洪涛发表的一些回忆文章又引起西北历史问题的再次争论。“此事由部分历史当事人对郭洪涛关于历史问题的说

^① 中发〔1980〕19号文件。下同。

法和公开发表的文章有意见而引发”。^①张秀山等人还直接给中组部和中共中央写报告，要求澄清历史事实，认真处理西北历史问题。

198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五人小组，会同原在陕北及陕甘边工作过的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等共同研究西北历史问题。经过多次座谈会讨论，五人小组形成了题为《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报告。6月9日，中央书记处听取李维汉的汇报，讨论并原则同意五人小组的报告，并再次重申：过去文件中凡有与此报告相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一律作废；在1935年错误“肃反”中被害的同志，尚未得到平反昭雪的，一律正式平反昭雪。中共中央于7月13日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通知》（中发28号文件），并附《两方八位同志对〈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意见》。

《通知》指出：“对于西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根据地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发生的错误肃反问题，我们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指出其错误的严重危害，另

^① 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434页。

一方面必须看到产生这种错误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根源，看到事情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犯错误的同志也接受了教训，几十年来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不应再着重个人责任。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其中弄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旨在最终结束这种争论。中央认为这是很对的。”“过去文件中有同这个文件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应以这个文件为准。”《通知》特别指出：“对于一九三五年错误肃反中被错杀的人，还未昭雪的，应一律由中央组织部或民政部予以平反昭雪。”

这个文件基本上坚持了延安整风时期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结论。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文件指出：“陕北、陕甘边的党、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立下了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的史册，不幸，1935年九、十月间，发生了错误肃反，使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只是因为党中央的到达才得到挽救。”“当时王明‘左’倾路线正统治着全党，即使是走向胜利发展的地区，也很难免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和干扰。”从这点看，路线是非的总账是算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上。

第二个问题，关于错误肃反问题。文件指出：“1942

年中央直接领导的西北局高干会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文件分析近几年引起争论的原因有三点：一是1959年《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虽然审查意见对朱理治、郭洪涛拒绝迎接党中央和郭洪涛在山东肃反问题应负责任两个问题上作出的改正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把错误肃反和路线是非分开处理是不妥当的。文件认为，1959年《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和1978年中组部转发的《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要点》的下达，引起了在党史教学、研究及社科研究和某些范围内的思想认识上的不一致。二是郭洪涛发表的《陕北烽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坚持他在陕北执行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引发一些老同志的不满。三是《西北红军战史》一书的创作中有一些不符合史实的、错误的叙述和论断。

第三个问题，关于郭洪涛与王明“左”倾路线的关系问题。文件肯定了有三点是与郭洪涛有联系的。第一点，郭洪涛是王明控制的中央驻北方会议代表派到陕北参加特委领导，负责纠正特委执行富农路线和对武装斗争消极的错误，推行“左”倾路线的。第二点，郭洪涛拥护1934年7月阎家洼子会议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对陕甘边区特委的指责，朱理治、聂洪钧材料中都提到他们被派来陕北反

右倾是根据郭洪涛提供的情况。第三点，郭洪涛对于刘志丹同志所说的一些错误的话是错误肃反的根据之一。文件结论是：“郭洪涛同志在那一段期间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对待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是严重的‘左’倾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文件也指出：“我们相信，在逮捕张秀山同志后，郭洪涛同志说过：‘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以后又说过‘不是有意陷害他们’的话。（我们认为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等同志都不是有意陷害）。”^①

郭洪涛最终同意五人小组的上述结论。28号文件对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冯文彬说：“在中央的指导下，五人小组胜利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对于解决几十年来在有关同志中一直有争议的西北历史争论问题，促进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也为解决党内历史争论问题提供了范例。”^②

报告提议，有关同志应把一切有碍于党的团结的争论，特别是在党外进行的争论终止下来。至于杀错的人，一律由中组部和民政部平反，不要再算细账。对西北问题的认识，都应在这次座谈会的一致认识为准。凡不符合这一精神的文件、文章，不能再扩散。凡是有关这一段历史的党史、军史著作，都应交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

^① 引文内的括号内容是文件本身内容。

^② 《冯文彬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56页。

八、关于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情况》的通报（1984年2月24日）

1978年4月9日，朱理治患晚期肝癌去世。1983年3月15日，朱理治夫人苏菲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上，高岗为了抬高自己，对理治同志罗织罪名，无限上纲，说刘志丹同志和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理治同志阴谋陷害他们造成的，还说理治同志反对迎接中央红军等等。对这些污蔑不实之辞，理治同志一直不服。1958年，理治同志根据您的指示（是您要王首道同志转告的），向中央提出了申诉，中监委经过认真调查，作出了《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推翻了那两个伪造的罪名，并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得到了正式批准。但是最近几年，一些报刊上的回忆文章乃至电影、戏剧等文艺作品在提到陕北肃反时，仍然不点名地说他有意陷害。因此，恳请您批示中组部将1958年中监委的《审查意见》^①印发给党史研究和宣传文艺部门，以便他们在写这段历史时，能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处理这个问题。”“现在有人坚持把那些已被中央澄清了的问题继续扣在他头上，讲他是野心家，并通过文艺作品加以丑化。我认为这样对待一个为党奋斗了一生的老同志，是不公平的，也是有悖于中央关于对历史问题不宜纠缠的精神的。”5月21

^①中监委的《审查意见》应是1959年。

日，邓小平在苏菲的信上批示：“请中组部办理”。^①

1984年2月24日，中组部发出《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情况》的通报。通报共分四个部分。前两个部分根据中央监委和五人小组的结论，明确指出朱理治不存在所谓“有意陷害”刘志丹等人的问题，也不存在所谓“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通报在第三部分指出：朱理治同志对他在陕北所犯错误一直表示沉痛，作过多次检查，态度是诚恳的，也接受了教训。他自1927年入党后，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贡献，把一生献给了革命。通报在第四部分规定：中央指出，今后对西北党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应以《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来统一认识。过去文件中有同这个文件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应以中央〔1983〕28号文件为准，遇到和党中央〔1983〕28号文件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应经过中央或中央授权机关审查后发表，不允许轻率地公开争论。^②

是年，苏菲看到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解放军将领传》第一集《刘志丹》中，有关陕甘苏区肃反和朱理治的

^① 上述引文均出自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435页。

^② 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该书全文引用了1984年2月24日中组部发出《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情况》的通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436-437页。

内容不符合中央文件精神，于是给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写信反映。8月16日，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致函苏菲：

我们经请示领导，并和有关方面作了研究，决定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写一《说明》，夹在未出厂的图书中，或在《星火燎原》杂志公开发表；第二，明年再版时，做文字处理。^①

九、关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1986年5月21日）

从《军事辞海》中查到对《中国工农红军西北红军战史（草稿）》的解释是：“西北红军战史编写委员会办公室编写。1965年8月内部印发。全书13.1万字，共分5章，记述了西北红军从1931年诞生，到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的4年多时间里的发展过程和战斗经历，后附西北红军大事记、发展沿革表、战例选编及重要历史时期和作战行动的要图。该书对于研究西北红军战史有参考价值。”在中央28号文件中，此书名为《西北红军战史》，并认为该书存在一些不符合史实的、错误的叙述和论断。

1986年第8期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党史通讯》

^① 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437页。

上，登载了《关于西北红军战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在编者按中说，“遵照胡耀邦同志指示，冯文彬、宋时轮同志于1985年9月4日至10日，邀请原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工作的部分领导干部，对《西北红军战史》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及如何处理进行座谈。会后，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就这次座谈会的内容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央同意这个报告。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通知中说：‘这个《报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西北红军历史上有争议的几个问题，统一了认识。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会后对西北红军历史有关问题的提法，应以这个《报告》为准。’”由此可知，这期通讯登载的《关于西北红军战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登载了《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的主要内容。

《报告》指出：“《西北红军战史》是六十年代前期由兰州军区党委组织编写的。一九六五年脱稿后，没有经过有关机关领导审定，也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但在一定范围流传过。这本战史是收集整理和研究了大量史料写成的，对进一步研究西北红军历史有不少参考作用。但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书中确有如中委会〔1983〕28号文件所指出的：‘存在着一些不符合史实的、错误的叙述和论断’。”鉴于编写全军军史的工作已着手准备，“因此，这

本《西北红军战史》可不再组织力量进行修改，现有的也不要再扩散，更不能作为分析研究西北红军历史的根据，只能留给有关单位研究我军战史、军史时参考”。

《报告》认为，通过座谈，已经取得或基本取得一致认识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个问题，关于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的性质问题。《报告》认为，“这两支游击队当时都有党的领导。它们的斗争矛头都是指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地主豪绅的，后来它们都是组成西北红军的基础。因此，尽管当时部队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部队的番号也有不同的叫法，但应肯定这两支游击队都是党领导的武装。”

第二个问题，关于反帝同盟军第一支队缴第二支队枪的问题。《报告》认为，“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去追究个人责任。”

第三个问题，关于“南北分家”的问题。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地区作战失利，部队情绪波动，游

击队政委李杰夫和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黄子文提出，愿意南下者跟他们走，愿意北上者跟刘志丹走。《报告》认为，“后来‘分家’没有成为事实，没有造成部队分裂的严重后果。当时，刘志丹、阎红彦两同志都反对‘分家’，对于纠正这一错误，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至于谁起了主要作用，就不必再过细计较了。”

《报告》同时指出，座谈会认识尚未取得一致的问题有两个，一是1935年2月5日西北军委成立时是刘志丹还是谢子长任军委主席？二是1933年12月，谢子长到达陕北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陕北的军事特派员还是派驻陕西或西北的军事特派员？《报告》认为：“第一个问题，在没有找到足以说明问题的原始资料之前，似可采取暂时回避的办法，只写成立了西北军委，不写由谁担任主席，也可两说并存，写作刘志丹任主席（一说谢子长）。第二个问题，军事科学院在座谈会以后，按照会议上的提议，派人访问了当时中央驻北方代表秘书长李华生同志。李说：‘谢子长同志是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因此，建议在没有找到可靠文字材料之前，似可暂取李华生同志的说法。”

《报告》明确指出，对于历史问题的争论，要从全局上和根本上来看。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除了路线是非必须分清以外，对其他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歧不要再纠缠

不放。今后对西北红军历史的研究和探讨，都应本着上述精神，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把有碍于党的团结的争论，特别是在党外进行的这种争论，一概终止下来。

十、相关问题

（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有关陕北问题的注释的修订

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有一条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注释：“一九三五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十一月（应为十月），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同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①

这个注释实际上是把《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的基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00页。

本结论公之于众。

对注释问题，朱理治和郭洪涛都有不同的意见。《朱理治传》记载：“1964年10月16日，刘少奇与朱理治、李雪峰等人谈话。朱理治借此机会向刘少奇提出了《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肃反的注释问题。刘少奇明确表态：‘毛选注中有错要改。’”^①

《郭洪涛回忆录》中记载：“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以后，王首道同志(当时他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我任副主任)向刘少奇同志反映：‘我是负责审查陕北的错误肃反问题的，知道郭洪涛不是错误肃反的主持人，而是反对逮捕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红二十六军老干部的。《毛泽东选集》注释中，将郭洪涛与朱理治联系到一起是不对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重新审查。’少奇同志表示：党是实事求是的，不对的可以重新审查。少奇同志告诉了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写信给王首道和我，说中央同意重新审查我的几个历史问题，由中央监委处理，要我将有关材料直接送中央监委。”^②

1991年再版《毛泽东选集》时，有关方面修改了关于陕北肃反的注释：“一九三五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据地

^① 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433页。

^② 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85-86页。

(包括陕甘边及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同年十月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①

注释的修改贯彻了中央〔1983〕28号文件精神,不再强调个人错误,强调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

(二)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对《刘志丹》小说述评的修订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阎红彦同志看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发表该书部分章节,就一面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停止发表。一面报告康生,说这部小说是借宣传刘志丹为高岗作宣传的,还写信报告了杨尚昆同志。”中央组织部1979年的报告,被一些文章和著作作为宣传《刘志丹》是一部好小说并指责阎红彦的依据。贺晋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00页。

年就此向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提意见，宋任穷说：我没有注意这个就发表了，把阎红彦和康生联在一起不对，这是原则问题。

1993年6月出版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一书中有关《刘志丹》小说评述中有这样一段话：“1962年9月8日，预备会议上各组已开始批彭两三天，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后来又说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就这段表述，几位西北老同志委托贺晋年向薄一波提出意见，薄一波当即表示修改，并很快给贺晋年送去修改稿，请他转给其他老同志都看看。我们现在见到的2008年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3年第5次印刷的薄一波新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删去了有关阎红彦的所有文字，表述为：“（至于1984年—1985年出版的三卷本《刘志丹》涉及的政治领域中的是非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已明确指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因此，曾参加过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中，有的对它提出批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康生却

别有用心，认为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硬说这是一部‘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于是，会议就把它作为‘翻案风’的例证进行批判”。^①

1987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薄一波、陈锡联、贺晋年写的题为《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纪念阎红彦的文章。文章说：阎红彦同志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二任总指挥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任第三任总指挥。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769-770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评析

核心提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如火如荼，相继建立了井冈山、中央苏区、湘鄂赣、湘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湘鄂川黔、陕甘、左右江、海陆丰、琼崖十三块较大的革命根据地。其中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是北方地区唯一一块立住了脚，并不断得以扩大的革命根据地，它的开辟意味着毛泽东创造的武装割据革命道路在北方地区也取得了成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了南方所有革命根据地的先后丢失，党中央和南方各路红军不得不相继踏上长征之路，而“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的红军队伍提供了较为理想的落脚点。党中央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以这里为基础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并进而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在这里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策略，在这里完成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在这里担负起了领导中华民族为夺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伟大使命，人民军队在这里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的各个战场。因此，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所占有的地位是

举足轻重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也是彪炳千秋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起源地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陕甘边根据地历史是非常必要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评析，力图通过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分析，来论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其历史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本文试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如下几个方面的评析：

一、陕甘红军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北方地区取得成功，星星之火，在西北已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号召全党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明确提出“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①根据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0页。

中央关于建立新的革命军队的决定，各地共产党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和部分革命军队相继举行武装起义，在斗争中展开了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北伐军3万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对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八一”即成为人民解放军建军节。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创建了第一支工农革命军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随后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5月，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至1929年底，党还在全国各地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左右江起义等一百多次武装起义，起义受挫或失败后保留的一部分武装力量成为各地红军的最初来源。

因京津等地区属于敌人统治严密地区，因此，北方红军的创建成功是在陕甘地区。陕甘红军的创建历程，与全国各地红军的创建有共同点，也是从武装起义开始的。

距八一南昌起义仅仅两个多月，西北共产党人唐澍（唐东源）、李象九、谢子长（谢浩如）、白明善（白乐亭）等就于1927年10月12日发动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成立了唐澍、谢子长分任正、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的西北工农革命军游

击支队，但部队随后在陕北地区作战时被国民党部队攻击而失败；1928年5月10日，在唐澍、刘志丹（刘景桂）等人领导下，发动了渭华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志丹、政治委员刘继曾、参谋长王泰吉、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总顾问许权中，全军千余人。苏维埃政权在华县、渭南、五一（民国初期县治，今属渭南市临渭区）3个县48个区、村建立，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到临潼，北接渭河，南连秦岭，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区域。渭华起义后，国民党政府抽调大量部队对红色区域实行“围剿”，工农革命军连战失利，唐澍、吴浩然等指挥员英勇牺牲，红色区域不复存在。7月，中共陕东特委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番号，部队由许权中带领暂归国民党刘文伯师，以保存力量。8月，许权中带领的部队在进入河南省邓县后被打散。

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在时机成熟时组织革命武装。党的六大对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实现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将武装斗争由到处组织暴动改变为以开展兵运斗争为基础，再图建立革命武装。

陕甘红军的创建历程有自己的特点，就是以兵运工作为开端的。可分为兵运工作、南梁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等阶段。

兵运工作为陕甘革命武装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4月，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的中共陕北特委会议上，刘志丹提出要“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会议决定通过白色（派共产党人到白军，即国民党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红色（发动组织工农武装，建立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从1929年起，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先后受中共陕西省委所派，开始从事艰苦卓绝的兵运工作。

南梁游击队的成立是党独立领导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开始。

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领导了太白起义，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被全部消灭，缴获长短枪50余支。起义后，刘志丹很快组建起了一支100余人的南梁游击队，成为陕甘地区由共产党人掌握的独立武装。为了生存和扩大队伍，刘志丹等人再次到地方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虽经被捕、部队屡被打散等多次打击，但刘志丹矢志不渝，组织革命武装的信心更加坚定。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重建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下

旬，南梁游击队与杨重远、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在林锦庙胜利会师，部队发展到700余人，并迅速占领庆阳北部的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等地。11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到南梁，与刘志丹一起领导这支革命武装。从南梁游击队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已经在陕甘地区开始形成。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第一次在西北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

1932年1月初，南梁游击队在正宁县北柴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这是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形势的高涨作出的决定，使得新成立的革命武装赋予了抗日武装的意义。1932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为执行党中央提出的游击战争纲领，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锦章村宣布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此始，陕甘红军诞生。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在部队中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在各大队建立了党支部。这一时期，西北共产党人在陕甘两省再次发动多起武装起义，如甘肃的两当兵变、靖远起义等。这些起义是在长期的兵运工作基础上发动的，目的是要拉起革命的武装队伍，壮大陕甘边红军，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增加革命力量。

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武装斗争的深入发

展，成为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在积极地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要求按红军编制法，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①根据党中央的决议，中共陕西省委于6月1日通过了《关于创建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接受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关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进一步提出，“必须按照现在游击队的力量，立刻编成红军一团，在最近期间，实现编制一师的任务”。^②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成立正式红军的指示，1932年12月24日，在陕甘边界的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任红二十六军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王世泰任红二团团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师克寿任该团共青团团委书记。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开始创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

陕甘红军的创建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红二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3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15页。

十六军的诞生，给全国红军增添了新的血液，成为党在北方地区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红二十六军诞生前，在南方，红军已发展成为方面军和军团级的编制，正在发挥保卫和发展各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作用。在北方，虽然从1930年起，党领导河北农民起义军组织起红二十军、红二十二军等部队，1931年在山西平定成立了红二十四军，但这些红军部队成立不久，就因为敌我力量的悬殊，在强敌镇压下失败了。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标志着西北也竖起了红军的大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北方地区取得成功。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在西北已发展成为燎原之势。这无疑给国民党政府以新的压力，也与南方的各支红军相呼应，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尤其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相继丢失、南方各支红军先后被迫开始长征的不利情况下，西北红二十六军以及后来成立的红二十七军的存在和发展更显出重要性来。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西北地区的成功实践，是探索以农村为根据地发展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又一光辉典范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历时4年之久，经历了

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发展阶段。其创建过程体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探索到成功的特点。

寺村塬时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创的有益尝试。

1932年3月，陕甘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寺村塬一带建立了一块方圆百里、拥有72个村镇的红色根据地，选举产生了寺村塬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8月，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游击队未能打破敌人的合力围击，寺村塬革命根据地丧失。

照金时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

1933年4月初，照金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选举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至4月底，东西相距50余里，南北相距80余里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10月，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在敌人重兵“围剿”下陷落。

南梁时期陕甘边中心根据地形成，进入大发展时期。

1934年2月，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再次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至同年秋季，南梁中心根据地已拥有10余县的红色区域。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宣告成立，习仲勋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陕甘边区军委主席。1935年6月，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北至长城，南到淳耀，西起环江，东到黄河，包括30余县的广大

红色区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历史见证了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的威力，成为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理论的生动实践例证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又一成功典范。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西北地区得到了成功的实践。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在探索这条独创的中国革命道路时，毛泽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这一理论成果的应用是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战略眼光，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思想，从而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创

立树立了榜样。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有关井冈山斗争的一些党内文件也传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看到要建立根据地的有关文件，刘志丹等人如获至宝，反复强调要学习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经验，走井冈山武装割据道路。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国民党封锁以及根据地的闭塞和信息的不通畅等原因，能获得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相关信息是非常有限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壮大更多的是靠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根据地领导人在实践中的积极努力以及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因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同样也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依据时代要求和实践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寻求和不断开拓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由此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强大的生命力。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陕甘边革命斗争实际紧密结合，适时制定和调整斗争策略，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顺应中国革命规律、符合陕甘边实际的革命路子，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依据。主要体现在：

武装斗争不搞教条主义，斗争形式多样、机动灵活，使武装斗争成为红色政权存在的重要保证。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摒弃“单纯军事”观点和绝对平均主义，把军事工作与土地革命有机融为一体，让军事工作为根据地建设服务，为创立红色政权服务，武装斗争支援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补充主力红军，确立了军民鱼水关系，使根据地建设和巩固红色政权得到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同时，自觉抵制“夺取中心城市，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左”倾教条主义，根据当地自然环境和军事斗争形势，坚持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不硬拼蛮干，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以南梁为中心成功建立了陕北、关中、陇东三路游击区，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形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有利态势。事实证明，这种被“左”倾领导人称为“梢山主义”的斗争策略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赞扬说，“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创出局面，这很高明”。^①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自觉抵制“左”倾思想的影响，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并非一帆风顺，与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一样，也受到了“左”倾和右倾思想的影响。陕甘边第一块根据地寺村塬

^①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缅怀民族英雄刘志丹——不朽传奇》，载《解放军报》2008年4月14日。

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就被“左”倾路线代表杜衡指责为“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命令游击队到靠近平原地区的韩城一带创建根据地。敌人开始“围剿”寺村塬革命根据地时，又执行“左”倾死守、蛮干的错误方针，最终导致了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红二十六军一成立，就开始了创建陕甘边照金根据地的斗争，并很快取得成功。但在杜衡的强行命令下，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准备在靠近西安的地区去建立根据地，结果造成红二十六军的失败，也导致了照金根据地在敌人重兵“围剿”下的失陷。在随后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和包家寨会议上，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及时总结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深刻教训，从实际出发制定大政方略。尤其是在包家寨会议上提出以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摆脱了中共陕西省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执行的在靠近大城市的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在危难中挽救了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了符合实际的革命路线指引，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

始终重视和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1930年10月，太白起义成功后组成的南梁游击队是以刘志丹、杨树荣等共产党员作为中坚力量，使游击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一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1931年2月，游击队在合水固城整编时建立了党支部，确立起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1933年

11月，红二十六军在莲花寺整编后，在师、团两级都建立起党委，在连队设立党支部和政治指导员，在班、排设立党小组；在第二、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也同时建立了党委，在各游击队和游击支队中建立了党支部；1933年起，在整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设立党的特委和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陕甘边所有红色武装力量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地方党组织、群众团体的工作，基本实现了党组织自上而下的全覆盖，将部队和政权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从这些特点可以得出结论，陕甘边的武装斗争道路是井冈山道路在西北的再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西北地区的实践过程。

三、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选择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为落脚点，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形成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新的指挥中心

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党中央和红军选择落脚点创造了条件，使得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

1934年10月，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和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中共中央不得不率领中央红军踏上艰苦备尝的长征之

路。长征到哪里去落脚，哪里是指挥中国革命的新的大本营，这是自踏上长征之路后，中共中央一直在慎重思考和郑重选择的重大问题。实际上，长征过程也就是落脚点选择过程。回顾长征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落脚点问题上，有这样几次重大的选择和变化，大致经历了“到湘西去”、“建立川黔边苏区”、“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到靠近苏联边界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落脚点”6个阶段。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中的6次变化，每一次变化，都是中共中央根据客观情况的改变作出的战略调整。

第一次选择是准备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行进过程中，蒋介石很快判明红军意图，沿途布下重兵围追堵截。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伤亡巨大，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不能实现。

第二次选择是到川黔边地区创建新苏区。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力主红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意见，转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苏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对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调整。

第三次选择是到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1935年1月中旬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

党中央的统治。在选择红军落脚点问题上，遵义会议认为，黔北地区人口稀少，少数民族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利于创建苏区，决定再次调整战略方针，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

第四次选择是在四川陕西甘肃边境地区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挺进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40万敌军的包围圈。随后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中共中央在6月26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分析了川西和川西北的情况，认为该地区地理不适合大部队运动，区域荒僻，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难以支持红军大部队的生存发展，政治上难以影响全国，所以明确提出了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第五次选择是向陕北和甘东北方向前进，到靠近苏联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这次选择的原因是，张国焘坚持南下，阻挠北上，致使红军在川西滞留近3个月，失去了迅速北上的宝贵时机，挺进川陕甘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迫使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原中央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继续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的甘南迭部俄界村召开政

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会议提出，继续北上，以游击战争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尔后再向东发展。

第六次选择是以“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最终落脚点，以此来作为指挥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央红军突破甘南天险腊子口后，在岷县小镇哈达铺（今属宕昌）搜集到一批报纸，天津出版的《大公报》以及山西的《晋阳日报》等报纸登载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正在蓬勃发展的情况。据此，中共中央决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发。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计划，准备“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此作为指挥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

党中央之所以选择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最终的落脚点，这也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

一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发展中巩固壮大，为党中央和红军选择落脚点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

政治条件。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为党中央选择落脚点创造了较为成熟的政治条件。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创立和建设，经历了一个从革命委员会到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过程，这是政权由创立到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共六大通过

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武装起义后成立的革命政权形式是临时性的，名称是革命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再成立正式的苏维埃政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成立过寺村塬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照金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南梁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这三次政权成立都采用革命委员会名称，说明政权本身还具有临时性质，正在为建立正式的苏维埃政权打基础。1934年11月初，在南梁荔园堡隆重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健全了苏维埃政府的下设机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红色政权的建设达到新的高峰，标志着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的成熟和壮大。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根据地领导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组织群众生产，支援前线，发行货币，活跃边区商贸市场，开放集市，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发展教育，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素质，同时，建立干部学校，培养军政干部，保证红军和地方工作的需要。这些做法，使得苏区到处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军事条件。红军力量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集结为党中央选择落脚点创造了重要的军事条件。1935年初，西北正规红军已发展到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两个军，5000余

人。9月，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的红二十五军亦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使根据地红军人数达到近万人。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组成红十五军团，并相继取得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的重大胜利，为彻底打破国民党部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地理条件。陕甘革命根据地所处地域，为党中央选择落脚点创造了较具优势的地理条件。陕甘革命根据地东面以黄河为界，西面则是六盘山麓，北面是沙漠。这三面构成天然屏障，在阻挡敌人进攻时有一定地理优势。南面连接关中较为富庶地区，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根据地中心地处子午岭山脉，山大沟深，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而利于红军开展游击战。又因地处陕甘宁晋几省交界处，国民党的统治相对薄弱，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

经济条件。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初具规模，为党中央选择落脚点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至1935年，陕甘革命根据地以政权建立为标志，已经有近4年的历史，形成了初步的经济运行机制。相继颁布的《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经济议案，发挥着经济政策、法令的作用。边区发行货币，发展金融。开设集市，发展贸易，保护小商贩，鼓励白区小商贩来苏区做生意，保障苏区群众日用品的供应。政府按市价收购上市的粮食，办小型牧场，收购部分牛羊集中牧养，以备军需。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红军、

游击队一律实行供给制，从干部到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所有费用都由政府财政委员会筹措，统一安排，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根据地内及周边地带煤矿、盐资源都较为丰富，这些也为党中央选择落脚点提供了物质基础。

群众条件。陕甘革命根据地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为党中央选择落脚点创造了群众条件。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兵亦民、民亦兵的特点尤其明显，既有正规红军，又有赤卫军、游击队，而后者的数量远远超过正规军。因此，在《大公报》上，就见到了这样的记载：“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万，赤军者二万。”^①报道虽属夸张之词，但从某种程度证明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军民关系的密切和群众基础的坚固。

二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发展趋势的估计也是促成党中央选择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落脚点的重要因素。

红二十六军在陕甘地区的发展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返回莫斯科，他向共产国际提交的建议书中提到，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因此他

^① 《大公报》1935年7月23日，引自张闻天：《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载《前进报》第3期（中共前敌委员会与陕甘支队1935年9月28日联合出版）。

建议：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援助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接受了弗雷德的建议，通过苏联红军情报局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调查，认为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已经打通”，^①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并开始在蒙古边境地区准备援助中国工农红军的武器准备。从这点看，共产国际已经有通过陕甘革命根据地援助红军的想法和行动。党中央选择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落脚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充分考虑到共产国际这一思想因素的。

共产国际认为红军有可能在西北大发展的思想也越来越明确。1935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在有关中国的报告中指出：“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②1935年7月3日《真理报》登载的文章指出：“红军新的根据地因此应选在距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军事中心较远的地方，同时新的根据地应该保证苏维埃革命的潮流能够广泛地向全国各地推广。选中的是四川、西康、陕西这样一个

^① 杨奎松著：《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3月版，第354页。

^② 东方书记处：《中国红军前线的新形势》（1935年4月），载杨奎松著：《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3月版，第354页。

广袤的战略十分有利的地区”。^①共产国际召开的七大闭幕后，派林育英回国，斯大林让中共代表团转告林育英：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已经预见到革命根据地在西北地区的存在对未来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三是党中央在长征中确定的“北上抗日”方针也是选择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落脚点的重要因素。

基于民族危机加深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长征一开始，就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并在长征途中开展了大量的抗日宣传活动。1935年6月，中共中央在川西北两河口会议上决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的北上陕甘的战略方针。8月召开的沙窝、毛儿盖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北上抗日、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指出：“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②；党和红军执行北上方针是为了“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③

1935年9月在甘肃通渭榜罗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① 杨奎松著：《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3月版，第354页。

^② 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三军大会师》（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540页。

^③ 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三军大会师》（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555页。

常委会议上，北上抗日的目的更加明确。会议讨论了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分析了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政治、经济条件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及西北红军状况，看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有实现“北上抗日”方针的基础，具备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条件，作出了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

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重心北移，并构建新的战略布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革命的区域性特点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重心在南方，根据地也多数集中在南方。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党在北方地区建立的一块非常重要的根据地，它的存在是非常宝贵的，不仅标志着北方的红旗不倒，尤其是党中央和南方的各路红军在南方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陕甘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日本加剧侵略中国，国内形势是蒋介石继续推行“剿共政策”，内忧外患的形势十分严峻。在面临抗日救国重大历史任务的时候，在党和红军队伍实现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在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之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从红军的生存发展考量，从北上抗日目标的确定，从设立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需要，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等多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考虑，最佳的落脚点选择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党中央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了

西北，在这里谋划和布局整个新的战略格局，红军则进入到了抗日的最前线。不仅中央率领陕甘支队选择了这里，各路长征红军队伍也先后到达了这里，在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休整培训、编制队伍，为新的发展积蓄力量。可以说，党中央和各路红军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中国革命开始走出了低谷，步入新的征程。

四、创造性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战线在陕甘边区成功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①这是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主要观点，也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意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战工作颇有特色，积累的经验非常丰富，可圈可点的事例非常多。可以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紧密结合的绝好例证。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周围全部是国民党统治区域，敌人武装力量的强大和陕甘边红军武装力量的弱小，这些鲜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05-606页。

明的对比是时刻存在的，在其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敌人数次的“围剿”和进攻。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强大敌人的包围圈中生存下来，不断开辟出新的天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执行到位，统一战线工作富有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成功的兵运工作成为陕甘边共产党人对国民党部队开展统战工作的基础

从1929年起，为担负起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任务，中共陕西省委开始派出一大批共产党员在西北各军阀部队中进行兵运工作，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党的兵运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对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杨虎城素具爱国思想，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的十七路军并未进行认真的“清党”，在十七路军中的一些部队中，中共党组织比较健全。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教育引导十七路军官兵树立爱国爱民的思想，并用抗日救亡的主张去感化上层人士，争取他们的同情。据习仲勋回忆：“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比东北军还要早。”^①由于成功的军

^① 《习仲勋冯文彬谈原十七路军》，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

队统战工作，十七路军所辖许多部队在与红军作战时，并不尽全力。特别是在战斗的关键环节，往往有军内地下党员或提供情报，或扰乱敌人军心，敌人多次“围剿”因此不能奏效。1932年2月，陕甘游击队刚刚成立，就取得攻打旬邑职田镇和阳坡头伏击战的重大胜利，这其中在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起到了很大作用。游击队攻克职田镇是通过打入敌人部队的共产党员提前得知敌在职田镇的兵力部署，进而一举成功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连，捣毁敌区公所。敌人闻讯后以一个营和三县民团前来围攻陕甘游击队，但此情报亦被及时传送到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立即从职田镇撤出，在阳坡头一带设伏。敌人来时，游击队猛烈开火。敌阵营内，警卫团三营七连连长李明轩（共产党员）乘机骑马往回跑，并边跑边喊：“红军来了，快跑！”士兵争相奔逃，游击队全线反击，大获全胜。歼灭敌军一个营和部分民团，毙敌16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枪支400余支和部分物资。在陕甘边军事斗争中，这样的事例有许多。陕甘游击队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红二十六军之所以能够在游击战争中不断发展，敌人阵营内共产党员作用的发挥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二）对陕甘地区众多的民团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政策，孤立敌人，壮大革命阵营

刘志丹、习仲勋认为，游击队不能到处树敌，不能使

自己陷于孤立。对于民团应区别对待，采取的主要方法：一是整编愿意革命的民团。如华池唐青山民团，曾多次表示愿意接受改编。经过考验，刘志丹接收了唐青山的民团，任命唐青山为四营营长。二是争取可能中立的民团。如宜君民团沙秉彦接受了中共党组织提出的三点要求：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红军，不干涉共产党工作人员的行动。此后，沙秉彦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陕甘游击队与正宁县徐文德民团达成互不侵犯协议，此后双方没有发生过冲突。三是消灭与我为敌的民团。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如黄毓麟、赵老五、梁保定等民团则坚决消灭。陕甘边党组织和陕甘游击队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政策，孤立敌人，团结朋友，以利革命。对此，习仲勋曾做过总结：“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用最大力量，去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对那些受国民党中央排挤的杂牌军即西北军的许多部分，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和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守中立。这些工作是有成效的。”^①

（三）尊重知识分子，争取更多的人加入革命事业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关心，并在工作和斗争中注意培

^① 习仲勋：《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载《人民日报》1951年7月4日。

养，团结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这不仅使边区党政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也对根据地的工业、科学、医疗、财经、文教等各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对一时不明白共产党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十分尊重他们，首先向他们讲道理。当知道共产党人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他们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①当一些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后，人们纷纷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②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使陕甘边区的建设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四）争取团结民间会道门，增强革命力量

陕甘边区一带的民间会道门组织较多，如哥老会、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其成员大多是劳苦群众。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对其采取了争取、改造和团结的方针。边区哥老会组织与中共组织有长期的密切联系，对党和红军有过不少帮助，边区党组织对哥老会的工作也是比较成功的，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这些会道门组织中的绝大多数群众拥护党和红军，踊跃参加革命。有的主动向红军捐献枪支弹药，筹粮筹款；有的动员兄弟伙伴参加红

^①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②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军；有的掩护、照料红军伤病员；有的给红军传递情报；有的为红军侦察敌情等。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对会道门组织的团结争取，削弱了敌人力量，增强了革命力量。

陕甘边区的统战工作表现在各个方面，无论是在刘志丹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的建军思想上，还是采取的武装斗争策略上，以及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施的各项政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理论来源于实践，独具特色的陕甘边区统战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统战理论宝库。对陕甘边的统一战线工作，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都有精彩的论述，刘志丹说：“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①习仲勋在总结陕甘边的历史经验时说：“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情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②正是因为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所以落实在实践上，就取得了成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

^① 《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8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页。

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统战方针，采取了灵活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争取倾向进步的哥老会、民团、保安团、红枪会的首领，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减少了敌对势力，扩大了统一战线阵营。这些实践经验，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为根据地创造了适宜发展的各项条件，保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各项事业能够沿着正确的革命道路前行，并赢得最后的胜利。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的成功也是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自觉抵制。“左”倾错误表现在统一战线上，就是实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只搞下层统一战线，排斥上层分子，排斥一切中间势力，把能够团结的力量置之一边，使自己处于孤立的阵营，这也是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的重要原因之一。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缘起成功的统一战线，在陕北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成功，继而在两块根据地连接在一起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成功。中共中央到达这里后，总结了过去统一战线方面的经验教训，对陕甘边成功的统一战线是肯定的。因此，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有着陕甘边统一战线成功经验这一因素的。

中共中央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承担起抗日救国的使命。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

策略，必须通过统战工作，首先打开西北地区联合抗日的新局面。据此，党和红军在根据地周边和陕甘宁晋等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统战工作。毛泽东于1935年12月专门派原红二十六军代理政委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秘密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事宜；1936年夏，毛泽东亲自给十七路军的高桂滋写信，晓以抗日大义，同时派邓发到新疆，与盛世才初步沟通关系；9月又派彭雪枫携带亲笔信到兰州，与东北军于学忠部谈共同抗日事宜。经过周恩来等与张学良的多次会谈，红军同东北军达成了双方互不侵犯、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救国教育等秘密协定；与杨虎城的西北军也达成了双方停战、允许军队运进重要物资等秘密协定。1936年夏，国共双方在前线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处于“围剿”红军前线的张学良、杨虎城等部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先后停止剿共，发展成为红军的友军，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逼蒋抗日的合作局面，实现了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应该说，这一有利局面的形成是与陕甘革命根据地长期统战工作打下的基础息息相关的。

党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制定上，也吸取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统一战线上创造的许多好经验。鉴于哥老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发挥的特殊作用，为了让这一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1936年7月，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1936年10月，在志丹县马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号召哥老会联合起来开展全国性的抗日活动。1935年至1936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也相继发布，起到了动员各族人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制定出的新的统战政策，也都是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形成的陕甘宁边区作为最先试行点和执行区。毛泽东曾说过：“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①

五、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后，成为中国革命再次腾飞的“出发点”和全面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左”倾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使党的白区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导致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共中央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长征的胜利则标志着中国革命低潮的结束，标志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97页。

新局面的开始。中共中央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开始了中国革命新布局的战略调整，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再次腾飞的出发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中共中央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时，由于日本侵略行径的加剧，国内正在掀起新一轮的抗日救亡高潮。怎样领导中国革命？怎样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共中央面临的重要问题。为此，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报告，张浩作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报告，毛泽东作关于军事战略问题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之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系统地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阐述了党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基本政策。表明党中央已经把长征时期的“北上抗日”方针，发展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路线。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中央领导下，根据地开始积极贯彻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制定的方针政策，调整根据地内各项政策，使得根据地的所有工作围绕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从而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1935年11月，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直罗镇一战，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随后，新成立了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军，使根据地的红军力量发展到五万五千余人。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红军的战略任务确定为打通抗日路线和扩大现有苏区。据此，193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在山西实行东征。经过两个多月的东征，扩大了抗日宣传，建立起新的游击队和游击区，增加了红军力量。5月，为打破蒋介石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的新的“围剿”，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组成为西方野战军，向甘肃、宁夏两省进行西征。西征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使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也在西征中壮大了力量，得到了新的发展。西征的第二阶段，西方野战军在新区巩固战果，开始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做积极准备。10月，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实现大会师。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形成后，进一步促进了西北地区抗

日力量的大联合，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不断高涨。也正是在西北地区抗日力量大联合的形势下，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坚决抗日的信心更加坚定，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极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从这个角度出发，此时形成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可以视为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策源地，党的重大方针的改变和重要策略的提出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党中央在这里领导着中国革命的发展。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壮大，至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成立。陕甘宁边区辖区纵横约千里，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26个县的区域，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支抗日武装的后方基地和总指挥部。

八路军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出发奔赴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11月，三军鼎力配合，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各路红军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后，在这里整合力量，编制队伍，有了新的发展。此时，驻扎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分别为：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陕甘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均编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第二、第六军；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陕甘红军

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军（1936年4月成立，有别于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独立第一、第二师及陕南第七十四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部，共7.4万余人。在陇东一带驻扎的红军队伍有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援西军、中央教导师等部队。红军在这里开展学习、整训、练兵，配合地方搞好生产，并广泛开展抗日统战工作，为奔赴抗日前线积极做准备。

1937年8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红军主力改名为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全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3个师和1个后方留守处。从8月到9月，在八路军总部率领下，八路军各师陆续开赴前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八路军各部队挺进到新的地区后，经过艰苦卓越的斗争，又创建出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新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创建和迅猛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进行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形成的陕甘宁边区，成为党指挥抗日战争的政治中心和领导敌后抗日的战略后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为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形成的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13年的驻地，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3年中，党中央把握中国革命的大局，运筹帷幄，克服困难，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走向全面胜利。陕甘宁边区作为重要的后方保障基地，积极发展经济，并在培养干部、提高素质、组织群众、积蓄力量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边区为基点，全力支援抗日前线和解放战争前线，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全方位的后方支持。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所在的陇东地区，已成为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

陕甘宁边区是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上创造了许多好的做法。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建设“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将陇东分区作为试点之一。在改选中，为充分体现“三三制”特点，凡选举中共党员超过三分之一时，共产党员主动发扬风格，让出职位。这种主动谦让，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的精神，使党外民主人士深受感动，也保证了“三三制”政权在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试点取得的成功经验

很快在全边区推广。同年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陇东分区开始了精兵简政的工作，缩编了政府工作人员，减轻了群众负担，建立健全了政府工作制度，改变了工作作风，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在法制建设上，陇东分区专署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注重现场办案，解决了一批疑难案件。尤其是公开审理“封芝琴婚姻案”，支持封芝琴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主，合理解决案件中的纠纷，赢得群众的普遍好评。走群众路线、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全区推广，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一审判方式在新中国建立后则成为全国法院系统的必修课程。

陇东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骄人的成绩。全分区开垦荒地40多万亩，仅1943年就增产细粮5万石，相当于整个陕甘宁边区当年增产粮食的三分之一，农业生产大发展，农民生活大改善。同时，养殖业、种植业、副业、水利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干部群众受到了奖励表彰，毛泽东为陇东的党政军班子主要领导马文瑞、马锡五、王维舟的题词分别为“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为华池县长李培福题词“面向群众”。张振财、孙万福等17名陇东劳动英雄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陇东地区为

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发展，为支援革命军队前方作战，为做好边区后勤保障，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为支援抗战，陇东人民积极生产、踊跃支前。1941年至1946年，陇东分区交救国公粮21.4万石，各县有近万名青年应征入伍，妇女们共做军鞋20余万双，袜子5000余双，织布8万多丈，还供应大量草料，动用大批畜力，运送物资到前线，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作为老解放区的陇东，更是在各个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首先，这里是干部的培养和输送地。1948年，陇东中学改建为陇东分区党校，1949年又改建为陇东分区干部学校，两年内陇东全区共办干部培训班40多期，向新解放区输送干部1300多名，保证了新区接管、建政的需要。为解放大西北，老区青年积极参军，有6000余人应征入伍。老区人民踊跃缴纳粮草，做军鞋军袜，保证前线的需要。老区的支前队伍表现尤其突出，解放军打到哪里，支前队就跟到哪里，其中部分担架队转战5000余里，参加了解放兰州、青海、宁夏的许多战役战斗，屡立战功。陇东老区的人民，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陕甘边共产党人和无数革命志士用鲜血和生命孕育成的南梁精神，是对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延安精神的源点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

南梁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宝贵的精

神财富，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是延安精神的源点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南梁精神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勇于探索、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求实精神；忠诚于党、无私奉献的大局精神；面向群众、勤政为民的公仆精神。南梁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井冈山开篇之作后的延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西北得以实践的精神产物，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包括南梁在内的陕甘边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开创和巩固下来的主体精神。

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中，我们党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为中国革命播撒了燎原火种，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井冈山精神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其丰富深刻的底蕴和内涵，光辉卓绝的道德人格典范，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成为维系中国过去和现在、历史和未来的精神血脉，成为中国革命的民族精神的源头及伟大象征。井冈山精神的原创意义在于，它是中国革命的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人培育出来的革命的民族精神。井冈山精神开“源”，后来革命精神的发展是“流”，是继承和发展，是进一步丰富和展开。比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都

是井冈山精神的延伸和具有时代内涵的发展，南梁精神同样也有这样的特性。这些精神作为一种特定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文化观，一起熔铸和培育出革命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

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延安精神是指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以后迁入延安的13年时间里，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通过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反磨擦斗争、大生产运动和自身整风运动，形成的带有体系性的观念和作风，核心和灵魂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延安精神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风范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萃结晶，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它的内容和体系非常丰富和发达，它的起源和发展源远流长，至今仍然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归结为一点就是：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南梁精神是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种革命精神，从源头上讲，它与井冈山精神一脉相

承；从后续来讲，因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南梁精神可以视为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源点之一，同时，它也是博大精深的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对南梁精神做一些解析：

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灵魂。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及其根据地广大军民始终坚持了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和奋斗精神。为了建立革命武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人曾先后组织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两当兵变等大大小小70多次武装起义，并在陕甘地区开展了广泛的兵运工作，虽然屡屡失败，但他们的革命意志从来都不曾动摇，不惧失败，不怕反复，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创建了南梁游击队，创建了陕甘红军，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了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根据地的发展历程虽然屡经挫折，但他们信念坚定，注意总结经验，坚持正确方向。比如，1933年8月，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遭受重大危机，习仲勋在陈家坡会议上，就提出要加强军队的统一指挥和领导，使革命力量得以保存，最终形成星

火燎原之势。

勇于探索、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始终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在建立革命武装、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创新性的发展。比如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注意吸取教训，自觉抵制“左”倾错误的干扰，适时召开合水包家寨会议，确定了开创三路游击区，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政方略，包家寨会议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走向新胜利的历史转折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道路被总结为全国武装斗争中的陕甘模式。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讲求实际，具有开创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使根据地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面临着恶劣的发展环境和生存的艰难，面临着革命斗争的生死抉择，不利的环境和艰难的生存条件，时时考验着每一个人。就是因为革命者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才使得根据地和红军能够冲破重重困难和险阻，不断巩固和发展壮大。他们坚信中国革命有着光明的前途，为了光明，他们不懈追求，充满战胜困难、战胜敌

人的精神力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在敌人的屠刀下慷慨就义、视死如归，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精神饱满、斗志旺盛。他们在血与火的时代，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南梁革命纪念馆烈士纪念碑上就刻着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杨森、杨琪等608名烈士的名字。为革命捐躯的革命烈士中，无名烈士还有许多。1934年5月，在华池南梁阎家洼子，为保住游击队活动方向的秘密和主力红军坚壁的枪械弹药，42名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其中6人被铡刀铡下头颅，36人被活埋。面对生死，他们视死如归，他们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他们勇往直前的精神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人，正如刘志丹为两当兵变后牺牲的刘林圃烈士所写题词里说的“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①

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求实精神。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一对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概括，是在延安时期定位的，但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却充满艰辛。这一点，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也可以得到证明。实际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也是屡次受到不讲实际、冒险蛮干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在什么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

^① 《刘志丹纪念文集》彩插，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根据地怎样发展？一直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寺村塬时期、照金时期，“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只知道南下到平原地区、到靠近大城市的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不考虑根据地在这样的地方是否能够生存，结果导致红二十六军的南下失败和两块革命根据地的先后丢失。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受挫的严重时刻，也出现过“红旗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有些人主张部队分散游击。面对这些来自“左”的或右的负面干扰，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注重从陕甘实际出发，注意吸取根据地曾经丢失的血的教训，自觉抵制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从而坚持了陕甘边区的游击战争，保证了党对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正确领导，使陕甘边区的革命事业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时刻，保证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在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进入了大发展的辉煌时期。习仲勋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对陕甘边领导核心的作用总结道：“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①

忠诚于党、无私奉献的大局精神。忠诚于党、无私奉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页。

献的大局精神，是南梁精神的重要构成因素。红二十六军刚刚成立，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就极力推行“左”倾路线，排挤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正确领导，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刘志丹、谢子长以高度的党性要求自己，尽一切努力维护部队的团结，保存革命力量。1935年的错误肃反发生时，刘志丹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他从通信员那里看到抓捕自己的密令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前往瓦窑堡说明情况，结果被关押。他在关押期间，坚持实事求是，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据理力争，并告诉被抓的同志：“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①出狱后，一些受迫害的同志有委屈情绪，他劝大家过去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要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会解决好的。正是靠这种忠诚于党、顾全大局的精神，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并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具有高度的党性，他们胸怀博大，忍辱负重，严于律己，襟怀坦荡，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他们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自觉抵制和努力消除“左”倾和右倾错误对根据地和红军的影响，使整个根据地在经历一次次曲折后，仍然大踏步发展。他们是“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核心所在。1943年4月24日延安《解放日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报》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践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政策，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①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习仲勋：“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②从这些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贡献是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这样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分不开的。

面向群众、勤政为民的公仆精神。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甘红军就是以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始终把建立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们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真心关心群众，选举群众代表参与政府重要工作，参加政权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陕甘边区特有的和谐生动局面。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的土地革命、发展生产、设立集市、发行边币、保护小商贩等一系列政策、法令和措施，都坚持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集中反映人民的利

^① 《延安公祭刘志丹同志》，载《解放日报》1943年4月24日。

^② 贺捷生：《眷恋这片大地》，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8日。

益，赢得了边区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也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在勤政为民的过程中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人民群众拥护边区政府，努力生产争当模范，他们积极参军参战，为支持边区、保卫家园作出了很多贡献。

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实践，为党积累了宝贵的执政经验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实现了共产党人在西北红色区域内的局部执政。在执政过程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积极探索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廉洁执政的路子，在执政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后来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乃至在全国的执政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建设的加强，是陕甘边红色政权得以建立并开始执政的重要政治思想基础。

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井冈山创造的经验也被应用在陕甘边的红军体制上，从南梁游击队到红二十六军，从党支部到团党委，始终坚持了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1933年5月，为加强根据地党组织建设，建立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1934年在陕甘边区南区建立了党委。在陕甘边区所辖各县，均建立了县委，并在区、乡、村都建有党的基层组

织。党组织的建设保证了党对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绝对领导，这一条不仅在战争年代重要，在党的局部执政和全面执政历史中都很重要。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作出《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要求把党的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重申了军队建设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进程中，边区领导人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保证了党对根据地各项事业的绝对领导。

红色政权的建立和民主选举是陕甘边区实现局部执政的组织和制度保障。在党的领导下，陕甘边区开始了全面系统的政权建设。从建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到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从单纯选举到通过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进行选举，陕甘边区的红色政权建设日趋完善，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选举也向着更加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南区和十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的相继诞生，区、乡、村级苏维埃政权的陆续建立，使陕甘边区形成了组织层次齐全的红色政权系统，成为党在陕甘边实现局部执政的组织保障。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和苏维埃政权机构成员的产生则探索出了更为民主、科学的选举办法，即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民族等各个方面。这种民主选举的办法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

为选出他们合心的人选，不识字的老百姓用举手、投豆子等方式来参加选举，充分行使政府赋予他们的民主权利。民主选举所创造的这种方式方法不断地延续下去，并不断得到完善。发展到陕甘宁边区时期，边区的议会制和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建设都采取了民主选举的方式，在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上更趋完善，充分代表了全边区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已成为全国最民主、最进步的地方。

陕甘边的红色政权从诞生起，就非常注意它的廉洁性。刘志丹等领导人把抓廉洁当作头等大事，刘志丹曾语重心长地教育干部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挨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①苏维埃政权制定了严格的廉政法律，《暂行条例十八条》中规定：“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②这些思想教育的措施和严明的纪律规定保证了党在陕甘边区执政的清正廉明。

群众路线是党和政府能够正确决策和决策有效执行的重要保证。

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

^①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② 《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54页。

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①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府，坚持走群众路线，始终保持着面向群众的亲民作风。在执政中注意充分吸收群众代表参加政权建设和对各项事务的管理，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在工作方法上始终强调要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凝聚群众的革命力量，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建立严格的纪律约束制度。边区政府要求根据地各基层政权必须为民办事，切实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进行各项决策，制定各项措施。在执政为民的理念指导下，边区政府领导人民搞土地改革，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充分展示出苏维埃政府执政为民的公仆形象，赢得了边区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边区的各项事业也蒸蒸日上。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锡五等根据地领导人在坚持革命为民、执政为民的工作实践中，始终保持着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和群众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最能了解群众的要求，代表民众的利益。群众见到他们就像亲人一样，亲切地称呼他们为“老刘”、“老谢”、“仲勋”，很多传唱至今的陇东民歌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有这样一首：“半夜里来叫门，问你是哪部分，听说是咱们的队伍，赶快迎进门。喂马有乡情，放哨有咱们，老刘队伍都缓好，打仗有精神”。^②与群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9页。

^② 杨正发编著：《南梁之光》，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72页。

众关系密切，这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巩固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所坚持的群众路线、亲民作风和群众工作方法，不仅在短时期内很快医治了战争带来的创伤，使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快速发展，而且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在人民心中站稳了脚跟。边区的经济发展和民心所向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后来中央红军落脚陕甘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为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切实的物质保障，为党后来成功实现在全国执政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土地革命在陕甘边区的正确推行，为解决农民问题提供了基本保证。

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全国各革命根据地都陆续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工作。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与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一样，有相同的地方。但陕甘边区有它的地域特性，陕甘边区政府在土地革命的有关政策上，讲求实际，根据农民的实际需要来制定政策。因此，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也创造出了好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刘志丹曾对习仲勋说：“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①因此，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充分体现出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特点。与一些人多地少的根据地相比，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地广人稀，山地多，川地少，且赋税和高利贷剥削很重。土地革命刚开始发动宣传时，“群众对于分土地并不感到多大兴趣，而对于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粮、款和租子，则很感兴趣”。^②习仲勋等政府领导人，注重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制定出《土地决议案》等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体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政府和红军不给群众添负担，“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③并以打土豪来作为军需的补充；二是废除一切因剥削农民而产生的债务和高利贷；三是采取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分配土地，在靠近敌占区的地方暂不分

①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② 《刘景范 1959年4月25日谈陕甘边苏区创建的历史条件》，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406页。

③ 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地，分川地不分山地，青苗和土地一起分的方法；四是在分地中体现党的统战政策，对愿意接受劳动改造、能够自食其力的富农和地主家庭成员可以分地。这一点，在其他一些根据地是较难做到的。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是以边区民生为出发点，充分考虑了地域特点和农民状况，体现出边区政府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动摇了千百年来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努力生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加之废除了苛捐杂税，农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他们从内心深处感谢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支持政府和红军的工作中。边区实行土地革命的好处使边区周边的农民深受影响，他们举家带口，一起投奔边区，使得边区的人口有了大幅度提升，据1935年春统计，南梁一带的户数已由六七百户发展到一千余户，人口约6000余人。^①

商贸和金融的发展在边区经济建设的繁荣中起到助推和杠杆作用。

在经济建设中，商贸和金融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了多种促进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1992年3月内部版，第85页。

经济发展的商贸和金融政策。一是开设集市，边区政府先后在照金亭子沟和南梁白马庙、荔园堡设立集市，十日一集，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来赶集，盛况空前。“逢集有炸麻花的、卖蒸馍和荞麦面饅饅的、卖其它小吃的，还有卖余粮的。摆摊子的高声叫卖，雇主争相购买，一派生机繁荣的景象”。^①同时，边区还不定期举办物资交流大会或骡马大会。二是扩大对外贸易，对白区商人实行优惠政策，吸引他们前来做生意。白区商人在边区政府的感召和优惠政策下，想方设法冲破敌人对边区的封锁，带来了大批边区不能生产或产量很少的棉布、油墨、纸张等物品。边区的牲畜、土特产等则通过他们销往白区，活跃了流通，增加了边区群众收入，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三是组建银行，发行货币，促进金融发展。为保持边区经济稳定，组建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银行，成立了造币厂，印制边区特有的布币，布币上刷有桐油，被群众称为“油布票”。为保持币值稳定，采取一元布币兑换一元白洋的方法，广受边区群众和白区商人的欢迎。四是兴办合作社，发展农副业生产。合作社组织群众养鸡、羊、猪等，还组织群众做军鞋，并付给报酬，群众都非常乐意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此外，边区政府还发动群众开荒、兴修水利，发展

^① 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段回忆》，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935页。

林、牧、副业，提高农业产量，修筑道路，便利交通，想尽一切办法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促进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在这些措施中，有很多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为发展根据地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传播和引领着先进文化的方向。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改变一个民族命运的重要力量。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前，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南梁及周边地区没有一所学校，农民基本上是文盲，但他们积极支持边区政府工作。“有的人不会写字，干脆用一片破纸插着一根鸡毛，经多人之手一直传到南梁我们的驻地。还有的用一张破纸包上一块煤炭，插上鸡毛，也传到我们这里，我们看后，只能知道是不好的消息，知道是敌人来了。”^①南梁政府成立后，发动群众兴办学校，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兴办了列宁小学、冬学和夜校等，进行文化普及教育。刘志丹提出“要先讲爱国爱民道理”，^②这就代表着边区文化教育的先进方向。边区政府的文化委员长蔡子伟还亲自动手为学生编写课本。在成人教育方面，办起成人扫

^① 张策：《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回忆》，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917页。

^② 马文瑞：《回忆与追思》，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81页。

盲识字班。同时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的活动，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等。为了提高边区党政军干部的文化素质，1934年11月创办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由刘志丹兼校长、习仲勋兼政委，吴岱锋任军事主任，每期一个月左右，培养了大批党政军干部。为了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陕甘边区特委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并翻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一些文件，以供党员学习之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创办了机关报《红色西北》，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广泛宣传。同时还广泛采取印发标语、口号、传单等方式，使党和政府的政治主张和经济政策深入人心。边区政府还开展了各种群众文艺活动，创作了大量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陇东革命民歌及歌谣，《刘志丹》、《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五更天》等歌曲脍炙人口，流传至今。边区政府积极发展文教事业、传播先进文化的成功实践，既丰富了边区群众的文化生活，又宣传了革命道理，引领着先进文化的方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了过去这一地区政治混乱、经济落后、文化停滞、风俗低庸的旧面目，代之而起的是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先进、风气清新的新面貌，得到了边区群众的普遍拥护和坚决支持。著名记者范长江在他所著的《中国的西北角》中说：“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

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百里以内之民众”。^①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干部成长的摇篮，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治党治军治国干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是和大批党的优秀干部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在创建陕甘红军和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卓越功绩。他们的建军思想和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造出来的执政理念和丰富经验，在中国革命史和军事史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注重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际相结合，在贯彻工农武装割据方面，思想十分坚决，同时又能结合实际，创造出陕甘模式，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他们将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建立根据地三者结合起来，在三个方面都取得成功的佳绩。他们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刘志丹曾深有体会地说：“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

^① 范长江：《刘志丹之鼓动与民众之向背》，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93-794页。

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余地。”^①正是在深切体会中，他们始终坚持走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才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巩固和壮大，最终与陕北革命根据地一起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他们尤其重视群众工作，深入实地，关心群众生活，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将群众的利益看成党的最高利益，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热烈拥护。他们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品质：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顾全大局、勇于自我牺牲的党性原则，团结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思想和胸怀宽广、谦虚谨慎、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立党为公，团结、包容，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高尚品德。因此，毛泽东曾亲自为刘志丹题写“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为谢子长题写“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为习仲勋题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褒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尽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同时革命队伍内部也存在分歧，刘志丹等一部分同志受到过打击，并被降低职务甚至曾一度被关押，但他们始终顾全大局，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积极工作，不搞小团体，不搞宗派，体现了共产党人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使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46页。

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和巩固。正因为陕甘边区干部表现优秀，所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组成时，陕甘边区的干部成建制被编入其中。刘志丹、谢子长这两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创始人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血洒疆场，英勇牺牲，成为令人崇仰的群众领袖和英雄楷模。在共和国成立后，从陕甘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干部中更是出现了一大批高层领导，在不同岗位上为党的事业和共和国的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之中有习仲勋、马文瑞、汪锋、李培福、张秀山、张邦英、张仲良、吴岱峰、王世泰、黄罗斌、刘景范、高锦纯、陈国栋、马锡五、龚逢春、马明方、阎红彦、贺晋年、朱理治、郭洪涛、郭述申、唐洪澄、白茜、幕纯农等，^①其中习仲勋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马文瑞、汪锋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

从上述几方面的执政经验可以看出，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依靠群众，制定各种符合实际的政策，创造性地进行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使根据地成为红军的后方基地，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积累了经验。当这块地区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后，又在土地改革、民主选举、精兵简政、三三制政权、法制、文化、经济等各领域创造出许多独特的经验，丰富了毛泽

^① 李蓉：《革命的硕果 光辉的旗帜》，载《陕甘边根据地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27页。

东思想和党在整个边区的执政理论和实践经验，这些宝贵经验，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全国执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综上所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正如习仲勋所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中国西北部，在全国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①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史是中国革命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活动既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有益探索，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践依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及其经验，是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发展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重要会议研究

核心提示：重要会议一般都具有决策和指导作用。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在创建、巩固、发展过程中，召开过党的会议、政府会议、军事会议、群众会议以及联席会议等多种不同类型的会议。有些会议决策正确，具有扭转乾坤、促进根据地发展的重要作用；有的会议因导向错误，做出过错误决定，对根据地起到的是消极阻碍作用。加强对这些会议的研究，有助于了解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有助于认识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陕甘革命根据地重要会议研究，是从陕甘革命根据地各类会议中撷取了其中一些重要会议进行比对研究，目的就是通过了解和认识这些处于历史节点上的重要会议，来梳理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历史脉络。

地处西北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成。在其创建历程中，召开过多次重要的党政军会议，对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陈家坡会议、包家寨会议等都产生过重要的历史影响。本文对这些重要会议予以初步研究，以图探寻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问题。

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

1932年春节期间，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向西北反帝同盟军传达了省委要求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指示。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村举行。这天，细嘴子的麦场上悬挂着“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横幅，鲜艳的镰刀斧头红旗在会场飘扬，战士们整齐地列队，正宁、旬邑两县附近的贫苦群众也成群结队地前来祝贺，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会上，李杰夫宣读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建立陕甘边境游击队的指示信，代表陕西省委宣布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编制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队、一个警卫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此时刘志丹因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未任职（5月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杨重（仲）远任参谋长，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政治委员杨重远（兼），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岱峰，政治委员高岗，骑兵队队长强龙光，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治委员胡廷俊，全队共360余人。同时成立中共陕甘红军游击队委员会（简称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各大队建有党支部。在授旗仪式上，中共旬邑特支负责人第五伯昌将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授给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

陕甘边境地区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红军的红旗，向公众宣告了这支部队是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的军队。由此推动了陕甘地区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阶段，为下一步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奠定了军事基础。

二、寺村塬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1932年3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群众工作有一定基础的正宁县寺村塬，分驻新庄子、西城、碾庄子等村，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努力。游击队派出骑兵，到各村庄去张贴标语传单，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反剥削、反压迫，同地主豪绅作斗争。经过发动群众，陕甘游击队在苟仁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将寺村塬农民自发组织的3个“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任副总指挥，以村为单位，在新庄子、西城、上南坡头、碾庄子、双佛堂、苟仁寺、张村、巩家斜、苜蓿岭、车家沟成立赤卫军小队、贫农团、农民联合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

3月22日^①，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帮助下，在新庄子村山神庙旁，召开了以寺村塬为中心，东起五顷塬，西

^① 关于寺村塬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间，有1932年3月下旬和4月上旬的说法，这里采用曲涛、李仲立著《陇东老区红军史》记述的时间。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51页。

至上南坡头一带72个村镇约五六百名农民代表参加的大会，分别推举出代表自己村镇的代表共72人，其中贫农40人、雇农10余人、中农20余人，由选出的村代表来参与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各项议案的讨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主持大会，他讲了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意义，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农民代表大会主要议程有5项：宣布土地法令和苏维埃政府一切决议和法令；成立革命委员会；分配粮食和游击队给养问题；建立赤卫队；号召群众推翻代表豪绅地主统治阶层利益的正宁县政府、区公所、反动民团。会上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于成立地点在寺村塬，群众习惯称其为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革命委员会由15人组成，农民委员10人，游击队委员5人，其中常务委员7人，正副主席3人。李杰夫（高维翰）任主席，张静元^①任副主席兼肃反委员，唐贵荣（西城村中农）任副主席^②。会上，副主席张静元代表新产生的革命委员会在主席台上发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粮食4个委员会。会议决定，陕甘游击队将没收的所有豪绅地主富农粮食进行

^① 张静元，选为陕甘边委员会副主席时27岁，系车家沟村贫农，常年给地主拉长工，胆大热心，经常给穷苦百姓帮忙，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

^② 据当时任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文书的李志合回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静元，副主席唐贵荣。这里采用《陕西代表团杜励君报告》的说法。

再分配，一部分分配给贫农、雇农、中农、苦力，一部分作为游击队给养。同时会议决定，以村为单位成立赤卫队分队；以乡或七八个村为单位成立赤卫队大队；各乡联合成立赤卫军总队部。并成立少年先锋队组织。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均属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

在革命斗争中诞生的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上创建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开创了在陇东地区建立革命政权的先河。寺村塬革命委员会虽然存在时间只有4个多月，但却是一次极具开拓意义的革命实践，其历史地位非常重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陕西甘肃边境地区创建革命政权的一次尝试，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威风，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陕甘地区播撒下革命的火种，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后来在照金、南梁的两次重建，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一页。

三、麻子掌、梁掌堡会议

1932年6月下旬，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200余人驻防宁县麻子掌。因前期韩城等地作战失利，陕甘游击队内部士气低落，思想波动大，出现了悲观情绪。为确定部队下一步行动方向，陕甘游击队召开队委会进行讨论。会上，领导层中发生了严重分歧，李杰夫等提出带部队南

下，到三原武字区去打游击，理由是那里有群众基础，条件好，利于开展工作；刘志丹等人提出的意见是，以桥山山脉为依托，继续在陇东和与陕西相连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理由是：桥山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这块地域东可以向陕北发展，西可以开辟陇东；可以发展骑兵，利于步骑兵协同作战。然而，刘志丹的正确意见并没有被李杰夫等人接受，两种意见争执不下。这时，领导层中有人提出：“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愿南下者跟我们走”的错误观点。刘志丹耐心讲道理，告诫大家不要因为打了几次败仗就闹情绪，而应该认真考虑行动方向的可行性，行动要保持一致，要尽快将部队开往山区休整，为下一步作战积蓄力量。但意见相左的这部分人听不进刘志丹的劝告，执意要走。结果造成要南下的70余人和要跟刘志丹北上的130余人分驻两村，准备分开行动。这次争论给陕甘游击队造成一次“南北分家”的困扰。

恰在此时，阎红彦、杨琪率领少年先锋队100余人也来到麻子掌不远的梁掌堡宿营，阎红彦得知“南北分家”的争论起因后，表示坚决支持刘志丹的正确意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主张南下的同志此刻也认识到党的利益的重要性和分开行动后的弊端，放弃南下主张。这样，在双方意见基本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在梁掌堡再次召开中共队委会，讨论游击队今后的行动方向和工作方针，队委会成

员最终统一了认识，克服了“南北分家”的错误，采纳了刘志丹、阎红彦的建议，决定以桥山中段的山区为依托，在陇东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发展。同时，会议决定将第三、第五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由阎红彦接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麻子掌会议引起争端，梁掌堡会议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可以视为是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变化过程。这是陕甘红军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坚持了刘志丹提出的游击战争应在山区发展的正确方向，使部队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心，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消极情绪，对陕甘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四、北梁会议

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外线作战后返回照金苏区，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这时也从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回到照金。此时，敌人正在对照金苏区发动新的“围剿”，为粉碎敌人的“围剿”，6月17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红二团党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红二团行动计划。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杜衡、刘志丹、汪锋、金理科、李妙斋、李杰夫、秦武山、师克寿、杨文谟、高锦纯、李秉荣、惠泽仁、魏武等。会上，有两种意见：以杜衡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敌人

力量大，群众基础差，部队天天跑着打游击，根据地很难扩大，主张南下渭华地区创建根据地。以刘志丹、金理科等为代表的大多数人，反对南下，主张坚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活动，发展和巩固根据地。习仲勋因为正在养伤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委托金理科把意见带到会上，“我就认为红军不能离开边区，远离苏区有了伤兵都没有办法。”^①但此时的杜衡已经被敌人的疯狂“围剿”吓倒，拒不执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红二十六军必须要更加紧创造以照金一带为中心的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向外发展的根据地”^②的指示，根本听不进刘志丹、金理科等人的正确意见，蛮横地坚持要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地区发展新的根据地，并提出南下渭华的4条理由：一是渭华地区有1928年渭华暴动的影响；二是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三是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四是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实际上，陕南的红二十九军早在1933年5月就已经失败，红二十六军南下只会陷于孤军深入的险地。刘志丹等人坚决反对南下，刘志丹在会上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

^①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139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82页。

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①杜衡却对刘志丹等人的意见横加指责，给他们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并硬性通过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创建渭（南）华（县）蓝（田）洛（南）根据地的错误决定。为了确保南下，部队作了必要的调整，把一些伤病员和身体较弱的战士留下来，把一些武器留给后方。南下的全团指战员共有300余人。

6月21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由北梁出发南下。途中，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工作，私自离开部队。不久，他在西安被捕叛变，堕落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务，出卖同志，使中共陕西省委遭到很大破坏。而红二十六军渡过渭河后，即陷入敌人重围，孤军苦战月余，最终导致红二团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敌包围，弹尽粮绝后几乎全军覆没，兵败终南山。数百名忠勇的红军战士血洒秦岭，幸存的红军指战员陆续化装返回照金革命根据地继续战斗。

北梁会议造成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首先是造成正在发展的照金苏区失去红军主力的支撑，虽然苏区内仍然有一定数量的红军和游击队，也有习仲勋、李妙斋、张秀山等人的坚强领导，但英勇善战的红二团一直是苏区的重要武装力量，对苏区的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红

^① 《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64页。

二团南下后，照金苏区人民虽坚持浴血奋战，顽强斗争，但在敌人反复的强势“围剿”下，根据地军民最终被迫从照金苏区撤出，根据地沦陷敌手。其二是南下造成红二团的失败。红二团成立于1932年12月，但此前从1930年太白起义起，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就开始为创建陕甘边的红色武装进行不屈不挠的努力，通过兵变、农运等活动组织起陕甘游击队，为红二团成立打下了基础。红二团指战员多是身经百战，革命坚决、思想觉悟高的革命志士，南下失败使得一大批优秀指战员血洒疆场，使得陕甘边的红军受到重大创伤，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三是造成陕甘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主力红军离开后，杜衡及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等人相继被捕叛变，造成陕甘地区党组织遭到大面积破坏，一批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牺牲。同时，照金苏区也在敌人强攻下失陷。这样，不仅造成陕甘边革命形势的逆转，同时，也造成陕甘地区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因此，北梁会议造成的恶果是血的教训。究其根本原因是“左”的错误决策完全脱离了当时西北地区革命的实际，非要在敌人统治力量强势的平原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这显然是拿着鸡蛋碰石头，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红军力量因此遭受严重削弱。

五、陈家坡会议

陈家坡会议，是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挫折的危急关头，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于1933年8月14日在陈家坡（地处陕西省耀县境内）召开的扩大会议。

会议召开之前，形势十分严峻。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行命令红二十六军红二团离开照金根据地，到平原和城市附近的渭华一带创建新苏区，导致红二团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敌包围，弹尽粮绝后失败。7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杜衡被捕叛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陕西、甘肃党组织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8月，渭北根据地在敌人强攻下丢失，原在渭北根据地坚持斗争的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以及刚刚改编为红四团的渭北游击队全部退入陕甘边照金根据地。照金根据地立刻成为敌军“围剿”的主要目标，根据地的安危，直接关系到陕甘边党和政府及红军的生存。陈家坡会议就是在这种危机重重的险恶形势下召开的。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耀县游击队队长陈子鼎，党代表张邦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王泰吉，红四团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

森、参谋长王伯栋和红四团连长、指导员等连以上干部。高岗在西安脱险后，也来到根据地，作为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习仲勋、秦武山主持。

会议历时三天，^①对当时形势和以后任务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当拿出切合实际的对策扭转被动局面。但是，在三支革命武装是统一活动还是分散活动的问题上，会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形势严峻，红军和苏区接连受挫，敌人攻势凶猛，成立主力部队目标大，在现在形势下还不行，主张各部队仍回原地分散游击，把红四团带回渭北，并且不承认高岗为省委代表；一种是以习仲勋、秦武山、李妙斋、高岗为代表，认为形势虽然严峻，困难很多，但仍有相当数量的红军和游击队，仍有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存在，只要根据地所有力量集中起来，就能形成打击敌人的一只有力拳头。应当采取的战略方针是：打击敌人的薄弱部分，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扩大边区的游击战争；照金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好，人民觉悟高，可以同仇敌忾与敌人斗争。如果分散活动，在强敌面前，失去统一指挥，失去照金根据地的依托，就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主张立即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武装力量，坚持扩大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在讨论临时总指挥部的人选问题上，对王泰

^① 一说一天半时间。

吉任总指挥的提名，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表示不同意；经过充分讨论，大多数同志表示同意王泰吉任总指挥部总指挥，同意高岗担任总指挥部政委。对此，黄子祥、王伯栋二人仍然坚持反对意见。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正确分析形势，纠正了部分干部中产生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分散红军的错误主张，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作出以下决议：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以及各支游击队；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决定撤销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改编为一个大队，称谓是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

陈家坡会议，是在红二团南下失败后，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处于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是以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党组织和红军，在失去上级党组织领导和刘志丹尚未脱险回归照金根据地的情况下，坚持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坚强的核心领导作用，自觉运用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并结合陕甘边的实际，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及时纠正“左”倾和右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使陷入危机的陕甘边革命形势重获生机。二是在陕甘边党和红军的生存问题上制定了正确的战

略方向。在红二十六军红二团被“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断送的情况下，急需一支新的力量来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担负起保卫照金根据地的重任，会议作出集中陕甘边区红军力量、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决定是符合实际的。陈家坡会议之后，新成立的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部队，集中兵力打退了敌军对照金根据地的“围剿”，从而避免了三支主力部队如果分散活动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三是决定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这是陕甘边党和红军战略方向的正确选择。陈家坡会议之后，在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指挥下，陕甘边红军迅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先后消灭驻让牛村的雷天一民团和驻庙湾的夏玉山民团，以及柳林民团；9月又在旬邑县底庙地区消灭国民党地方民团一部，迫使照金根据地周围的反动民团后撤。这些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显现出陈家坡会议具有的重要政治军事领导作用。四是陈家坡会议为随后召开的包家寨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果说陈家坡会议初步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那么在包家寨会议上是更进一步的清算，这对于陕甘边党组织和红军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作用。10月，刘志丹辗转回到照金根据地后，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立即予以充分肯定：“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

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①刘志丹这段话总结了陕甘边革命陷入低潮的经验教训，肯定了陈家坡会议坚持实事求是的政治思想路线，制定符合陕甘边实际的正确战略方针，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

六、包家寨会议

1933年11月，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由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主持召开的联席会议，是在陕甘边区党和红军丧失照金革命根据地、开展无后方根据地反“围剿”游击战的困难时刻召开的重要会议，是继陈家坡会议之后决定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新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一次解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问题的关键性会议。

1933年秋，根据陈家坡会议精神，陕甘边红军主力执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敌人重兵“围剿”照金根据地时，主动跳出到外线作战，并连续取得攻克旬邑张洪镇、合水县城、庆阳三十里铺、毛家沟门等重大战斗的胜利，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但就在跳出外线的红军主力作战不断报捷的情况下，照金根据地已处于强敌围攻的主要地区，红军留守部队战斗进行得十分艰苦。照金根据地中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心区薛家寨军民浴血奋战数昼夜，李妙斋等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1933年10月15日，薛家寨最终在敌人强攻下失守。照金革命根据地失陷后，陕甘边党政机关和主力红军失去了稳固根据地的依托。陕甘边武装斗争下一步如何发展，作为生死存亡的又一个节点，包家寨会议的适时召开带来了转机。

包家寨会议之前，刘志丹就已经考虑到陕甘边革命斗争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并向陕甘边区党政军一些领导提出了研究解决今后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的建议。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刘志丹、王泰吉、张秀山、高岗等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以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寺村塬革命根据地和照金革命根据地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真听取了刘志丹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生存发展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建议，讨论了恢复红二十六军、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今后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会议做出了三项重大决策。

一是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并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红二团南下失败先后回来

的百余人以及少年先锋队合编为红三团，将红四团改编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上述各部队统归红四十二师管辖。

二是会议决定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创建中心革命根据地。新成立的红四十二师向陇东南梁地区进军，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和壮大主力红军，在南梁地区建立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三是会议决定以陇东南梁根据地为中心，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开辟三个战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先前派出的强世卿领导的陕北游击队为基础，逐步扩大革命武装。活动地区以安定为中心，逐渐向南发展，其目的是与南梁中心根据地相连接；第二路游击区，以陇东的庆阳、合水、保安三支游击队为基础，不断扩大革命武装，成立第二路游击队，杨琪任总指挥。活动区域以陇东南梁为中心，不断向四周发展扩大根据地。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的游击队为基础，活动区域以照金为中心，建立关中游击区，逐渐向北发展。三路游击区共同以南梁为中心基点，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各游击区，根据战时需要，沿桥山子午岭山脉向南北发展。三项重大决策相辅相成，其核心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将陕甘边武装斗争重点转移到南梁地区，以解决红军未来发展的战略靠背问题。

包家寨会议确定的重大决策，成为陕甘边武装斗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

包家寨会议确定了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重大问题，解决了陕甘边红军行动方针这个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以南梁作为陕甘边区革命的中心，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格局勾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从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嘉塬正式建立，到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失陷，在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实践中，陕甘边党和红军屡受挫折，但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陕甘边区的武装割据能否成功，关键点是在哪里去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这一根本性问题始终在探索中。陕甘边寺村塬根据地和陕甘边照金根据地的相继丢失，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认识到，要坚持陕甘边游击战争，在创建根据地时必须考虑到地理环境因素的重要作用，必须选择一个适于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区域。对此，包家寨会议决定把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放在南梁地区，这是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做出的选择。南梁地区地理环境、群众基础等条件较为理想，这里山大林密，交通不便，远离敌人统治中心，斗争有回旋余地，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红色江山要靠革命武装来开创和保卫。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组织和红军领导人在斗

争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的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要创造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新的革命根据地，就必须加强红军主力部队。重建红二十六军，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是首要的军事任务。包家寨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是适应了这种需要，为新的根据地的开辟准备了一支武装生力军，有力地保证了南梁中心区域的开辟。

包家寨会议明确提出了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新模式。习仲勋后来总结指出：“我们确立了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即以南梁堡、华池县为中心建立基础，再向南北发展，主力二十六军依据这个中心地区，南北策应，把一、二、三路根据地打成一片，创造大块陕甘苏区。”^①要巩固南梁中心区域，必须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此，包家寨会议决定建立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并相应地组建了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发展。实践证明，包家寨会议所作出的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后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格局正是如此。

包家寨会议对“左”倾错误进行了自觉抵制。在寺村塬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时期，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

^① 习仲勋：《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1945年7月11日），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407页。

杜衡等人排斥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使陕甘边革命斗争遭受过多次重大挫折。包家寨会议在提高思想认识、确立正确路线的基础上，指出杜衡“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在有利形势下，提出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政策，放弃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和扩大根据地的机会；在强敌进攻时，搞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强令红军主力孤军南下，造成渭北根据地、照金根据地的危机。因此，包家寨会议的历史功绩，还在于自觉抵制“左”倾错误，从而保证了陕甘边党组织和红军能够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进，并取得重大成就。包家寨会议，标志着以刘志丹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党组织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成熟，他们领导陕甘边革命斗争进入全盛时期。

包家寨会议所制定的战略决策，迅速推动陕甘边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包家寨会议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刘志丹的率领下，向陇东出击，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习仲勋、张策等人在南梁一带进行了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经过陕甘边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迅速开辟了陕甘边南梁中心根据地，使红军摆脱了无后方根据地、难以立足的被动局面。到1934年秋，南梁中心区域得到了更大开辟，陕甘边南区（关中地区）的斗争也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党和红军在陕甘边区18县的部分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在革命形势大发展的基础上，1934年11月7

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又称南梁政府）在南梁宣布正式成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是包家寨会议正确决策的成果，包家寨会议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包家寨会议，是以刘志丹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党组织和红军领导人，自觉运用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解决陕甘边革命实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清算了王明“左”倾错误在陕甘边地区造成的恶劣影响，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确定了关于建党、建军及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正确的重大决策，迅速地推动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大发展。

七、莲花寺整编大会

1933年11月，根据刚刚结束的包家寨会议精神，决定对陕甘边红军部队进行整编。

11月8日，在刘志丹、王泰吉等主持下，陕甘边红军全体军人大会在合水县葫芦河北岸的莲花寺召开。会上宣布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正式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副主任龚逢春，供给处主任刘约三。红四十二师师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

警卫连。下辖红三团、骑兵团，共500余人，战马60余匹。红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 and 红四团少年先锋队合编，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一连连长赵国卿，二连连长陈学鼎、指导员张邦英，少年先锋队连连长王有福。骑兵团由红四团一、二连编成，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一连连长李志柏，二连连长高占胜。

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红军建军原则，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师、团成立了党委，师党委书记杨森，高岗、张秀山、黄罗斌、高锦纯等任党委委员。各连队成立党支部，以加强党对红军部队的绝对领导。刘志丹对在红军部队中建党工作非常重视，他经常教育党员干部，要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部队政治思想工作。

莲花寺整编大会的积极意义有以下几点：一是落实了包家寨会议精神，恢复重建了红二十六军；二是发展壮大红军队伍，红二团南下失败时整个红二十六军只辖一个团，而在莲花寺恢复重建的红二十六军发展到一个师，下辖两个团，以后发展到五个团；三是加强了党对红军部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原则得到充分运用，在师、团、连各级建立党组织，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四是为开辟新的陕甘边根据地准备好了军事力量，红四十二师一成立，就积极投入到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的军事斗争中，并很快打开局面，完成了创建南梁中心根据地的任务。因此，莲花寺整编对陕甘边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都有积极深远的影响。

八、南梁寨子湾会议

照金苏区失守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赴西安寻找陕西省委恢复关系未果，其他特委委员分散活动，特委组织机构一直未能健全。红四十二师在莲花寺成立后，由师党委代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职权，统一领导陕甘边区红军和地方党的工作。随着南梁苏区日益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在南梁及周边地区的迅速发展，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工作也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成立陕甘边区军事领导机构，统一领导陕甘边区各支武装力量也迫在眉睫。

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组织机构，恢复日常工作。会议决定由张秀山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刘志丹、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张静元、惠子俊、蔡子伟、刘景范、龚逢春、李生华为特委委员。特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等工作机构。由蔡子伟任特委秘书长，张邦英任组织部长，张静元任宣传部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是党在陕甘边区的最高领导机关。

会议同时作出了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高岗任政委，边金山任副主席，吴岱峰任参谋长，杨在泉任秘书长，马锡五任供给部长。军委委员由刘志丹、高岗、杨森、杨琪、黄子文、吴岱峰、王世泰、黄罗斌、张仲良、张秀山、边金山、郑伯雄、孔令甫、刘景范、高锦纯、黄子祥、赵国卿、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等20人组成。军委机关设在南梁寨子湾。军委辖红二十六军和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大队、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

南梁寨子湾会议是陕甘边区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党的领导是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从路线、方针、政策上领导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恢复，健全了陕甘边区党组织机构，为推动陕甘边区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是陕甘边苏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指挥陕甘边苏区的各支革命武装力量，领导红二十六军和地方游击队保卫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根据地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九、南梁荔园堡会议

1934年7月下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南梁的荔园堡

召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陕甘边区党的任务和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建设等重大问题。参加人员有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高岗、杨森、张邦英等。经过与会人员充分讨论，会议通过并发布了《陕甘边区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又称《七月决议》），《七月决议》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红军建设、土地革命、群众工作、游击战争、抗日工作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新的任务。在《七月决议》的指导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七月决议》概括分析了全国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基本形势，指出“全国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展与游击运动普遍扩大”，“特别是在陕甘边区，红四十二师与各地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之下，群众斗争的情绪愈加深入”。^①检查总结了陕甘边党政军等各方面的工作，全面部署了边区各个方面的任务，提出了加强陕甘边根据地全面建设的战略性措施，是指导陕甘边革命斗争持续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主要内容为：

把党的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七月决议》针对“党的政治工作不够深入”、“一切工作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后面”的状况，强调要在边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为从

^①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1934年7月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65、266页。

思想上提高认识，特委开设训练班，部队开办短期训练班，加强理论学习，注重干部思想水平的提高；在党组织建设上，《七月决议》强调陕甘边区党组织要加强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尽快健全完善各级党组织，在边区发展党员，使边区党组织真正成为群众的领导核心。^①为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七月决议》强调提拔优秀干部担任区委书记，并吸收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入党；在党的作风建设上，强调领导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做好群众的工作。根据边区男同志多承担打仗任务的情况，提出群众工作中尤其是要做好妇女同志的工作，鼓励广大妇女参加洗衣队、慰劳队、缝衣队，更好地为红军服务，不断密切党群关系。

加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七月决议》提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目标任务是：“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正式苏维埃政权”。^②强调在抓好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设的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争取在十月革命纪

①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 1934 年 7 月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第 266 页。

②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 1934 年 7 月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第 268 页。

念日那天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七月决议》还提出要加强党对临时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积极发展农联会、赤卫队、少先队等形式的群众组织，使各级政权建设更为系统化，提高工作效率。

明确了红军建设的基本思路。《七月决议》提出在红军建设上要加强军事训练和发展工作，要把扩红作为部队建设的中心工作。提出了第二路游击队和第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各完成扩大一个团红军的硬任务；建议红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扩大一个师红军的任务，努力扩大为一个军的建制。《七月决议》认为军队建设的关键是巩固部队。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部队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要组织列宁室^①、识字班、政治研究会，开设军事政治学校等，努力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为壮大红军，《七月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打入敌人内部，发动革命兵变，瓦解敌人，壮大红军武装力量。《七月决议》还强调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组建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强调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要想方设法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确定开展土地革命是陕甘边区最迫切的任务。《七月决议》提出，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必须实行土地革命，

^① 指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一种俱乐部，举办政治讨论和识字、游艺等活动。

这是最迫切的任务，分配土地范围不限于苏区内的土地，在各游击队活动区域内和群众斗争情绪高涨、有革命愿望的地方，同样可以进行土地分配工作。

在战略方向上，《七月决议》提出要创造和巩固南梁中心苏区，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并在巩固老苏区的同时，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

《七月决议》是以刘志丹、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党组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陕甘边实际问题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标志着陕甘边党组织领导核心在政治上的逐渐成熟。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长期实践中，刘志丹等人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实事求是地、灵活地、创造性地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七月决议》结合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确定了陕甘边关于建党建军和创建根据地的重要决策，提出要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虽然之前在红军和游击队建设上，始终体现了党的领导，但写进党的决议却是陕甘边区的第一次，因而它是陕甘边党组织和红军建设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发展中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七月决议》后来被收入到党的重要文献汇编《六大以来》一书中。

十、南梁阎家洼子会议

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与中共陕北特委在南

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决定红二十六军主力开赴陕北，这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陕北红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4年7月25日，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围剿”，谢子长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来到南梁，协调调动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北上，准备制定陕甘边苏区、陕北苏区共同联合起来粉碎敌人“围剿”的行动计划。7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中共陕北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南梁阎家洼子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地区帮助打开陕北游击战争的局面，以及两个根据地武装力量协调行动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张秀山，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区特委组织部部长张邦英，特委委员张策，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杨琪，政委惠子俊，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团长王世泰，政委赵国卿，以及连以上干部；陕北方面的主要领导人有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及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支队长以上干部，两方面代表共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谢子长主持。会上，杨森代表红二十六军党委汇报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扩大和创建南梁

中心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谢子长及与会代表对杨森代表陕甘边党组织和红军所作的关于党政军建设的汇报以及今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建议表示赞同。“认为四十二师面对敌人多次‘围剿’，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有力地粉碎了敌人‘围剿’，而且创建了南梁根据地，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认为四十二师所提出的今后意见符合实际，是可行的。”^①

会议分析了根据地所面临的形势和敌人对陕北根据地发动“围剿”的情况。经研究协商，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定：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主力第三团由谢子长率领去陕北，与陕北游击队配合作战，共同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同时，陕甘边区调拨100支步枪和数百块银元支援陕北游击战争；调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撤销其担任的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接任政委一职。

会上，谢子长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信中不切实际地对红二十六军的多次战略转移行动进行批评，指责红二十六军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的错误。接着，郭洪涛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表示拥护和赞同这两封信

^① 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734页。

的观点，重复了北方代表指示信中那“五顶大帽子”。此次会议后，郭洪涛写出《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上报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同时在陕北特委机关刊物《西北斗争》上刊登。指示信传达后，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杨森等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干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些无端指责，通过总结陕甘边区具体工作，说明坚持以南梁为中心扩大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刘志丹说，有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是不行。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①并强调指出，“我们不到梢山地区就存在不住，建立不起根据地。游击战争不跑就不是游击。抓革命的枪杆子就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建立革命的武装，是一条革命的真理。”^②

阎家洼子会议尽管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其主导方向是正确的，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阎洼子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应陕北特委的要求，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地区帮助打开陕北游击战争的局面，以及

^① 巩世峰主编：《陇东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83页。

^② 黄罗斌：《具有高尚品格的领袖人物——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四十八周年》，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7页。

两个根据地武装力量协调行动的问题。”^①阎家洼子会议通过深入讨论分析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斗争形势，第一次使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游击区确立了互相配合和协调作战的正确方针，对于粉碎敌人对根据地发动的“围剿”、促进两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通过这次会议，加强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系，派出北上陕北作战的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主力红三团也不负众望，协助陕北红军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对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1935年1月，陕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这其中就有红二十六军北上作战的功劳。同时，这次的联席会议也为以后陕甘边、陕北联合开展反“围剿”斗争，两块根据地的最后统一打下了好的基础。这是一次具有决策性的重要会议，在陕甘边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但是，在阎家洼子会议上，由于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的两封指示信和个别领导人的发言，都带有浓厚的“左”倾错误倾向，给本来团结融洽的会议气氛蒙上了阴影，特别是对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无端指责是非常错误的。但这些指责并没有影响到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对党坚定不移的信念和革命干劲，他们顶着压力，排除这些“左”倾错误的干扰，从大局出发，把全部

^① 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74页。

精力投入到研究和领导陕甘边区和红军的发展这些大事上，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证了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顺利发展。

十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

1934年秋，根据陕甘边区特委通过的《七月决议》中关于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府的精神，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着手筹备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4年11月1日至6日在南梁荔园堡的一座关帝庙召开，到会的有从陕甘边区的贫苦农民、游击队、赤卫军和红二十六军选举出的工农兵代表100多人。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讨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会上，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文化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等人向代表们介绍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并结合陕甘边区的政权建设介绍了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基本情况，对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等工作进行了总结。经大会代表表决，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

案》等重要文件。代表们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任副主席，政府政治秘书长蔡子伟（后张文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劳动委员会委员长张钦贤；土地委员会委员长李生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杨玉亭；粮食委员会委员长呼志禄；肃反委员会委员长郝文明；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长惠子俊；文化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兼）；妇女委员会委员长高敏珍（后张景文）；《红色西北》报编辑部负责人蔡子伟（兼）。会上还选举成立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吴岱峰任参谋长，马锡五任供给部部长，秘书长杨在泉；朱志（子）清任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贵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在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的基础上，还组建了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郭锡山任大队长，宋飞任副大队长，辖3个中队，共100余人。

在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成员的基础上，1934年11月7日（即苏联苏维埃革命纪念日），在南梁荔园堡隆重召开了庆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除正式代表外，还有南梁地区的红

军、游击队员、赤卫军和群众，共计3000余人。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会标，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刘志丹、习仲勋等新当选的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在会上讲话，刘志丹郑重地向习仲勋颁发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大印。会后，在荔园堡举行了威武雄壮的阅兵仪式，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全副武装，排着整齐的队伍通过主席台前，接受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和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领导成员的检阅。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实现了陕甘边区苏维埃临时政权向正式苏维埃政权的转变。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所辖各县的革命委员会或办事处等临时红色政权也相继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府。

十二、周家岭会议

1935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陕西安定县周家岭共同召开的联席会议，是决定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走向统一、最终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会议。

1935年1月上旬，刘志丹率部北上，在安定县水晶沟看望了重伤在身的谢子长，针对蒋介石在围追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和其他红军部队的同时，又调集4万人马对陕甘边、陕北苏区发动更大规模“围剿”的严峻形势，刘志丹

与谢子长商谈了根据地反“围剿”的方针和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统一领导等重大问题，决定尽快召开会议研究这些重大事项。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安定县的周家岭召开党政军领导联席会议，讨论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和制定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战略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组织委员郭洪涛，宣传委员马明方等。谢子长因伤势严重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由刘志丹主持。会上，刘志丹传达了他和谢子长共同商定的意见。周家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经过商讨的关于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的建议，通过了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抗日反帝工作等方面的政策。会议决定了如下重要事项：

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任书记，刘志丹、习仲勋、马明方等20人为委员。“原中共陕北特委撤销，所属各县县委由中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区特委仍然保留，继续领导陕甘边区各县委的工作。”^①李生华、刘景范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和军委书记。李生华不久去陕北学习，习仲勋实际主持中

^① 曲涛主编：《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76页。

共陕甘边区特委工作。

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两个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的反“围剿”军事行动，选举刘志丹^①、谢子长为西北军委主席，高岗为副主席。

制定了粉碎敌人对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即集中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主力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陕北作战；集中兵力先打击北线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之敌，尔后向西、向南发展，逐步打通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的联系，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一部和地方红军游击队坚守陕甘边根据地，坚持开展军事斗争，打击和牵制南线、西线之敌，配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陕北战场的作战。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后，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周家峪会议从组织上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党的领导工作和红军统一指挥反“围剿”的工作，对于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推动土地革命斗争在西北地区的蓬勃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为指挥前线作战，西北军委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

^① 关于西北军委主席的任职，一些文件和历史书籍写为“一说谢子长”，笔者认为，成立西北军委是刘志丹、谢子长共同商定的，且谢子长在西北军委成立半月后即因伤势恶化去世，因此，两人同任西北军委主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白坚任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任秘书长，朱子休任参谋长。前敌总指挥部下辖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统一指挥陕甘边、陕北红军主力和游击队开展反“围剿”斗争。1935年5月2日，“西北军委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地动员条例以及处决土豪劣绅等一系列规章。”^①进一步加强了军队建设。在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陕甘边红军主力和陕北红军主力兄弟般的团结，成为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坚强柱石。

至1935年6月底，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指挥下，相继解放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立足点和新的革命开始的出发点。

十三、中共西北工委永坪扩大会议

1935年7月，中共西北工委在陕西延川县永坪镇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及中共河北省

^① 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752页。

委给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指示信。

1935年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决定派遣朱理治到陕甘苏区领导工作，5月成行，7月初到达永坪镇。7月15日，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所在地延川永坪镇，朱理治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会议召开时，在前方打仗和在陕甘边区基层工作的工委执行委员和西北军委委员都没有被通知来参会。永坪会议持续开了7天。会上，朱理治传达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中共河北省委1934年7月13日至1935年5月25日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致陕北特委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甘边特委及全体同志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北、陕甘边特委指示信》、《中央驻北方代表五月份机密指示》等五封指示信。这些指示信有许多不切合西北实际情况的言论，并错误地指责一些人是“陕甘边的右倾取消主义者”，提出“积极争取苏区的领土不使一寸为敌人所蹂躏”等空洞口号。7月21日，会议通过了《中共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和《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共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虽然肯定了陕甘党组织“开始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初步的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但更多的是围绕西北党内必须“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这一中心问

题，对西北的形势及党的任务，作了“左”的估计和规定，并指责“陕甘党内存在的严重的弱点和错误”。决议案提出了四项任务：“（一）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使陕甘党完全站在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二）要实际完成实足铁的两军红军（九千人数）；（三）争取到数县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四）创造几个模范支部”。^①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是对前一个决议案的具体化和任务化，《决议》提出了八项任务：紧急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巩固发展陕甘基本苏区，创造新苏区与新游击区，与陕南与川陕苏区连成一片；扩大红军6000人；彻底领导分配土地与查田斗争；进行政治动员，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组织工会、贫农会、儿童团、妇女联合会等工作；加强白区城市和士兵工作，组织兵变；加强党的领导，猛烈扩大党的组织。

会议传达的五封指示信，带有明显的“左”倾痕迹，为后来的错误肃反埋下了导火索；会议通过的两个决议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陕甘苏区所创造的成绩，所提出的工作任务在陕甘苏区开展的各项工作上也有一定的积极指导意义，但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多项任务及其具体措施的制定，是脱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实际情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52-55页。

况的。比如说要求西北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运用红军的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的进攻敌人”，“不让敌人践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争取这次战役的全线胜利”，“联系陕南与川陕苏区为一片”等。因为不切实际，所以在以后的任务完成度上，就大打折扣，比如说扩红，就没有达到决议案中提出的人数目标。由于永坪镇扩大会议对敌人发动第三次“围剿”的军事态势没有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对红军军事部署并没有细致的策划，所以指挥进行的一些军事行动也是不成功的。

十四、杨家园反“围剿”军事会议

1935年7月下旬，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红军主力兵团转进至安定的杨家园、湫峪沟一带休整备战。就在此时，刘志丹得到国民党部队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的军事部署情报，国民党部队将以大于红军十余倍的兵力发动大规模“围剿”。面对严峻形势，采取什么样的反“围剿”方针才能制胜，是摆在红军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7月21日，刘志丹在杨家园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反“围剿”军事会议，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战术原则以及军事部署等问题。会上，刘志丹分析了敌情，认为对敌人不利的因素有三点：一是敌人调动这样大的兵力，肯定会受到交通运输的限制，粮秣供应也会很困

难，其行动定会迟缓；二是各个军阀之间，杂牌军与嫡系之间，为保存实力和地盘互不信任，矛盾重重，各线在“围剿”行动上不能保证完全的协调一致；三是东北军远道而来，不熟悉黄土高原地形，没有和红军、游击队交过战，难以发挥其优势。这些都是敌军弱点。根据刘志丹的敌情分析，会议决定，集中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乘敌之隙，各个击破，积小胜为大胜，粉碎敌人的“围剿”。在蒋介石的“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以前，首先打击深入根据地东线一带的晋军先头部队，挫败其西渡黄河的企图，然后挥师南下，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寻机歼灭深入根据地南线一带的东北军一部，粉碎敌人的“围剿”。为了配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行动，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一团和骑兵团仍在洛河以南和咸榆大道东西两侧的苏区坚持斗争，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迟滞南线敌东北军的行动。陕甘革命根据地西部的各路游击队、赤卫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敌军物资的运输队和粮草武器的堆转站，骚扰牵制西线敌军的行动。

杨家园会议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面对数倍于己敌人的“围剿”，会议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寻找薄弱环节打击敌人。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符合陕甘地区实际情况的，8月11日，西北红军取得慕家塬战斗胜利；8

月21日，西北红军与晋军激战于定仙塬并取得重大胜利，俘敌1800余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迫使晋军后撤，实现了分化敌人、削弱敌人“围剿”部队力量的战略意图。

十五、文安驿会议

1935年7月15日西北工委永坪镇扩大会议召开时，因为在前方作战的部分西北工委执行委员和西北军委委员都没有参加会议，等前方战事稍息，部队到达延川的文安驿、禹居镇一带休整时，刘志丹为了让大家及时听到上级指示，遂派人邀请中共驻西北代表团书记（虽然西北代表团的正式组成是在9月份，但朱理治此时已经是实际负责人）兼西北工委书记朱理治和西北工委秘书长郭洪涛来到延川文安驿作报告。

8月27日，前敌总指挥部在文安驿召开会议，议题有两项：一是由朱理治向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连以上党员军政指挥员传达西北工委永坪镇扩大会议上关于“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决议；二是讨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一步的作战方针。第一项议题用了三天半时间，朱理治把1934年7月13日至193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的五封指示信，连同永坪镇扩大会议的两个决议一起在会上进行了系统传达。并要求参加会议的军政指挥员以如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为议题，讨论两天。对于会议传

达的这几封指示信，参会的红军指挥员大都不能理解，也不愿接受，并提出一些质疑。

会议的第二个议题是讨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一步作战行动。朱理治、郭洪涛提出要运用红军的基本运动战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地进攻敌人，要夺取绥德县城、延安县城、清涧县城、瓦窑堡等中心城镇，首先是夺取瓦窑堡。刘志丹等人认为，西北红军的装备条件，还不能担负以攻坚战来夺取中心城镇的任务，对于敌重兵驻守的瓦窑堡等中心城镇，只能利用敌处在我根据地红色农村层层包围之中的优势，使用游击队和赤卫军、少先队以及非武装的革命群众，采取长久围困的战术，分化瓦解的策略，相机夺取，而绝不能用强攻硬打的战术。刘志丹提出，面对十几万敌人的进攻“围剿”，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应该转入南线作战，对立足未稳的东北军寻机打击，宣传抗日反蒋、收复东北失地的道理，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在战术上要先从敌人薄弱环节入手，不断地歼灭敌人的班、排、连、营、分队，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团级部队，积小胜为大胜，首先夺取南线的胜利。如果南线能够取得胜利，其他方面的敌人被震慑，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这些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受到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军政指挥员的赞同，但却没有被朱理治等人所接纳，会议最后作出强攻瓦窑堡或清涧县城的决定。

文安驿会议传达的五封指示信，使得“左”倾思想影响在红军队伍中进一步扩大。同时，由于西北代表团是党中央派驻西北的最高领导机关，因此，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上级领导的意见，决定红军主力攻打瓦窑堡或清涧县城。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开始进行攻击瓦窑堡的准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沿永坪川、青坪川两路向瓦窑堡城郊外围运动；红四十二师三团到南线牵制迷惑敌人。9月3日，刘志丹、高岗在瓦窑堡郊外查勘地形时，发现城里城外碉堡林立，沟壑纵横，防守严密，易守难攻。经研究认为，强攻瓦窑堡，纯粹是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这项任务难以执行。此时，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总指挥曹动之提出改打敌人兵力部署较弱的横山县。刘志丹和高岗遂决定奔袭横山县城。

9月11日凌晨，攻城战斗打响。红军在偷袭时由于攻城的云梯太短，攀爬没有成功，后采取强攻也未奏效，只好撤退。奔袭横山虽然攻城未克，但还是达到了打击北线敌人、巩固陕甘苏区的目的。敌八十六师在红军打击下，被迫收缩兵力，从而减轻了对神府苏区的压力。但因为从实际出发的刘志丹等人没有去攻打敌人防守严密的瓦窑堡，这成为后来被错误肃反的一条理由。

十六、中共西北工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永坪联席会议

1935年5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根据北方局中央代表提出的应加强陕甘苏区领导的意见，亦派临时中央局组织秘书聂洪钧前往陕甘苏区工作，经过一路辗转，聂洪钧于9月初到达永坪镇。9月15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永坪镇。随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成立，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三人组成，朱理治任书记。

9月17日，中共西北工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主要解决统一党的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方针问题。中央西北代表团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西北工委的惠子俊、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鄂豫陕省委的徐海东、戴季英等30余人出席会议。

会议决定改组党的领导机构，除中央代表团全面负责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各项工作的领导外，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马明方、王达成、聂洪钧、郭洪涛、白茜、刘志丹、高长久、程子华、徐海东、郭述申、慕生忠、慕纯农、戴季英为省委委员。朱理治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秘书长李景波，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郭述申，白区工作部长慕生忠，妇女部长白茜，政治保卫局局

长崔田民（不久由戴季英接任）。

会议决定改组军事领导机构，由聂洪钧任西北军委主席，范子文任军委秘书长，戴季英任参谋长，白如冰任供给部长。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红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师：红二十五军改编为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红二十六军改编为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红二十七军改编为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全军团共7000余人。9月18日，在永坪镇召开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

联席会议召开在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会师之时，军事领导机构的补充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会议制定的继续开展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策略也是正确的。会议后，根据刘志丹之前对敌情的分析和从敌人薄弱处下手的主张，提出了是先打东北军还是先打陕北军阀高桂滋、井岳秀两种意见。经讨论，认为东北军背井离乡，情绪不稳，取胜把握更大一些，遂作出先打东北军的决定。红十五军团立即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在徐海东、刘志丹等人指挥下，相继取得劳山和榆林桥战役的重大胜利，为彻底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然而，联席会议也有一些负面因素。如在党的领导机构调整上，对陕甘革命根据地长期工作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使用上是不够的，有些有重要贡献的人没有被吸纳到党的领导机构中，如习仲勋、惠子俊、刘景范等人。西北军委的组成也忽视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军事领导人这一重要层面。这些因素多少会影响到新的领导机构中一些人对根据地人与事的判断评价不够客观，直至后来导致肃反扩大化。

由于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苏区前错杀了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并从张汉民那里得知他与刘志丹、高岗等人关系紧密，由此红二十五军个别领导人得出错误结论，认为红二十六军里有些问题。朱理治、聂洪钧作为中央代表到达陕甘苏区后，也直接负有“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的使命。9月底，中央代表团决定在陕甘苏区正式开始肃反。错误肃反导致陕甘苏区县以上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以及在机关、学校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被抓，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主要领导被关押。其中200多人惨遭杀害。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得知陕甘苏区发生了错误肃反问题。中央立即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①刘志丹等被关押人员先后得以释放，并陆续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8页。

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193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共陕甘晋省委改为中共陕北省委，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改为中共陕甘省委。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陕甘苏区步入新的发展里程。

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至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在陕甘革命根据地（1936年5月发展成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又召开过吴起镇会议、铁边城会议、瓦窑堡会议等数十次影响中国革命大局的重要会议。这些会议是面向全党、面向全国的更高层次的会议，本文不再详叙。

陕甘边苏区的统战工作及其主要特色

核心提示：陕甘边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西北地区硕果仅存的两块根据地之一，其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与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实践是分不开的。本文论述了陕甘边苏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实践及其主要特色，认为陕甘边苏区的统战工作讲求实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对各种复杂环境和不同阶层，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的统战政策，使党的统战理论得到了成功的实践。

统一战线，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地处陕西、甘肃边境地区创建的陕甘边苏区之所以与陕北苏区共同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其成功因素之一就是充分运用统一战线这一大法宝。陕甘边苏区统战工作颇有特色，积累的经验非常丰富，可圈可点的事例很多。可以说，陕甘边苏区的成功创建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紧密结合的一个范例。

一、成功的兵运工作为陕甘红军的创建和持续开展对国民党部队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

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提出：全党要开展广大的反对

军阀战争的运动，破坏军阀军队，努力争取士兵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之后，中共中央为领导兵运工作，专门成立了兵士科（后改为破坏部）。兵运工作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陕西问题决议案》，专门就陕西、甘肃党的工作作了安排部署。《决议案》指出，当前党在陕甘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士兵工作，发动和争取士兵群众要与工农斗争结合起来，同时可打入现有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内，使之逐步转为自己的武装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决议，中共陕西省委把瓦解敌人和组织革命兵变定为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11月23日，中共中央军事部制定的《目前扩大红军计划大纲》，对兵运工作作出新的指示：扩大红军与有计划地组织兵变，成为目前军事工作的两大任务。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兵运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担负起在陕甘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任务，陕西省委决定大力开展西北地区的兵运工作。从1929年起，陕西省委陆续派出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打入西北各军阀部队，他们和原在地方军阀部队中隐蔽的党团员一起，开始进行兵运工作，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就是兵运工作中的杰出代表。

（一）兵运工作为陕甘边苏区革命武装力量的组建奠定了基础

为创建革命武装，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一批党、团员

打入陕北高自清、杨庚午、陇东谭世麟、宁夏苏雨生等地方军阀部队中。1930年春，习仲勋也被派到驻长武的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兵运工作充满艰险曲折，也有极大的危险性。如刘志丹曾被苏雨生扣押囚禁，面临生命危险，在党组织营救下才获释出狱。习仲勋曾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①在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坚定革命信念鼓舞下，陕甘边苏区的兵运工作迅速开辟出新的局面。

兵运工作必须要在国民党部队中发展中共组织的力量，因此，组建党的秘密组织，成为兵运工作首要的任务。打入敌人内部并设法取得合法军职的中共党员们，在所属各部队中秘密发展党员，筹建党的组织。陕西警备第三旅、甘肃警备第三旅组建了中共团党委，在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等部队中建立了营党委，在驻庆阳石子俊部、驻平凉刘宝堂部、驻天水马青苑部、驻河西马仲英部、驻定西段象武部、驻兰州邓宝珊部及陕西省政府的警卫团、特务团等部队中，也都建立了党的支部或派入党员开展活动。国民党部队内中共组织的秘密建立和党员的积极活动成为兵运工作中的核心力量，为发动兵变奠定了基础。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陕甘边游

^①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66页。

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议》认为：“在空前的灾荒与农民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陕甘边的赤色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英勇战斗中，得到了许多新的胜利，而且日益壮大起来，他正走向与三原的农民武装队伍汇合起来，而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证明了党提出的‘要在这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域，集中力量去发动那边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在北方要特别注意兵变发展的区域，使这些兵变配合着当地的农民与工人的斗争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决议》还指出：“应该派遣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组织兵变与煽动他们投入红军。这种工作要与红军的武装战斗同时并进。同时中央责成陕西省委去加强在杨虎城及其他军阀中心部队中的我们的工作。”^①《决议》并要求陕西省委尽快成立红二十六军，创建陕甘边新苏区。

此项决议形成前，中共陕西省委已经在为筹备成立红二十六军做准备，除加大农运、工运工作，以图拉起工农武装外，更大的关注点是在兵运上，这是因为军人有战斗经验，一旦掌握军队，可以直接投入武装斗争中。中共陕西省委已经多次派人到开展兵运工作的部队中筹划起义事宜。从1932年4月2日，以习仲勋、刘林圃等人领导的两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2-65页。

当兵变为开篇，在两年左右时间里，陕甘地区连续爆发了20多次武装起义，继大革命失败后第一批起义之后，再次点燃了西北地区武装起义的星星之火。起义部队的番号多以陕甘游击队各支队为名，如两当兵变后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靖远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平凉蒿店（今属宁夏固原）兵变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定西岷口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等等。从这些名称看，这些部队与正在陕甘边苏区坚持斗争的由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是一脉相承的，属于同一个组织序列。这些起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起义后的目的地都是要到陕甘边根据地去，从而体现出这是中共中央及中共陕西省委为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而做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努力。由于起义地点往往与陕甘边苏区相隔数百里之遥，有的远至千里，且又多属孤军作战，因此，在敌人优势兵力进攻下，大多数起义失败了。但这些起义不仅在整個西北地区造成了重大影响，也为陕甘边苏区的革命武装输送了一批重要武装力量，如西华池起义部队就直接补充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其他起义即使失败，但重要骨干力量还是千方百计地辗转到达陕甘边苏区，参加了陕甘边苏区的武装斗争。起义也培养了一批党的军事干部，如靖远起义领导人谢子

长、焦维炽，两当兵变领导人习仲勋，蒿店起义领导人李艮、李华锋等，后来都成为陕甘边苏区重要的领导干部。

（二）兵运工作为持续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

陕甘地区兵运工作在大革命时期就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织利用这一基础开展新的统战工作，往往能够事半功倍，尤其是对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杨虎城素具爱国思想，大革命失败后，他统领的十七路军并未进行认真地“清党”。这样，在十七路军中的一些部队中，中共党组织比较健全，部队的中上层指挥员中也有多名共产党员。如杨虎城部警卫团团长王泰吉、陕西警备第三旅旅长张汉民、特务二团团长阎揆要、甘肃警备第三旅副旅长张东蛟等人均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中共党员。陕甘边苏区中共党组织和红军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教育引导十七路军官兵树立爱国爱民的思想，并用抗日救亡的主张去感化上层人士，争取他们的同情。据习仲勋回忆：“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比东北军还要早。”^①

^① 《习仲勋冯文彬谈原十七路军》，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

由于成功的军队统战工作，十七路军所辖许多部队在与红军作战时，并不尽全力，在关键时刻，往往有军内地下党员或提供情报，或扰乱敌人军心。敌人多次“围剿”都不能奏效，概因于此。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刚刚成立，就取得了攻打旬邑职田镇和阳坡头伏击战的重大胜利，这其中就有在敌人内部共产党员及时发挥作用的功劳。在陕甘边军事斗争中，此类事例不胜枚举。陕甘红军之所以能够在游击战争中不断发展，敌人阵营内中共党员作用的发挥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二、成功的统战政策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壮大了革命阵营

陕甘边苏区的周围全部是国民党统治区域，敌人武装力量的强大和陕甘边红军武装力量的弱小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苏区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敌人也进行了数次的“围剿”和进攻。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强敌的包围圈中生存下来，不断开辟出新的天地，也得益于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陕甘地区众多的民团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政策

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举办民团，是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地方控制的重要举措。在陕甘地区，除个别民团有较强

实力外，一般民团实力都很弱。民团团总多由民众推举产生，成分复杂，团丁大多是贫雇农。民团受国民政府领导，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但因处于各种军阀势力之间，往往成为军阀拉拢、收编的对象。多数民团不愿参与军阀之间的火并争斗，但也有一定数量的民团是大地主的帮凶，反共态度比较坚决。

在陕甘边苏区周边各县乡，民团普遍存在。处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刘志丹、习仲勋认为：游击队不能到处树敌，不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对于民团这种夹杂在地方军阀之间的特殊势力，应根据民团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区别对待。

通过对陕甘边境地区民团势力政治态度的具体分析，陕甘边苏区党组织和红军采取了不同的对策：一是整编愿意参加革命的民团。1929年春，刘志丹与保安县永宁山党支部负责人曹力如、王子宜共同谋划，掌握了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再如，华池唐青山民团，曾多次表示愿意接受改编，经过考验，刘志丹接收了他的民团，任命他为游击队四营营长。还有，当时合水县境内有大小民团20多股，经过争取教育，有好几股都自动参加了红军，其余绝大多数都表示不袭扰红军，只有李鸿轩一股与革命为敌到底。^①二是争取可能中立的民团。对那种不反动也不接近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等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1995年3月内部版，第7页。

红军的民团，则在实际工作中教育他们，使之看到红军的好处，主动向红军靠拢。主动示好的民团则与之建立相互关系，做到互不侵犯，如宜君民团沙秉彦接受了中共党组织提出的三点要求：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红军，不干涉共产党工作人员的行动。此后，沙秉彦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陕甘游击队与正宁县徐文德民团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后，双方没有发生过冲突。对罗连城、何子新、艾老五等民团也形成这样的共同相处关系。三是消灭与我为敌的民团。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黄毓麟、赵老五、梁保定等民团长期与共产党为敌，就采取坚决消灭的态度。改造民团总的原则是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政策，孤立敌人，团结朋友，以利革命。对此，习仲勋曾作过总结：“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用最大力量，去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对那些受国民党中央排挤的杂牌军即西北军的许多部分，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和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守中立。这些工作是有成效的。”^①

（二）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分化争取土匪武装

陕甘边境地区土匪出没，大小土匪武装众多，仅在南梁及周边地区活动的土匪就达52股之多。这些土匪人数少

^① 习仲勋：《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载《人民日报》1951年7月4日。

的仅有10多人，人数多的达到几百人。其组成成分也很复杂，有的是失去土地后无法生存的农民，有的是在军阀混战中遗留下的溃兵败将，有的是以会道门面目出现的江湖浪人。陕甘边苏区党和政府对各种类型的土匪武装现状进行分析，制定出相应的对土匪政策：对反共坚决且有政治背景和民愤极大且又难以争取的土匪坚决消灭；对于一般的土匪武装采取分化利用的方式争取改造；对江湖浪人组成的土匪武装则尽力争取，使其能够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支力量或者成为朋友。

对土匪政策在实践中很快见效。1934年秋，黄龙山土匪梁占奎、梁占庭在军阀混战中被迫投奔到陕甘边苏区，边区政府希望他们自觉接受改造，改邪归正。但梁氏兄弟俩匪性不改，伺机叛变，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向抗日义勇军背后打枪。边区党政军领导班子立即作出解除梁氏二人武装、就地正法的决定。梁氏兄弟被枪决后，群众拍手称快，认为边区政府为人民除了一害。

对黄龙山土匪武装另一个“山大王”郭宝珊的争取，则成为边区统战工作成功的典范。郭宝珊是河北南乐（今属河南）人，幼年随家逃难到陕西洛川谢家峁村（今属黄龙县三岔乡）落户。因家中生活难以为继，郭宝珊即投奔冯玉祥部随军入豫，中原大战冯军失败后，郭宝珊到黄龙山占山为王。1931年，刘志丹多次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投

入革命队伍。郭宝珊在刘志丹的影响下，为他的部队立下不扰民和价格公道等纪律，但对是否加入革命队伍尚存犹豫。1934年6月，刘志丹派黄罗武化装上黄龙山，向郭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等革命道理。郭宝珊部西移到甘肃合水时，刘志丹再次派黄罗武、马锡五等人前往做工作，使郭坚定了加入红军的决心。10月25日，郭宝珊率领百余人在庆阳新堡宣布起义，加入红军。11月10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荔园堡将其部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建制内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任命郭为司令员，任浪花为政治委员。在创建、发展陕甘苏区和反“围剿”斗争中，郭宝珊屡建战功，成长为人民军队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曾被周恩来誉为中国的“夏伯阳”。

（三）争取团结民间会道门，增强革命力量

当时陕甘地区的会道门是带有宗教和封建迷信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下层民众参加者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等，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也是受压迫与剥削的阶级与阶层。这些民间组织往往把反抗封建剥削、压迫和求得自身解放与搞迷信活动混杂在一起，包含着进步和落后甚至反动两个方面。其中哥老会是势力较大的帮会之一（类似还有青红帮、礼门、三合会、红枪会等）。由于这些特点，哥老会与军阀、土匪等各种社会势力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红军这支新兴的军事力量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陕甘一带的哥老会组织就与中共党组织有密切联系。因此，陕甘边苏区党和政府在哥老会中开展的统战工作也是比较成功的。如陕西宜君县小石崖哥老会大爷、民团团总罗连成就与陕甘游击队建立了良好关系，为红军提供粮食、枪支弹药等物资，部分红军伤病员还曾在罗连成管辖的地方医院里养伤治病。正宁县西渠哥老会大爷陈某，在当地很有影响，红军与他建立联系后，他家成了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红军队伍和游击队路过西渠时，都会得到他的帮助，风雨无阻。陕甘边苏区一些重要的党政军领导人也曾在他家歇脚、开会。他还主动发挥他的铁匠技术，为红军修造枪械。南梁地区的哥老会势力比较强，成为苏区后，受边区党和政府的影响和教育比较深，为陕甘边苏区作的贡献也比较大。如哥老会龙头大爷马海旺、郑德明多次为红军购买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帮助寄养红军伤病员，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习仲勋曾在南梁哥老会成员张怀真家养伤近1个月，红二十六军的部分军饷也曾让张代为保管。高得元、高得来兄弟俩均为哥老会成员，他们的家位于南梁堡寨子湾，这里山高林密，地点隐蔽。当兄弟俩得知陕甘边苏区政府机关驻地选址时，主动将家里的土窑洞腾出来，一间供陕甘边区军委使用，一间供陕甘边区政府使用。经过争取改造，哥老会的许多重要成员后来成长为苏区的优秀干部，如朱志清成

为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成为陕甘边苏区政府保卫大队队长，马锡五1936年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俊华成为红二十六军粮食保管员，马海旺担任了永宁山抗日救国会副主任。

除哥老会外，陕甘边一带的民间会道门组织还有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其成员也多是劳苦群众。对这些民间社团和宗教团体、绿林帮会，边区党组织和政府同样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运用争取、改造和团结的方针，极力削弱他们对于革命事业的阻力，引导他们成为革命事业的助力或保持中立状态。在统战政策感召下，这些民间组织中的绝大多数群众拥护党和红军，踊跃参加革命。其中，有的主动向红军捐献枪支弹药、筹粮筹款，有的动员兄弟伙伴参加红军，有的掩护、照料红军伤病员，有的给红军传递情报，有的为红军侦察敌情等。

总之，陕甘边苏区对会道门组织的团结争取，削弱了敌人力量，增强了革命力量。

（四）开展民族工作，组建回民游击队

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是中共的一贯主张。西北地区属于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所以，中共陕西省委将开展民族工作也作为重要工作内容之一。1932年12月，《陕西省委关于西北回民工作的决议》指出：“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区游击运动的开展，更加提高

回族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热烈拥护，打破了一切民族界限，回汉工农群众站在一条战线上，积极地坚决地开展游击战争，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为积极开展回民工作和回民苏维埃运动，必须动员党与群众组织，提高下层同志和群众的积极性，运用公开群众路线。只有如此，回民工作才能最大的开展。省委责成各级党部，特别在西安、陕甘边区……等地，要用各种必要的方法，建立在回族劳苦群众中的工作，大量的吸收回族劳苦工农群众入党。”^①

早在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回民工作决议形成之前，边区党和红军在开展民族工作方面就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点也得到陕西省委的肯定：“过去游击队对回民工作是有相当成绩”。^②陕甘边苏区境内的正宁县龙嘴子、西渠两乡，有回族居民300多户、约2000多人。1932年，谢子长在寺村塬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产时，就开始在这里动员回族群众参加革命工作，有些回族青年自愿加入游击队，并为革命事业而献身。例如，“游击队中有两个回民非常勇敢，都牺牲了，即派代表给家属送三、四石粮食礼物，召集几个村的回民大会，宣布我们的政纲和苏政府对回民决议。回民更热烈的起来拥护我们的土地政策，拿东西慰问游击队。回民也选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许多回民对我们表示，他们可

① 《陕西省委关于西北回民工作的决议》（1932年12月）。

② 《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1932年8月25日）。

以自己派人到甘肃回民区域，宣传我们的政纲”。^①

随着陕甘边苏区革命形势发展，在中共宗旨和民族政策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回族青年参加革命队伍，规模由个体发展到群体。例如，由王世平、马彦林等19名回族青年成立的回民支队加入陕甘游击队，后被改编为三路游击队第十六支队，其后又被编入红一团四连。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陕甘游击队对回民游击队在武器装备和生活待遇上都给予照顾，尽力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回民游击队后来成长为关中回民支队，成为中共在新正县的主要武装力量，并在革命历程中屡建奇功。在回民游击队成长地五顷塬、龙嘴子一带，1934年7月，乡级苏维埃政府成立，这也是党的历史上成立的最早带有民族区域自治色彩的回族自治乡。到陕甘宁边区时期，这里成为关中分区新正县一乡回民自治乡、九乡回民自治乡，延续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实践中的发展。1940年3月，这里还成立了关中回民抗日救国分会。在救国分会成立大会上，习仲勋高度评价了回民群众为抗日工作所作的贡献，并鼓励回民抗日救国分会进一步搞好民族团结，为抗日救国发挥更大作用。

（五）尊重知识分子，争取更多的人加入革命事业

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都起着十分重

^① 《陕西代表杜励君在北方会议上的报告》（1932年6月2日）。

要的作用，在陕甘边苏区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但苏区地处偏远，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奇缺，文盲普遍存在。当时苏区党委和政府已经认识到知识分子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为了搞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实行了灵活的知识分子政策和俘虏政策，努力发挥每一位知识分子作用。

苏区党和政府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采取相信的态度，并且分配适当的工作，培养他们，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对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党和政府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工厂、学校等单位积极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大都成为本部门的技术骨干；对于优秀的知识分子，则培养和吸收他们加入党的组织。陕甘边苏区政府主席习仲勋就是善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模范。对于一些暂时不明白中共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和比较因循守旧的老知识分子，他先讲解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并列举出陕甘边苏区的一些实例深入浅出地开导，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打开这些人的心结。当他们知道了共产党人都是为国为民立大志的人后，也就转变了认识。其中，有人谈到：“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当一批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后，大家都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①

^①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对国民党军队中的知识分子，陕甘边苏区党和政府也注意正确对待。这些人中，有的具有革命倾向，有的同情革命，只要把共产党的主张讲清楚，就有争取到革命阵线的可能。因此，苏区党和政府采取积极的策反和宣传工作，成功争取一些国民党军队中的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阵营。另外，对待战俘亦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的政策，不随便杀掉。红二十六军的一些连、排长就是从国民党军队中俘虏来的。被俘后，他们接受了党的教育和培养，有的还发展成为共产党员。

陕甘边苏区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关心，并在工作和斗争中注意培养，团结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的加入和被重用，使边区党政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有所提高，同时对苏区工业、科学、医疗、财经、文教等各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陕甘边苏区的统战工作经验及主要特色

理论来源于实践，陕甘边苏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更有二者结合后在陕甘边苏区所彰显的特色。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对党的统战工作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刘志丹说：“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

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①谢子长曾对战士们说：“只会打仗，不会讲革命道理不行，一个革命者要有嘴头子、笔头子、枪头子，要文武双全，学会建设革命政权，单纯军事观点不算一个全能的革命者。”^②习仲勋在总结陕甘边的历史经验时也说：“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情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③正是因为有统一战线上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陕甘边苏区才能在统一战线工作实践上取得明显的成效。

（一）陕甘边苏区的统战工作是中共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甘边苏区远离陕西、甘肃国民党统治中心西安、兰州，处于割据势力的结合部，各种地方势力情况复杂，呈现出杂牌军队多、民团多、土匪多、江湖帮会多等特点。地方势力之间也是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各保实力。这种恶劣、复杂的政治环境无疑为开展统战工作增加了不小的

^① 《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8页。

^② 强铁牛：《奠基大西北——谢子长与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326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页。

难度。陕甘边苏区领导人的统战思想源于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统战策略。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他们对统战工作又有了新认识。

实事求是，是做好统战工作的基础。陕甘边苏区党和政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统战方针，采取灵活的统战政策和策略，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减少了敌对势力，扩大了统一战线阵营，为苏区创造了适宜发展的各项条件，保证了苏区的各项事业能够沿着正确的革命道路前行。同时，实践经验也丰富了党的统战理论。习仲勋曾回忆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①

陕甘边苏区统战工作的成功也是对王明“左”倾错误的自觉抵制的结果。“左”倾错误表现在统一战线上，就是实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地位，这也是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曾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②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在统战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区别对待各种不同势力的策略，

^①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页。

坚持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坚持照顾维护同盟者利益的政策，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但在自觉抵制“左”倾错误过程中，代表正确路线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也饱受磨难。习仲勋曾回忆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等同志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东西，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改革’；指责我们纠正一些违反纪律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勾结军阀’。”^①从这些罗列罪名看，它们恰恰都是陕甘边苏区统战工作的成功之处。比如说，所谓“勾结军阀”，实际上这是开展军队统战工作所采取的必要方式。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陕甘边苏区的统战工作讲求实际，以事实求是的态度应对各种复杂环境和不同阶层，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具体对象具体对待，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的统战政策，使中共的统战理论在陕甘边苏

^①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0日。

区得到了成功实践。

（二）陕甘边苏区统战工作的主要特色

陕甘边苏区的统战工作具有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统战与军事斗争相结合，提出“三色”建军思想。在陕甘边境地区，几乎没有工业，民众大多数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但也有脚户、雇农、保运等行业存在。出于这些考虑，刘志丹提出“三色”建军思想，所谓三色，即：白色——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红色——发动组织工农武装，建立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中共领导的陕甘边武装是在对旧军队、民团、土匪进行改造的基础上产生，这其中就伴随着大量的统战工作。陕甘边最早建立的南梁游击队部分成员就是从民团中来的。倒水湾整编时，整编后的部队达到300余人，部队成分中有中共在几年兵运工作中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有农民武装，但大部分人员是争取过来的民团和绿林武装，其中许多人出身贫苦，可教育程度高，对革命道理领悟快。刘志丹、刘景范等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作为核心，对部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革命教育。在刘志丹“三色”建军思想指导下，陕甘边红军的队伍不断扩大，政治思想工作也能及时跟上，逐渐被锻造成思想觉

悟高、纪律严明，特别能吃苦、能战斗的部队。

第二，统战工作与制定各项政策相结合。陕甘边苏区实施的主要政策有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民团政策、对土匪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被称为“十大政策”。这些政策中都贯彻了党的统战思想。如土地政策中的“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这一条实际上是给愿意改造的地主一条生路，进一步扩展了统战阶层。“争取与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是把社会问题纳入政府管理之中，争取更多的人参加生产。财经粮食政策中“成立集市，便利交易”、“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等内容，目的是促进苏区商品流通。对俘虏的统战政策争取了许多国民党部队官兵加入革命队伍。

第三，统战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陕甘边苏区的群众工作富有特色，统战思想也贯穿始终。苏区党和政府认识到革命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的事业，因此，非常重视动员和发动群众，努力扩大群众基础，充分动员了各阶层群众支持革命事业。边区各级政权都吸收群众代表参加，使得群众的意愿能及时反馈给政府，利于调整政策，融洽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

从陕甘边苏区的历史进程看，其创建和发展都离不开统战工作，而统战工作既体现了原则性，又能做到灵活务

实。事实证明：在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以及随后形成的陕甘苏区，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得到了很好地运用。同时，这一区域统战工作的成功实践，也为中共中央落脚陕甘苏区后，实施新的统战策略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

（三）陕甘边苏区的统战工作实践为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落脚陕甘苏区后，就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认真总结了中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并借鉴了陕甘苏区的成功经验，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同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瓦窑堡会议后，中共的统一战线思想及民族政策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将陕甘苏区确定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后，中共中央对陕甘宁晋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条件进行了认真研究，对刘志丹等人在创建陕甘苏区过程中创造的成功经验是充分肯定的，尤其是对独具特色的哥老会工作给予高度表扬，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一组织在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活动中的作用。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的宣言》中高度赞扬说：“陕北革命亦得

着了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与积极参加；如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这种革命的精神，光荣的事迹，现在更广大的发挥起来，为了救中国、救自己而奋斗。”^①毛泽东的这一结论，是根据哥老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对其进行历史的现实的考察基础上得出来的。7月16日，中共中央又在《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中指出：“西北地区是哥老会组织比较普遍的地区。因此，在创造西北大联合中，党必须特别严重的提出争取哥老会的问题。党必须教育自己的同志，清楚的了解我们对于哥老会的这一策略，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之。”^②为了推动和吸引哥老会成员参加抗日救国统一战线，8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立哥老会招待处，成立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并向全国哥老会发出召开代表会议的通函。10月15日，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在陕西省志丹县境内的马头山召开。这次会议不同于一般哥老会内部集会议事的开山堂，是一次抗日动员会，会议订立了抗日救国十大条规。

通过对哥老会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制定抗日民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766页。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769页。

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上，中共中央也吸取了陕甘边苏区在统一战线上创造出的成功经验。毛泽东曾说过：“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学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①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陕甘边苏区领导人的建军思想上，还是采取的武装斗争策略上，以及习仲勋领导的苏区政府实施的各项政策上，统一战线工作都有充分的体现。这些工作实践和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共统战工作的经验和理论宝库，对推动新时期统战工作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历史借鉴意义。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97页。

两当兵变前后习仲勋的革命实践

核心提示：两当兵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兵运政策指导和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发生的一次武装兵变。在兵变的准备、发动期间，以习仲勋为代表的青年共产党人坚定信念、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开展了完整、成功的兵运工作，积累了士兵、统战、群众、军事等方面的革命工作经验。两当兵变后，习仲勋积极寻求党组织，深刻总结革命经验，加深了对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革命事业长远发展的思考，毅然继续踏上伟大的革命征程，在红军队伍建设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综合来看，经过兵变的洗礼和锤炼，习仲勋在更为复杂的革命实践中肩负起了更重的担子，很快由一名热血青年、革命战士成长为优秀的革命事业领导人。

1932年4月2日，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杨虎城部十七路军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发动了兵变，兵变地点在甘肃两当，史称“两当兵变”。兵变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北进陕甘边苏区途中因寡不敌众被打散。作为兵变主要领导人的习仲勋时年不足19岁，在兵运工作中充分显示出青年共产党人的卓

越才能和胆识，兵变后在更为复杂的革命实践中很快成长。

一、青年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追求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吸引了一大批热血青年为之追求、探索。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是优秀进步青年代表。1920年，带着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思考，他们赴欧洲勤工俭学，期间选择为马克思主义奋斗终身。1922年3月，周恩来在给觉悟社成员的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①1926年春，习仲勋考入富平县立诚公学，5月，在校加入共青团。1927年春，习仲勋转入富平县第一高小学习，在中共富平县特支和团组织领导下，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习仲勋在活动中非常踊跃，呼喊口号、散发传单、街头演讲，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小学时期的习仲勋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思想进步，党组织曾讨论吸收他为党员，只因为年龄太小而没有通过。1928年1月，习仲勋进入三原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习。3月，由于进步师生对校方不满，拒绝参加校方组织的一些活动，遭到国民党地方政府打击。5月，习仲勋等人身陷国民党监狱，在狱中，习仲勋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年仅15岁。

年少的习仲勋亲身体会过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经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453页。

了失去亲人的痛苦，更激发了他的革命勇气、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①要推翻极端黑暗的旧社会，改变中国农民悲惨命运，实现人类共同幸福的美好憧憬。1930年2月，按照中共中央兵运政策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家乡一系列革命活动中得到锻炼的习仲勋被派往长武县国民党地方武装毕梅轩部王德修支队开展兵运工作。6月，王德修支队被编为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后被杨虎城收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习仲勋在该营的公开职务也由二连见习官变为二连特务长。习仲勋与先后进入该营的李秉荣、李特生、吕剑人等共产党员共同努力，使全营的兵运工作日益深入。经省委批准，在该营一、二、三连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成立了营党委，1931年到1932年，习仲勋担任营党委书记。党员发展到30多名，到1931年冬，全营有五个排长、两个特务长、七个班长以及营部文书由共产党员担任。1932年4月2日凌晨，在部队换防之际，习仲勋与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共同领导了两当兵变。兵变部队改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②正是有一大批青年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人生指南，以澎湃的热情投身于革命，中国革命事业才揭开一页一页的新篇章。

①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67页。

②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65-75页。

二、习仲勋的兵运工作实践

广义上的兵运工作，“即军事斗争的统称”。^①兵运工作的目的就是开展兵运斗争，建立革命武装，两当兵变是完整的兵运工作。习仲勋等人从打入国民党部队开展兵运到发动武装兵变，在士兵工作、统战工作、群众工作、军事斗争等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和勇敢实践。

1. 士兵工作

开展士兵工作的前提是对国民党军队士兵生活条件、思想状况有客观地认识。1928年初，中共中央在《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中指出：“中国的士兵……生活是异常的痛苦，而且现在大半是欠饷很久，受军阀的奴使虐待不堪言状。党的任务，是要在唤起他们改良自己生活的斗争”^②针对陕甘地区灾害频发、地方武装互相倾轧、士兵日常生活很差等情况，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要求“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③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前身是收编的地方武装，部队武器装备落后，生活物资短缺，病号较多，并且军饷被克扣严重。大部分士兵来自农村，同情民众疾苦，

^① 林全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兵运政策》，载《广东党史》2008年第2期。

^②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64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88页。

比较容易接受革命教育。这些有助于从日常生活入手开展运动，启发士兵提高觉悟，传播革命思想。在了解与士兵切身利益相关的情况后，按照中央兵运政策精神以及陕西省委、陕北特委对兵运工作的安排，习仲勋等人灵活多样地开展了士兵工作。习仲勋利用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公开身份，和士兵积极接触，给士兵讲述民众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共产党反对保护富人利益，要让穷苦大众过上好日子。通过细致的宣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加深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采取个别串连、秘密散发传单（《士兵的话》、《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等）和书写、张贴标语等形式，鼓励士兵争取自己的利益，“向长官清算伙食、被服、军械等经济帐，争取实行经济民主，捍卫士兵权益，反对长官打骂士兵，争取实行政治民主。”^①九一八事变之后，向士兵宣传救亡图存的道理，激发士兵的抗日热情。此外，利用同乡故旧关系，加强与士兵的个人来往，和他们交朋友。习仲勋年少稳重，和士兵们关系融洽，“常常为伤员求医问药、送病号饭，在士兵中享有威信。李秉荣也重视与士兵的感情联络……这些为以后举行士兵暴动奠定了思想基础。”^②习仲勋等人在士兵当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许多士兵逐渐理解了革命，萌发

^① 朱根生：《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共在西北地区的兵运工作》，载《军事历史》2001年第2期。

^②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78页。

了革命思想并向革命队伍靠拢”。^①

2. 统战工作

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工农武装和苏区实力弱小且处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要发展壮大就必须做好统战工作。在中共中央于1929年6月22日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中，对陕甘苏区统战工作作了指示：“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参加一切贫农组成的土匪队伍与其它武装组织……”^②明确表示在兵运工作的艰苦时期，要联合各种可以联合的力量。在两当兵变的兵运工作中，习仲勋根据中央和陕西省委对统战工作的指示，设法接触、结识部队所在地有进步思想和政治觉悟的社会人士。1930年7月，习仲勋认识了长武县亭口镇骡马店店主王子轩，此人重情重义，二人交往频繁。习仲勋常对王子轩进行革命教育和启发，不断提高其阶级觉悟，在习仲勋的影响下，王子轩变得同情、支持革命。之后，习仲勋与王子轩、亭口镇开明绅士刘士荣、小学校长刘警天及二连连长唐福亭等结为异姓兄弟。王子轩把自己的骡马店作为党组织秘密集会地点，并时常为过往人员给予物质资助。两当兵变部队被打散后，他还掩护一些革命战士在骡马店养伤。1931年冬，

^① 姚春晖：《习仲勋与“两当兵变”》，载《人民政协报》2003年1月9日。

^②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等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1995年1月版，第59页。

习仲勋通过营司务长阎鸿章结识了凤县文官模范小学教员刘希贤，习仲勋发现刘思想较为进步，同情革命，就与刘希贤、阎鸿章、刘书林、张秋臣（排长）五人“义结金兰”，并拍照留念。此后，党组织就以刘希贤家作为秘密集会地点，以一些日常活动作掩护，加紧兵变的准备工作。正是有了当地进步人士的帮助和参与，兵运工作才得以有序开展。

3. 群众工作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活动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紧密关系。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十分注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开展革命活动。习仲勋等人在两当兵变中开展的兵运工作也深深扎根在群众当中。习仲勋十分注重维护部队驻扎地人民群众的利益。王德修营的部分士兵军纪较差，经常掳掠当地群众的物资。习仲勋到该营后，十分注重改善该营官兵与群众的关系，要求共产党员带头并教育士兵不抢群众东西，农忙时节还帮群众收种庄稼。在他的努力下，该营军纪逐渐好转。对其他部队过境时的扰民行为，习仲勋也想办法制止。陕西军阀顾鼎新部军纪败坏，恶名远扬，由关中调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版，第104页。

汉中途经凤县，群众听闻十分恐慌，纷纷躲避。习仲勋了解情况后立即召集会议，组织人员连夜张贴“打倒奸淫、掳掠的顾司令！”“顾司令所到之处一扫光！”“希望顾司令严整军纪！”等标语。顾鼎新率军到达时见到满街标语，便严令部队不得胡作非为。凤县恶霸龙文明欺负、敲诈卖菜的李老汉，习仲勋以军人身份阻止了恶行，维护了群众利益。习仲勋所在部队经过回族群众居住地区时，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不进清真寺，保护回族群众利益不受侵犯。同时，部队还清剿匪盗，保护学校集会，安定地方秩序，老百姓称赞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①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共党员一心为民，成了当地群众的主心骨。习仲勋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陕甘地区革命实践相结合，在革命工作中一直与广大人民群众融在一起，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积累了厚实的群众工作经验。

4. 军事斗争

在艰难的革命事业中，“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②在两当兵变中，习仲勋不但深刻懂得这个道理，而且一直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开展军事斗争。在两当兵变发动之前，陕西省委曾几次派巡视员通过地下组织安排兵变，习仲勋等

^① 刘书林：《习仲勋随军驻防凤县及领导两当兵变》，载《两当党史资料汇编——两当兵变》内部版，第34-38页。

^②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91页。

人召集营党委研究，认为敌人势力大，周围驻军多，外界条件不允许，部队很难拉出去，兵变时机不成熟，因此没有盲目遵从上级指示，避免了损失。1932年3月，有消息称一营要同驻防在徽县的二营换防。一营官兵大部分是乾县、礼泉县人，不愿到离家更远的山里去，抵触情绪很大。营党委认为移防之际是发动兵变的好机会，即派人向陕西省委汇报情况，请示发动兵变问题。陕西省委领导成员经研究后，同意择机发动兵变，并提议兵变后的发展方向是“到西路的麟游，约四天路程。以麟游为根据地，开展西路灾荒区域内的游击战争，以与陕甘边境汇合。”^①随后派省委军委成员刘林圃担任特派员赶到凤县，具体指导兵变。经过刘林圃、习仲勋等人的商讨，大家认为两当县地理位置优越、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且此时大部分官兵的情绪比较激烈。此外，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有利于兵变的发动。于是，进行了具体部署之后，在4月2日凌晨发动了兵变。2日上午，兵变队伍长途急行军到达两当县太阳寺休整，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杰为支队长^②，习仲勋为队委书记。部队从太阳寺出发后，经过甘肃天水利桥乡、陕西宝鸡县、千阳县、麟游县、甘肃灵台县持续北上，途中与敌激战多次，兵力受

①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79页。

② 部队改编时选举吴进才为支队长，几天后，由许天杰接任支队长。后同。

损，后行至陕西永寿县岳御史村宿营时被当地土匪王结子队伍包围，交火后第五支队寡不敌众被打散。

三、两当兵变后习仲勋的革命活动

两当兵变部队被打散后，习仲勋因病隐蔽在王子轩家，时刻打听失散战友的消息，想早日找到党组织，投入新的战斗。

1. 追寻刘志丹、谢子长

1932年6月，恢复健康的习仲勋前往陕甘边寻找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同年秋，习仲勋在照金先后见到了谢子长和刘志丹，两位革命领导人真诚坦率，用质朴的语言鼓励着习仲勋。刘志丹讲：“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又说：“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①谢子长也叮嘱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从关中逃难过来的饥

^① 习仲勋：《陕甘高原 革命征程——回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46页。

民多，你在这儿人熟地熟……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①。与刘志丹、谢子长第一次的交谈，他们“很高的理论水平……坚韧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②给年轻的习仲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给了习仲勋极大鼓舞，让习仲勋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心，为建立一块红色根据地，很快投入了新的战斗。之后，刘志丹、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南下筹粮筹款，留下第二大队的特务队在照金。不久，特务队中队长陈克敏叛变，队长程双印牺牲，为了保存革命武装，习仲勋出任特务队指导员，果断带领部队前往渭北与渭北游击队会合，之后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同年冬，面对国民党的武装“清剿”，习仲勋到家乡富平西区都村一带开展游击运动，半月后，“分粮群众发展到几千人，成立了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③“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务）、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④1933年3月，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习仲勋任政委。同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

①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99页。

②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③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5页。

④ 习仲勋：《历史的回顾》，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62页。

会在照金成立，习仲勋先后任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4月，习仲勋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5月底，习仲勋在照金根据地筹粮开会途中遭遇当地民团伏击，负伤后仍然坚持指挥战斗，后脱险返回薛家寨疗伤。6月下旬，得到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兵败终南山的消息，“伤病中的习仲勋十分担心刘志丹等人的安危，万分焦虑地思考日后根据地的巩固和斗争”^①可以看出，两当兵变之后，习仲勋积极寻求党组织，深刻总结革命经验，加深了对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革命事业长远发展的思考。在更为复杂的革命实践中，能够将党的武装割据理论、群众路线与当地实际结合起来开展工作，领导能力、关键时刻决断能力等得到很大提升，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领导人。

2. 参与主持陈家坡会议

1933年后半年，陕西省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革命武装力量严重削弱；党内出现叛徒，省委机关和各地党团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民团疯狂“围剿”渭北革命根据地。面对严峻形势，为了消除悲观情绪和解决对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进行统一领导等问题，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

^①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141页。

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习仲勋作为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主持了会议。在会议中，习仲勋等人明确提出：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问题，正确分析研究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结合实际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切实对策。^①会议在对各路部队要不要进行统一领导以及部队是否分散活动等方面进行了长时间激烈的争论，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习仲勋力主将红军部队统一起来，以增强革命武装力量，战胜困难，扩大苏区。会议最后否定了少数人分散行动的意见，统一了思想。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部红军，推举王泰吉为总指挥。之后，集中起来的陕甘边红军开展了一系列以少胜多的游击战争。10月4日，刘志丹从终南山脱险回来，被任命为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②习仲勋向他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纠正了错误观点，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③陈家坡会议是在“上级领导机关不复存在的条件下召开的，是在存在很大分歧的情况下进行的，会议最大的困难是认识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52-253页。

②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45-146页。

③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不统一，双方意见尖锐对立，持不同意见者资历深、年龄大，颇有影响力，这使得年轻的会议主持人和参与者面临严峻压力，经历了严峻考验”，^①会议“充分显示了陕甘边特委领导的正确，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起了决定性作用”，^②挽救了危局。

陈家坡会议中，以习仲勋为代表的年轻党员，在艰难情况下坚韧不拔、立场坚定，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在关系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表现出大智大勇，表现出对党的事业无限的忠诚，得到许多人的认同。他们自己也很快成长为恢复后的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1934年2月，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11月，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边区军民将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

习仲勋等一批青年共产党人发动的两当兵变，有力地打击了地方民团势力以及国民党在该地区的统治，鼓舞了陕甘地区人民的革命斗志，策应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中共兵运史、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习仲勋在两当兵变中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兵变之后，习仲勋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投身于创建、巩固

^① 李东朗：《简论陈家坡会议》，载《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3期。

^② 王世泰著：《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27页。

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更为复杂的革命实践中机智勇敢、勇于战斗，肩负起更大的担子，担当起更大的责任。综合来看，两当兵变在习仲勋的革命生涯中有着重要影响，经过两当兵变的洗礼和锤炼，习仲勋很快由一名热血青年、革命战士成长为优秀的革命事业领导人。

两当兵变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核心提示：1932年4月2日发生的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进行兵运工作的成功范例，揭开了国民党驻甘军队兵变的序幕。本文对两当兵变的前期兵运工作和兵变过程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两当兵变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军事行动，有力策应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党的兵运工作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为党组织培养了一批重要干部，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两当兵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习仲勋、刘林圃等共产党人在甘肃陇南两当县领导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是这一时期甘肃系列武装起义的开端，在西北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党领导的军事武装斗争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两当兵变前期的兵运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兵运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为瓦解敌军、积蓄革命力量打下了重要的工作基础和兵源基础。党的六大指出：“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便须设

法组织红军。以武装起义的队伍做红军的基础。”^①六大在纠正冒险主义错误的同时，把做好兵运工作当成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要求开展“广大的反对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努力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②并成立了兵运科，开展专项工作，后改为破坏部，就是想通过兵运工作来掌握一部分党领导的军事力量。1929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军事部制定的《目前扩大红军计划大纲》指出：扩大红军与有计划地组织兵变，成为目前军事工作的两大任务。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兵运工作的指示，从1929年开始，中共陕西省委陆续派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到驻陕甘宁各省的地方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以图通过兵运工作来打造自己的革命武装。

1930年春，未满17岁的习仲勋接受党组织指示，从三原武字区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来到长武县亭口镇一带，开展兵运活动。长武县地处陕西省西北边界，南、北、西三面与甘肃省的泾川、宁县、正宁、灵台相邻，是陕甘交界处一个山区小县，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0年，西北民军总司令甄寿珊部所属一师第二支队驻军长武，支队司令王德修是三原县独李人，曾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8页。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6页。

团。从1929年起，李秉荣、李特生等共产党员就已经在这支部队中开展活动。习仲勋到长武后，先住在长武王子轩的饭馆内，以帮王打杂为掩护，接触社会各阶层。不久，他与王德修部连长唐福亭以富平老乡结识，唐将他引荐给王德修，被任命为二连见习官。在支队站住脚后，习仲勋很快与已经打入这支部队的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等接上了党的关系。兵运工作就此展开。

建立中共组织，秘密发展党员。1930年3月的一天，习仲勋和李秉荣、李特生在长武县城外北坛的药王洞庙内召开了一次党小组会，推举李秉荣为党小组长。会议确定开展兵运工作的方针为：以驻扎亭口镇的西北民军王德修营二连为中心，逐渐将党的工作推向全营；从关心士兵生活入手，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逐步提高士兵觉悟；在士兵中培养发展党员，积蓄力量，等待兵变时机。之后，中共陕西省委又派吕剑人、刘书林、陈云樵等中共党员来到该部，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兵运工作力量。在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士兵觉悟的基础上，党支部积极物色对象，逐步发展了左文辉、许天杰、张子敬（张觉）、高瑞岳（高祥生）、吴彦俊、魏明山、张茂修、郭立山、吴进才、李裕初、刘世明、石文杰等一批党员。该营共辖四个连队（一个机枪连和三个步兵连），中共党员李秉荣原系机枪连连长，因被团长曹润华怀疑政治身份，调任团部军械员，原

机枪连一些进步士兵也被分拨至各连，新组成的机枪连暂无中共党员。至兵变前夕，三个步兵连共发展中共党员30多名，其中有五个排长（一连一排长张子敬，二排长吕剑人；二连一排长高瑞岳；三连一排长许天杰，二排长左文辉）、两个特务长（一连特务长李特生，二连特务长习仲勋）、七个班长（吴彦俊、魏明山、张茂修、长彦芳、吴进才、郭立山、张定坤），还有营部文书刘书林、营部副官郭立三、上士张克勤等都是共产党员。4月，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在该营建立了中共营党委，李秉荣任营党委书记。1930年冬，李特生继任营党委书记。1931年至1932年由习仲勋任营党委书记。营党委下辖三个党支部。党组织成立后，成为开展兵运工作，组织兵变的核心力量。习仲勋等人也没有放弃在机枪连的工作，设法物色该连有进步倾向的人员，准备发展成共产党员。中共陕西省委不仅有计划的派出党员打进该部，还多次派巡视员或通讯员传递文件，了解情况。第五伯昌、陈云樵、朱立凯、周凯、李艮等人先后受党组织派遣，来到一营了解兵运工作。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实施兵变奠定了组织基础。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士兵觉悟。兵运工作的基本要求是要争取更多的士兵群众走革命道路。习仲勋等人在该营扎稳脚跟后，为广泛争取士兵群众，采取个别串联谈话、秘密散发《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等传单材料的方

式，向士兵做宣传教育工作，通过例举一些事实，来揭露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对农民的剥削，揭露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的压榨和掠夺，揭露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的反动罪行，揭露反动军阀对士兵的盘剥压迫。教育士兵不要迷信命运，要进行斗争。只有这样，穷苦人民才能翻身解放，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做真正的主人。由于士兵多数是陕西乾县、礼泉一带的青年农民，他们在大荒之年为了活命而投军，所以很快接受了革命道理，萌发了革命思想。根据士兵饱受反动军阀欺压、生活待遇极差等实际情况，营党委组织了经济斗争，提出了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和“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的口号，成立了“红军之友”社，促进士兵革命化进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习仲勋等及时宣传抗日救亡形势，揭露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主义，大大激发了士兵群众的抗日热情；及时传播中央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加深士兵对红军的了解。习仲勋善于和士兵交朋友，常常为伤员求医问药、送病号饭，在士兵中享有威信。李秉荣经常与士兵联络，他调任时，许多人依依不舍送别。这些工作为兵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积蓄革命力量，等待兵变时机。1930年11月，王德修所在西北民军被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收编，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旅长苏雨生，三团团

长孙策轩，二营营长王德修。1931年夏，该营移驻陕西彬县时，旅长苏雨生背叛杨虎城，该营跟谁走面临选择。习仲勋等人经过分析，认为杨虎城具有进步倾向，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与中共陕西党组织负责人魏野畴相识，并给党组织活动提供了一些帮助，杨虎城的部队内也始终有中共组织秘密存在，二营如留在杨虎城部有利于保护部队中党培植的革命力量。遂向营长王德修提出留下的建议，王德修接受建议，该营被改编为杨虎城部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旅长唐嗣桐，二团团长曹润华，一营营长王德修。1931年冬，川军邓锡侯、黄隐部由甘南进占陇南一线，陕西警备三旅二团奉杨虎城之命开往陕西凤县、甘肃两当、徽县、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王德修营即驻扎凤县，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县城，二连驻双石铺，三连驻两当县城。

兵运工作充满艰险，习仲勋曾意外遇到过一次危险。因习仲勋家乡一位叫刘玉琪的民团头目后任旅部高级参谋，发现习仲勋在部队中，就密告旅长唐嗣桐说习仲勋参加过学潮，习仲勋遂被传到旅部谈话。唐嗣桐问习仲勋为什么要来军队里干事？习仲勋机智地回答说因为农村环境不好，怕染上坏习气，所以就到正规军队过有纪律的生活，以有所进取。唐未探出究竟，但威胁说他知道习仲勋的底细。之后，唐嗣桐密令全旅严防“反动”分子在该部

活动。

广交各界人士，开展统战工作。为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掩护党的活动，习仲勋等共产党员利用军务之便，注意结交社会进步人士，掌握地方情况。为方便工作，习仲勋和二连连长唐福亭、亭口镇开明绅士刘士荣、小学校长刘警天以及饭店老板王子轩以兄弟相称。习仲勋特别重视启发这些人的阶级觉悟，王子轩在习仲勋的影响和教育下，冒着风险，主动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的车马店成为党组织活动的重要联络点，给过往人员及时提供帮助。在与凤县文昌宫小学教师刘希贤交往中，习仲勋发现他思想比较进步，对革命抱有同情心，即与刘希贤、阎鸿章（营司务长）、刘书林、张秋臣（排长）五人结为“金兰”弟兄，并拍了纪念照。从此，习仲勋就以刘希贤家为党员秘密集会地点。为不引起敌人怀疑，有时以打猎、游览作掩护，在凤县城外的南岐山、猴石山和张果老洞等地交谈情报，布置工作。

改造旧式军队，维护群众利益。王德修营一些士兵军纪差，经常掳掠老百姓的东西。习仲勋等到该营开展兵运工作后，特别注意该营官兵与群众的关系，要求党员带头并教育士兵不打骂群众，不抢老百姓东西，有时还帮老百姓收种庄稼。有一次，几个士兵在凤县城外来家坪农民家里抢东西，农民阻拦反遭痛打。习仲勋知道后，立即建议

并取得营长王德修的同意，对抢东西的士兵进行了严肃的军纪处理。使全营士兵受到教育，军纪大有好转。对扰民的其他部队，习仲勋也想方设法进行干预。陕西军阀顾鼎新部，奉令由关中调往汉中，途经凤县。因该军以往的扰民恶行已被凤县百姓所闻，百姓因之感到恐慌。习仲勋随即召集会议，商议对策，连夜书写和张贴了“打倒奸淫、掳掠的顾司令！”“顾司令所到之处一扫光！”“希望顾司令严整军纪！”等多幅标语。顾鼎新到后见到满街标语，不明就里，不便发作，只得严令部队不得胡作非为，从而使凤县百姓免遭灾难。凤县一位靠卖菜为生的李老汉，把新产的莴笋背到街上卖，当地恶霸龙文明强抢不给钱，还用敲诈手段逼李老汉交出10块大洋的税款。习仲勋知道后，告知李老汉不要怕，当龙文明派人收税未着要抓走李老汉时，习仲勋挺身而出，阻止了这起恶行。灭了恶霸威风，长了穷人志气，维护了群众利益。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共党员疾恶如仇、爱民如子，被当地老百姓看作是保护伞。队伍移防到回民较多地区时，特别注意尊重民族习惯，对清真寺从不侵犯。群众工作的开展，与民众形成了较为融洽的社会关系。

习仲勋进入王德修营两年间，部队由西北民军改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又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三次易帜；防地先后驻长武、彬县、凤翔、凤县，辗转千余里。在中共

营党委领导下，党员们进行了艰苦细致、扎实的兵运工作，使该营举行武装兵变的条件日趋成熟。

二、两当兵变的主要过程

兵运工作的目的在于适当时候举行兵变，陕西省委对这支部队存有很大希望。“中共陕西省委审时度势，及时地向该部派遣人员，发出指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形成有力的反蒋势力，省委拟组织起一支规模较大的联合武装，该旅被列为争取联合的三支武装之一。”^①两当兵变前，这支部队已被党组织赋予能够进行武装兵变的重要使命。因此，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巡视员进行巡视工作时，曾多次酝酿发动兵变。1931年秋，队伍驻扎彬县时，省委派省委委员焦维炽巡视兵运工作，曾商量该营举行兵变，习仲勋等人对部队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革命力量太小，外界条件不具备，如举行兵变有可能打不出去。焦维炽同意这个分析，兵变没有仓促进行。同年初冬，部队驻凤翔时，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来巡视兵运工作，先后秘密召开三次营党委会，李杰夫力主发动兵变，习仲勋等人认为，举行兵变的条件尚未具备，兵变力量孤单，无外部配合接应，极有可能被消灭，在营党委成员的一致反对下，这次兵变没有实行。后该营移防凤县。

^①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71页。

1931年12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指出：“特别要加紧组织革命兵变的工作，使这部队中的兵士，举行革命的哗变，与西路农民和灾民斗争配合起来，开发游击战争。”^①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习仲勋为首的营党委开始酝酿兵变，此时，团长曹润华对该营中共党组织活动已经有所怀疑，开始频繁调换人员，四个连长换了三个，李秉荣就是这时被调离机枪连的。1932年春，杨虎城部署该旅一营由陕西凤县开往甘肃徽县，与二营互换防地。陇南山区的3月很寒冷，一营士兵衣服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连鞋袜都没有；且士兵多是陕西乾县、彬县人，知道徽县一带生活待遇比凤县还要差，对调动不满，抵触情绪大。了解到这一情况，习仲勋遂在凤县西门外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兵变问题。会议认为，趁换防之机举行兵变的条件已经成熟，兵变地点需要认真考虑。凤县到徽县，要经过两当县城。甘肃省东南端的两当，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的秦岭山区，素有“秦陇之捍蔽，巴蜀之襟喉”之称，在这里举行兵变，远离团部，与周围驻军又有一定距离，利于党组织控制队伍。遂作出决定，部队从凤县开拔后，到达两当县城时举行兵变。决定形成后，派刘书林、张克勤两位党员立即赶赴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省委领导成员经研究后，同意该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46页。

营在换防中择机发动兵变，并提议兵变后的发展方向是“到西路的麟游，约四天路程。以麟游为根据地，开展西路灾荒区域内的游击战争，以与陕甘边境汇合。”^①目的是兵变后将队伍带进陕甘边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扩大红军力量，增强党的影响。为了搞好这次兵变，陕西省委派出省委军委成员刘林圃担任特派员，随张克勤一起赶到凤县，具体指导兵变准备工作。

刘林圃到达凤县的当天，团部换防的命令也刚下达。当晚即在双石铺（今凤县县城）镇丰禾山庙内召开营党委会。会上，习仲勋对刘林圃的省委特派员身份作了介绍，刘林圃传达了省委同意举行兵变的意见，介绍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认为形势发展有利于兵变的发动。经研究，会议就兵变行动作出五项决定：坚决执行省委意见，趁换防之机在一营发动兵变；兵变的地点，定在两当县城；确定兵变后的部队番号是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兵变后的行军方向是陕甘边境旬邑地区；兵变由刘林圃协助营党委全面领导；到两当后再次召开营委会，部署兵变行动。会议结束后，营党委安排刘林圃在庙内隐蔽住宿。

1932年4月1日拂晓，一营的一、二连和机枪连随营部从凤州、双石铺出发向两当移防。刘林圃在部队党组织安排下随军前行。当日黄昏，一营一、二连、机枪连到达

^①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9页。

两当县城，与驻扎在这里的三连会合。晚九时，在县城北门外一个车马店内，刘林圃、习仲勋主持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兵变行动方案：推选许天杰为兵变军事行动总指挥；兵变定在子夜12时举行，由许天杰鸣枪为号；各连党员先将反动连长处决，排长中不是党员的下枪带上走；吕剑人负责带队收缴一连并机枪连的枪械，高瑞岳带队到营部解决营长王德修和警卫班，左文辉、张子敬带队分别把守两当县城东、西城门；各连、排完成任务后，迅速将队伍带到北门外窑沟渠集合。

深夜12时，两当兵变准时发动。各连兵变战士按计划行动起来，击毙反动连长并开始收缴枪支。枪声惊动了机枪连，机枪连开始抵抗，与吕剑人率领的一连形成对峙，该连代理连长被击毙，但机枪连火力猛，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与此同时，左文辉、张子敬等带领战士们坚守东、西两城门，以防敌人援兵和城内敌人逃跑。高瑞岳带领一个排去抓营长王德修，王德修听到枪声，知道情况不妙，早已逾墙逃跑。机枪连驻地虽然没有攻下来，但兵变部队不宜恋战，三个步兵连约300余人在各连负责人率领下迅速撤到两当县城北门外的窑沟渠集合，刘林圃问战士们愿不愿回陕甘边，去找刘志丹当红军，战士们一致高喊“愿意”。此时已是鸡叫头遍，兵变部队迅速撤出两当县城，连夜北上，沿广香河向太阳寺方向前进。

4月2日上午，兵变部队到达两当县境北端的太阳寺吃饭休息。在此，营党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由刘林圃宣布改编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任命许天杰为支队长兼三连连长，刘林圃为支队政委，习仲勋为中共队委书记；任命吕剑人为一连连长，高瑞岳为二连连长，左文辉为三连副连长；各连提升几名班长为排长。刘林圃对战士们说，两当兵变后，我们已成为革命的军队。我们要开往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合，壮大红军队伍。大家要遵守红军纪律，不准抢劫，不准侮辱妇女，打仗要勇敢，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消灭沿途狙击我们的敌人。当日下午，按照刘林圃从教科书上撕下的一张简易地图，部队从太阳寺出发继续向北前进。经天水利桥，到达宝鸡县（现陈仓区）西部的渭河岸，官兵手拉手，互相搀扶，渡过浪湍流急、冰寒透骨的渭河，经通洞峪、赤沙、香泉，沿千陇边境进入陇县的八度、娘娘庙（即东风镇），沿途与国民党军、地方民团作战多次。部队的行军和作战都很艰苦，数日内行走在气候异常的荒野梢林之中，有时难以分辨方向，沿途敌情也不清楚。行至甘肃省灵台县，在页岭和国民党杨子恒部遭遇，山路被卡住，兵变部队前行方向受阻。为了保存实力，部队进入麟游县以北的崔木。在蔡家河，支队领导人开会决定：派吕剑人和刘林圃前往乾县（因吕是乾县人），想通过熟人

关系，把部队带到驻乾县的刘文伯部（该部有中共党组织）后暂渡难关；派习仲勋、左文辉去长武亭口一线侦察有无敌军，打探泾河渡口船只情况，设法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取得联系；由许天杰、李特生负责把部队带到麟游和永寿两县交界处岳御史村休整，等待其他两路情况回馈后再决定部队去向。但因部队对这里情况不熟，误入土匪头子王结子部的地盘，王结子本人就住在岳御史村附近卧牛山北边的底角沟，各村都安有坐探。知道有携带枪支的兵变队伍到来，王结子立即部署兵力，将兵变部队包围，许天杰发现支队已被敌人包围，立即指挥各连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进攻，并迅速占领了北面的土岭阵地。接火后，敌凭借兵力武器优势，步步逼近。激战数小时后，支队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战斗力减弱，部队最终被打散。原计划到陕甘边去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会合的愿望未能实现。后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杰等人被捕，刘林圃被敌人杀害。习仲勋、左文辉到亭口镇后，“弄清了当地敌情，选定了渡泾河的地点，并准备在部队到达后，再打一批土豪，补充一批物资，以解决部队的困难，保证把部队拉到淳化、旬邑一带后，立即与刘、谢部靠近”。^①但随后队伍北进失利的消息传来，习仲勋病倒在亭口。在王子轩的照顾下，病愈后，习仲勋又踏上寻找刘

^①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87页。

志丹的路程。

三、两当兵变的重要历史影响

两当兵变部队在坚持半月之久的武装斗争后，虽然最后被敌人打散了，但这次兵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是极大地震慑了敌人。两当兵变极大地震慑了陕甘川三省国民党当局，动摇了国民党政府在西北的统治基础，增加了统治者的精神恐慌。得知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向陕甘边进发的消息后，统治者急忙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刚诞生的这支红军游击队，但红军游击队一路向北，无惧敌人优势兵力的“围剿”，表现出了英勇战斗的精神。两当兵变在分化国民党统治力量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地方官吏受到震慑，残酷压榨贫苦百姓的行为有所收敛。

二是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两当兵变显示了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武装的力量，使贫苦人民认识到了要翻身求解放，就必须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从而为陇南一带中共组织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两当；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两当。从两当兵变开始，红军部队多次到达两当，为两当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中共组织的力量在这一地区不断发展壮大，最终领导陇南人民迎了解放。

三是两当兵变显示了中共组织领导的兵运工作的成功。兵运工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积累的经验教训很多。但就两当兵变来说，这种深入虎穴开展秘密工作、积极探索走革命武装斗争道路的具体实践，是成功的，为中共组织在国民党部队开展兵运工作，改造旧军队，创建和扩大革命武装创造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两当兵变成功拉出300余人的队伍，说明中共组织的坚强领导已经成为这支部队的核心力量，这是两当兵变得以成功的首要条件。在为时两年的艰苦兵运工作中，党组织已经掌握了这支部队的特点，士兵绝大多数是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出身，能够接受革命教育，有争取到革命阵线的可能。因此，习仲勋等人从实际出发，摸索出一套改造旧军队的经验，例如推荐共产党员和具有革命思想的士兵担任连、排长职务，同时吸收一批思想坚定、作战勇敢的优秀工农分子入党，壮大党组织。“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个，在二营的各连建立了支部”。^①同时，在中共党员影响下，部队严明军纪，处理好与当地民众关系，有些群众认为这支队伍根本不像国民党的军队，从而扩大了革命影响，赢得了群众广泛支持。因此，兵变发生时，士兵们愿意跟共产党走，愿意改编成革命武装，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习仲勋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我们进行了一

^①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82页。

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①

四是两当兵变扩大了陕甘边红军队伍，有力地策应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根据中共中央及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尽快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指示，陕西省委发出《陕西省委为拥护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告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书》，要求有党的兵运工作基础的国民党部队“打死反动长官，哗变起来，投到红军中去”，^②其目的是为了壮大陕甘红军的力量，开展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以两当兵变为开篇，在两年左右时间里，陕甘地区连续爆发了20多次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番号多冠以陕甘游击队各支队，如两当兵变后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靖远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平凉蒿店（今属宁夏固原）兵变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等等，同时各支队的目的地都是要到陕甘边根据地去。由此可见，起义部队组成的各支红军游击队，是陕甘边根据地由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率领的陕甘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当兵变是这一时期党在陕甘地区发动系列武装起义的旗帜，起着引领、示范的作用。同时，五支队在刘林圃、习仲勋等人指挥下，转战陕甘地区，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在西

^①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87页。

^② 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1992年3月内部版，第35页。

北地区的部署，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了对刚刚创建的陕甘边寺村塬根据地的压力，策应了陕甘边境地区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武装斗争，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两当兵变为壮大陕甘边红军，支持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是两当兵变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对全国重要武装起义功绩肯定的同时，指出工作的不足：“工农之中的工作，尚未充分；反动军队中的工作，也是如此”。^①要求全党“更要特别注意军事问题和兵士运动”。^②六大在武装起义的要求上是必须经过充分的发动，条件成熟时才能起义。两当兵变前期的兵运工作经验是对党的六大精神的贯彻和实践，两当兵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军事行动。我们不仅在当时陕西省委的文件中多处看到这支部队中党组织活动的情况，就是在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联系，尤其是1932年6月中央召开的北方会议上，两当兵变的过程和总结是作为陕西省委一个重要报告出现在会上。两当兵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胜利。从运筹策划到组织发动，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7页。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6页。

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始终从实际出发，不盲从上级指示，起义条件不具备时，不盲动兵变，条件成熟时，主动要求兵变，将主动权掌握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保证了兵变的顺利进行。习仲勋等兵变领导人对兵变的成功之处和最终失败都作了非常客观到位的总结，对于指导西北地区兵运工作都极具借鉴意义。习仲勋认为失败的教训是：没有与农民运动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必要的联合；对动摇分子没有及时遣散；旗帜不够鲜明，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有借鉴，兵运工作成功的系数就高，以后西北地区发生的并取得成功的西华池起义、铁佛寺起义、横山起义以及赵寿山部起义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两当兵变的影响。因此，习仲勋说：“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①

六是两当兵变为党锻炼和培养出了一批重要干部。两当兵变领导人习仲勋，将这段革命生涯作为他历练和成长的重要开端，多次提到两当兵变。他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精神，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②在兵运工作中，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危险环境中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积极勇敢地投入了新的战斗，并很快展现出

^①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87页。

^②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66页。

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杰出的指挥才能。距兵变发生一年后，习仲勋成为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两年后，他就成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解放后，他又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李特生在两当兵变后，又参与组织了平凉蒿店兵变。李秉荣后任红二十六军二团步兵连指导员，参加了创建陕甘边照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许天杰、吕剑人虽然在两当兵变后被捕入狱，但他们坚贞不屈，在党的营救下先后出狱，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许天杰解放后任临潼县政协副主席，吕剑人1979年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左文辉解放后曾任青海省民政厅副厅长、陕西省视察专员等职务。以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两当兵变的领导者和参加者，表现出的忠于革命、敢于斗争、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两当兵变的硝烟虽早已散去，但其光辉历史和彰显出的革命精神，仍然是鼓舞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因此，研究和探讨这段历史，就仍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附录

陕甘边区党组织领导名录*

一、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领导机构（照金时期 1933年3月至10月）

书 记 金理科（1933年3月至6月）
 秦武山（1933年6月至10月）
军委书记 习仲勋（1933年3月至10月）
委 员 金理科（1933年3月至6月）
 秦武山（1933年6月至10月）
 习仲勋（1933年3月至10月）
 史（师）克寿（1933年3月至10月）
 张秀山（增选，1933年6月至10月）
 李妙斋（1933年3月至10月）

二、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领导机构（南梁时期 1934年5月至1935年10月）

书 记 秦武山（1933年10月至11月）
 张秀山（1934年5月至8月）

* 注释：附录中收录的各相关领导名录资料均来源于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组织史资料》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个别部分根据新资料有调整。

惠子俊（1934年9月至1935年2月）

李生华（1935年2月至4月）

习仲勋（代理）

李景林（后）

委 员 秦武山 张秀山 刘志丹 习仲勋
张邦英 张 策 张静元（源） 惠子俊
蔡子伟 刘景范 龚逢春 李生华

秘 书 长 蔡子伟（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

组织部长 张邦英（1934年5月至9月）

蔡子伟（兼，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

宣传部长 张静元（1934年8月至1934年冬）

龚逢春（1934年冬至1935年4月）

《布尔什维克的生活》编辑部负责人

龚逢春（兼，1935年1月至4月）

三、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党委（1934年9月至1936年1月）

党委书记 张邦英（1934年9月到1935年秋）

唐洪澄（1935年秋至1936年1月）

委 员 张邦英 杜 宛 郭炳坤 张仲良
陈国栋 李尚勤 贾维义

组织部长 杜 宛（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

宣传部长 郭炳坤（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

军事部长 陈国栋（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

四、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驻东区特派员（1935年2月至10月）

特 派 员 马文瑞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
领导名录
(1935年2月至9月)

书 记	惠子俊	
代理书记	崔田夫	
秘 书 长	郭洪涛	
组织部长	郭洪涛(先)	崔田夫(后)
宣传部长	高 岗(先)	张秀山(后)
妇女部长	白 茜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名录

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机构（寺村塬时期 1932年3月至8月）

主 席 李杰夫（高维翰，兼，1932年3月至8月）

副 主 席 张静元（1932年3月至8月）

李××（一说是唐桂（贵）荣，
1932年3月至8月）

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机构（照金时期 1933 年4月至10月）

主 席 周冬至（1933年4月至10月）

副 主 席 习仲勋（1933年4月至10月）

土地委员 王满堂（1933年4月至10月）

肃反委员 王万亮（1933年4月至10月）

粮食委员 姬守祥（1933年4月至10月）

经济委员 杨在泉（1933年4月至10月）

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机构（南梁时期 1934 年2月至11月）

主 席 习仲勋（1934年2月至11月）

副 主 席 白天章（1934年2月至11月）

贾生秀（1934年夏至11月）

政治秘书长 蔡子伟（1934年9月至11月）

土地委员 张步清（1934年2月至11月）

劳动委员 牛永清（1934年2月至11月）

财政委员 武生秀（1934年2月至夏）

白天章（兼，1934年夏至11月）

肃反委员 贾生秀（兼，后为郝文明）

粮食委员 呼志禄（1934年2月至11月）

军事委员 边金山（1934年2月至5月）

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 郭锡山

四、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机构（1934年9月至1936年1月）

主 席 黄子文

张邦英（后一）

秦善秀（后二）

副 主 席 刘永培（1934年9月至1936年1月）

财政委员 封正宝（1934年9月至1936年1月）

肃反委员 陈福从（1934年9月至1936年1月）

土地委员 杨保德（1934年9月至1936年1月）

劳动委员 杨保德（兼，1934年9月至1936年1月）

军事委员 张嘉伯（1934年9月至1936年1月）

五、陕甘边区东区革命委员会（1935年4月至9月）

主 席 马文瑞

土地部长 呼志禄

粮食部长 奚玉山

财政部长 许克昌

肃反主任 张彦福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南梁政府) 领导名录

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南梁政府）领导机构 (1934年11月至1935年4月)

主 席 习仲勋（1934年11月至1935年4月）

副主席 贾生秀（1934年11月至1935年4月）

牛永清（1934年11月任职）

政治秘书长 蔡子伟（1934年11月至12月）

张文华（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

劳动委员会委员长

张钦贤（1934年11月至1935年4月）

土地委员会委员长

李生华（1934年11月至1935年4月）

肃反委员会委员长

郝文明（1934年11月至1935年4月）

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长

惠子俊（1934年11月至1935年2月）

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杨玉亭(1934年11月至1935年4月)

粮食委员会委员长

呼志禄(1934年11月至1935年4月)

文化委员会委员长

蔡子伟(兼, 1934年11月至1935年2月)

妇女委员会委员长

高敏珍(女)后为张景文(女)

保卫大队大队长

郭锡山(1934年11月至1935年4月)

副大队长 宋 飞(1934年11月至1935年4月)

《红色西北》报编辑部负责人

蔡子伟(兼, 1934年11月至1935年2月)

二、陕甘边区南区苏维埃政府(1935年11月至1936年1月)

主 席 张 月(1935年11月至1936年1月)

副主席 张邦英(1935年11月至1936年1月)

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名录 (1934年5月至1935年4月)

主 席 刘志丹 (1934年5月至1935年2月)
刘景范 (1935年2月至4月)

副 主 席 边金山 (1934年5月至11月)

参 谋 长 吴岱峰 (1934年5月至11月)

秘 书 长 杨在泉 (1935年2月至4月)

副秘书长 杨 灏 (1935年2月至4月)

供给部长 马锡五 (1934年5月至1935年4月)

委 员	刘志丹	高 岗	杨 森	杨 琪
	黄子文	边金山	张秀山	吴岱峰
	郑柏翔	王世泰	张仲良	孔令甫
	刘景范	黄罗斌	高锦纯	黄子祥
	赵国卿	张邦英	陈学鼎	陈国栋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
领导名录
(1935年2月成立)

主 席 刘志丹(一说谢子长, 1935年2月)

前敌总指挥 刘志丹(1935年5月)

政治委员 高 岗(1935年5月)

军事机构领导名录

一、南梁游击队（1930年10月成立）

总指挥 刘志丹（1930年10月）

二、南梁游击队（1931年9月恢复）

总指挥 刘志丹（1931年9月至12月）

军需 马锡五（1931年9月至12月）

三、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1月至2月）

总指挥 谢子长（1932年1月至2月）

副总指挥 刘志丹（1932年1月至2月）

参谋长 杨重（仲）远（1932年1月至2月）

第一支队支队长 师储杰（1932年1月至2月）

第一大队队长 阎红彦（1932年1月至2月）

第二大队队长 杨鼎（1932年1月至2月）

副大队长 吴岱峰（1932年1月至2月）

第三大队队长 雷恩钧（1932年1月至2月）

副大队长 陈玉青（1932年1月至2月）

警卫队队长 白锡林（1932年1月至2月）

第二支队支队长 刘志丹（兼，1932年1月至2月）

第一大队队长 赵连璧（1932年1月至2月）
副大队长 刘景范（1932年1月至2月）
第二大队队长 杨培胜（1932年1月至2月）
副大队长 白冠五（1932年1月至2月）
第三大队队长 贾生财（1932年1月至2月）
副大队长 谷聚山（1932年1月至2月）
警卫队队长 刘丕杰（1932年1月至2月）
中共队委会书记 谢子长（兼，1932年1月至2月）
委 员 谢子长 刘志丹 荣子卿

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2月至12月）

总 指 挥 谢子长（1932年2月至4月）
刘志丹（1932年5月至6月）
阎红彦（1932年7月至8月）
谢子长（1932年8月至12月）
政 委 李杰夫（1932年2月至6月）
李 艮（愚痴，1932年7月至8月）
副总指挥 刘志丹（1932年8月至12月）
参 谋 长 杨重远（1932年2月至12月）
政治部主任 黄子文（1932年5月至6月）
第一大队大队长 阎红彦
第二大队大队长 吴岱峰

骑兵队队长 强龙光

警卫队队长 白锡林

中共队委会书记 李杰夫（1932年2月至6月）

李 艮（1932年7月至8月）

共青团代表 张我功

1932年4月中旬，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三、第五支队：

第三支队支队长 刘志丹

政 委 李杰夫

参谋长 吴岱峰

第五支队支队长 阎红彦

政 委 黄子文

参谋长 杨重远

1932年5月，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及第一、第二大队和骑兵队建制，7月新组建第三大队：

第一大队大队长 高山保

政 委 黄子文

第二大队大队长 刘志丹（兼）

政 委 刘志丹（兼）

副大队长 吴岱峰

第三大队大队长 高鹏飞

政 委 阎润平

骑兵大队大队长 强龙光

五、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1932年12月至1933年8月）

军政治委员 杜 衡（1932年12月至1933年3月）

汪 锋（1933年3月至5月）

杜 衡（1933年5月）

汪 锋（代理，1933年6月至8月）

红二团团长 王世泰（1932年12月至1933年8月）

政治委员 杜 衡（1932年12月至1933年3月）

汪 锋（代理，1933年3月至5月）

杜 衡（1933年5月）

汪 锋（代理，1933年6月至8月）

参 谋 长 郑 毅（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

刘志丹（1933年1月至8月）

政治处处长 刘志丹（1932年12月至1933年7月）

参谋处处长 杨重远

经理处处长 刘约三

管理处处长 杨 琪

随营学校校长 李杰夫

随营学校政委 汪 锋

步兵第一连连长 李亚夫

指导员 李秉荣
 步兵第二连连长 吴岱峰
 指导员 高锦纯
 骑兵连连长 曹胜荣
 指导员 张秀山
 少年先锋队队长 王有福
 指导员 魏 武
 红四团团长 黄子祥（1933年7月）
 政治委员 杨 森（1933年7月）
 参 谋 长 李天赦
 步兵第一连连长 马志舟
 指导员 王柏栋
 步兵第二连连长 高占胜
 指导员 王安民
 共青团红二十六军委员会书记 史克寿
 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1933年8月至11月）
 总指挥 王泰吉
 政 委 高 岗
 第四团团长 黄子祥
 政 委 杨 森
 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 陈学鼎
 党代表兼政治指导员 张邦英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总司令兼总指挥 王泰吉
政治部主任 刘映胜

六、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1933年11月3日恢复红二十六军并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至1935年2月）

师 长 王泰吉（1933年11月至12月）

刘志丹（1934年1月至5月）

杨 森（1934年5月至1935年2月）

政治委员 高 岗（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

杨 森（1934年1月至4月）

张秀山（1934年4月至5月）

高 岗（1934年5月至7月）

谢子长（1934年7月至12月）

张秀山（1935年1月至2月）

中共委员会书记 杨 森（后为张秀山）

参 谋 长 刘志丹

政治部主任 黄子文（后为龚逢春）

第一团（1934年冬组建）

团 长 陈国栋

政 委 张仲良

第二团（1934年11月组建）

团 长 刘景范

政 委 胡彦英

第三团（1933年11月组建）

团 长 王世泰

政 委 李映南 后为黄罗斌

骑兵团（由第四团改编而成）

团 长 黄子祥

杨 森（后一）

赵国卿（后二）

政 委 杨 森

张秀山（后一）

高锦纯（后二）

西北抗日义勇军（1934年11月组建）

司 令 郭宝珊

政 委 任浪花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1934年10月至1935年3月）

校 长 刘志丹（兼，1934年10月至1935年3月）

政 委 习仲勋（兼，1934年10月至1935年3月）

军事主任 吴岱峰（主持日常工作，1934年
11月至1935年3月）

七、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寺村塬时期1932年3月至8月）

总指挥 杜兴邦（1932年3月至8月）

副总指挥 巩世信 张进选 邢进有

八、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1932年4月2日至4月下旬）

支队长 许天杰（1932年4月2日至4月下旬）

政委 刘林圃（1932年4月2日至4月下旬）

队委书记 习仲勋（1932年4月2日至4月下旬）

九、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1932年5月）

总指挥 谢子长（未到职）

吕振华（代理）

政委 焦维炽（未到职）

十、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5月至7月）

总指挥 谢子长（1932年5月至7月）

政委 焦维炽（未到职）

参谋长 杜润滋（1932年5月至7月）

秘书长 邬逸民（1932年5月至7月）

第一支队司令 杜鸿范（1932年5月至6月）

第二支队司令 张东皎（1932年5月至6月）

第三支队司令 王儒林（1932年5月至6月）

三支队（1932年6月整编后）

司 令 王儒林（1932年6月至7月）

政 委 杜润滋（兼，1932年6月至7月）

四支队司令兼政委 孙作宾（1932年7月任职）

十一、人民革命军（1932年8月至9月）

司 令 马济人（1932年8月至9月）

副 司 令 卢纪民（1932年8月至9月）

十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1932年10月）

队 长 李华锋（1932年10月）

政 委 李 艮（1932年10月）

十三、西北抗日义勇军（1933年3月至4月）

总 指 挥 王儒林（1933年3月至4月）

政 委 李慕愚（1933年3月至4月）

副总指挥 薛宝珊（1933年3月至4月）

参 谋 长 张子明（1933年3月至4月）

十四、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照金时期1933年3月至10月）

总 指 挥 李妙斋（后为黄子文、李妙斋、吴岱峰）

政治委员 习仲勋（后为张秀山）

参 谋 长 史进才

十五、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1934年1月至10月）

总 指 挥 杨 琪（1934年1月至10月）

政 委 高 岗（1934年1月至5月）

惠子俊（1934年5月至10月）

十六、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1934年2月建立）

总 指 挥 张明吾

王安民（后一）

陈国栋（后二）

政 委 黄子文

张仲良（后一）

张邦英（后二）

十七、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南梁时期 1934 年 11 月至 1935 年 4 月）

总 指 挥 朱志（子）清（1934 年 11 月至 1935 年 4 月）

副总指挥 郑德明（1934 年 11 月至 1935 年 4 月）

梅生贵（1934 年 11 月任职，1935 年
4 月牺牲，烈士）

参 谋 长 梅生贵（兼，1934 年 11 月至 1935 年 4 月）

十八、陕甘边区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1934 年 9 月至 1935 年 2 月）

总 指 挥 陈国栋（1934 年 9 月至 1935 年 2 月）

政 委 张邦英（1934 年 9 月至 1935 年 2 月）

陕甘边区机关及所属各区县党政军 领导名录

(仅收录甘肃境内)

一、党的组织（陕甘边区特委所属党组织）

1. 中共新正县委员会（1935年8月至1936年1月）
书 记 卢永财（1935年8月至1936年1月）
副书记 李 科（1935年8月至1936年1月）
2. 中共华池战区委员会（1935年9月至11月）
书 记 崔凤鸣（1935年9月至11月）
3. 中共新宁县委员会（1935年11月至1936年1月）
书 记 焦怀兴（1935年11月任职，1936年2月牺牲）
4. 中共永红县委员会（1935年11月成立）
书 记 赵红军（1935年11月起）
副书记 赵廷宝（1935年11月起）

二、政权组织

（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所属政权组织

1. 庆北办事处（1934年6月至12月）

主 任 边金山（一说强家珍，1934年6月至12月）

（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属政权组织

1. 华池县苏维埃政府（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
主 席 贾生秀（兼，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
副主席 李 彦（1934年11月至1935年3月）
2. 合水县太白区苏维埃政府（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
主 席 潘应乾（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
副主席 高清荣（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
3. 庆北县苏维埃政府（1934年12月至1935年9月）
主 席 强家珍（1934年12月至1935年9月）
副主席 高世清（1934年12月至1935年9月）
4. 合水县革命委员会（1935年3月至9月）
主 席 李 彦（1935年3月任职，9月在
“肃反”中被错杀）
5. 新正办事处（1935年5月至8月）
主 任 郭廷藩（1935年5月至8月）
6. 新正县革命委员会（1935年8月至12月）
主 席 郭廷藩（1935年8月至10月）
副主席 左怀玉（1935年8月至12月）
李进荣（1935年8月至12月）
7. 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驻宁县办事处（1935年春至11月）
主 任 刘永培（1935年春至8月）

副主任 李尚勤（1935年春起）

8. 华池战区苏维埃政府（1935年9月至11月）

主 席 高生荣（1935年9月至11月）

9. 庆北办事处（1935年9月至11月）

主 任 李树林 后为李培福

10. 宁县荏掌办事处（1935年4月至12月）

主 任 许兴堂（1935年4月至5月）

刘志霄（1935年5月至8月）

王占奎（1935年8月至12月）

政 委 许兴堂（1935年5月至8月）

11. 新宁县苏维埃政府（1935年11月至1936年1月）

主 席 张有鹏（1935年11月至1936年1月）

12. 永红县苏维埃政府（1935年11月成立）

主 席 梁文汉（1935年11月起）

副主席 李银清（1935年11月起）

三、军事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军事组织）

1.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1934年2月至11月）

队 长 郭锡山（1934年2月至11月）

2.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1934年11月至

1935年4月)

大队长 郭锡山 (1934年11月至1935年4月)

副大队长 宋 飞 (1934年11月至1935年2月)

3. 庆阳游击队 (1933年11月至1935年11月)

队 长 杨培盛 (1933年11月至1934年夏)

邵怀德 (1934年夏至11月)

张志孝 (1934年11月至1935年3月)

王宝珊 (1935年3月至11月)

指导员 习仲勋 (1933年11月至12月)

王宝珊 (1933年12月至1934年夏)

政 委 张秀山 (1934年夏至11月)

王宝珊 (1934年11月至1935年3月)

4. 合水游击队 (1933年11月至1935年11月)

队 长 张振东 (1933年11月任职, 1934年春牺牲)

王子林 (1934年春至12月)

赵 生 (1935年1月任职, 4月牺牲)

李树林 (1935年4月至7月)

王子林 (1935年8月至11月)

指导员 孙铭章 (1933年11月至1934年11月)

刘约三 (兼, 1934年12月至1935年春)

白天章 (1935年春至7月)

武海潮 (1935年8月至11月)

5. 庆北游击队（1934年春至1935年11月）
队 长 赵占奎（魁）（1934年春任职，4月牺牲）
李树林（1934年秋至1935年11月）
指导员 任有升（1934年春任职，4月牺牲）
赵志善（1934年秋至1935年11月）
6. 华池保卫队（1934年11月至1935年春）
队 长 何兴旺（1934年11月至1935年春）
副队长 郑兴财（1934年11月至1935年春）
7. 华池保卫大队（1935年春至11月）
大队长 黄克秀（1935年春至11月）
指导员 刘培清（1935年春至11月）
8. 庆北游击大队（1934年冬至1935年11月）
大队长 王 英（1934年冬至1935年11月）
党代表 杨占鳌（1934年冬至1935年11月）
9. 环县游击队（1934年冬成立）
队 长 王怀刚（1934年冬）
10. 庆华游击队（1935年6月至11月）
队 长 田生弟（1935年6月至11月）
指导员 李树林（1935年6月至11月）
11. 东华池赤卫军大队（1933年春至1934年11月）
队 长 黄克秀（黄锁，1933年春至1934年11月）
指导员 张朝贵 后为陈梅利

军事参谋长 黄德明（1933年春至1934年11月）

12. 华池战区保卫队（1935年9月至11月）

队长 蒋成英（一说王占元，1935年9月至11月）

副队长 何兴旺

13. 平子游击队（1933年11月至1934年2月）

队长 何炳正（1933年11月至1934年2月）

指导员 张 策 后为殷云山

14. 第三路游击队第四支队（1934年2月至1935年9月）

队长 刘玉才（1934年2月至1935年9月）

指导员 胡秉坤（1934年2月至1935年9月）

15. 正宁回民支队（1933年秋至1934年秋）

队长 王世平（回族，1933年秋至1934年秋）

指导员 王世英（回族，1933年秋至1934年秋）

16. 第三路游击队第五支队（1934年6月至1935年冬）

队长 张占英（1934年6月至1935年冬）

17. 新正县特务队（1935年8月至同年冬）

队长 唐致祥（1935年8月至同年冬）

18. 第三路游击队第十六支队（1934年秋至1935年9月）

队长 王世平（回族，1934年秋至1935年9月）

指导员 王世英（回族，1934年秋至1935年9月）

19. 第三路游击队第八支队（1934年10月至1935年冬）

队长 刘富奎（1934年10月至1935年冬）

指导员 赵德荣（赵铁娃，1934年10月至1935年冬）

20. 第三路游击队第三支队（1934年11月至1936年1月）

队长 王德宽（1934年11月至1935年1月）

鲁生治（1935年1月至2月）

卜凤鸣（1935年3月至4月）

杨兴财（1935年5月至7月）

卜凤鸣（1935年8月至1936年1月）

指导员 李士新（1934年11月至12月）

刘永培（1934年12月至1935年8月）

刘玉对（1935年9月至1936年1月）

21. 第三路游击队第一支队（1935年1月至12月）

队长 杨德明（1935年1月至9月）

张占荣（1935年10月至12月）

22. 新正县警卫队（1935年8月至12月）

队长 王凤鸣（1935年8月至12月）

后 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在西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对当时的中国革命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后来南方各革命根据地陆续丢失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共同组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发挥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的关键作用，其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因此，加强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全方位研究是党史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问题研究的成果辑录，内容包括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历程、存在原因、历史地位、重要会议、统战工作的研究文章；也收录了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具有重要影响的两当兵变的研究文章。

本书通过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并在本省一些党史研究专家中征求意见，中共党史出版社在技术规范上进行了指导，参与本书校对工作的有李军、诸葛云艺、杜维泽、李晓军、王顺安、张泽，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研究领域是不断探索的过程。由于史料掌握的欠缺和研究视野所限，书稿中可能还存在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提出批评并指正。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问题研究



ISBN 978-7-5098-2330-9



9 787509 823309 >

定价：62.00元